

目 次

自序.....	1
文章・語言・文字.....	1
開快車時候的一個備忘錄.....	15
大衆語跟土話.....	21
由反對文言文到建設大衆語.....	33
“白話”和“大衆語”的界限.....	37
怎樣前進一步？.....	42
爲白話文告林語堂先生.....	47
爲大衆語告林語堂先生.....	53
擁護吳老將軍底“大衆語萬歲”.....	62
擁護了吳老將軍之後.....	65
大衆語“決不是含有階級性的”.....	71
一九三四年大衆語論戰回顧.....	79
方塊字・別字・手頭字.....	89
一九三五年的中國語文運動.....	98
“國語運動史綱”.....	111
新文字和大衆文學.....	121

給一本廈門話新文字小冊子作的序.....	126
國語羅馬字呢？中國新文字呢？.....	130
關於語言.....	159
關於世界文庫底翻印古書.....	166
談野叟曝言.....	183
“愛智廬”.....	202

文章 語言 文字

一

語言和文章都是表達人的思想情感等等的東西，文章甚至於是寫出來的語言。照理，除了文章因為受繕寫印刷等技術上的制約，必需比較經濟，謹嚴以外，以及文章可以容許獨有的表現方法如標點圖表等等以外，語言和文章應該是一致的。但是現在事實上語言和文章這樣的不同！不但中國，世界各國底語言和文章也很不同。

它倆為什麼分了家的呢？

人類社會在最初的時候，他們用的語言，在某種程度的地域範圍以內是一樣的。因為他們底生活習慣，他們底行爲，他們底觀念，沒有什麼不同，但是在很久以前，人和人就分了家。孟子就說過什麼‘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之類的話，那起源當然在孟子以前。所謂‘勞心’‘勞力’的分別，無非就是參加生產過程和離開生產過程的分別。因為有的參加生產過程，有的離開生產過程，兩者之間的生活習慣就慢慢不同起來。不但行爲，就是觀念也慢慢不同起來。不消說，兩者之間的生活習慣，行爲，思想所需要的語言，自然也跟着不同起來。時代的進化。就是說生產工具和生產關係底逐漸改變，兩方面底生活習慣行爲思想也不同的發展，路線逐漸改變，兩方面底語言不同程度就逐漸增大。時代越進化，兩方的生活習慣行爲思想相差就越遠，兩方的語言也就相差越遠。但這裏所說的不同，只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體，他們兩者究竟不是可以老死不相往來的兩個民族，他們必須交通彼此的意見，才能維持彼此的關係。就只這一點，也就不允許分成全然不同的兩種語言。這樣一來，不能分成全然不同的兩種語言，爲了研究我們倒可分成三種了。一種是共同的語言其餘兩種是兩方面各自的語言。換句話說就是：勞心者的語言，等於兩方面共同的語言，加自己獨有的語言；勞力者的語言，等於兩方面共同

的語言加自己獨有的語言。語言和語言之間，就是這樣自然地分了家。

還有一種是人工的分家。有兩種不同的人，就是有兩種不平等的人，換句話說，就是有不平等的事實；既有不平等的事實，也就一定有不平等的觀念。換句話說，就是有尊卑貴賤的事實和觀念。在這樣的社會尊貴的人會鄙視卑賤的人是必然的，鄙視他們底人，鄙視他們底行爲，決不會單獨不鄙視他們底語言——他們所獨有的語言。鄙視他們底語言，就不說他們底語言。卽是非說不可的時候，也特爲找旁的話來代替。從前俄國的貴族，在他們自己談話的時候，是不說俄國話，倒說法國話的。那原因就在於農奴們都說的俄國話。在華貴的紗籠裏面如果有一個‘麥歇’在一個‘馬丹’面前無意的說出來一句俄國話，那簡直是莫大的侮辱，像我們在一個小姐面前說出了兩性的生殖器底最土俗的名字一樣。至於那些貴婦人們，除了在她們底奴僕面前，永遠沒有說俄國話的機會。

在有兩種不同的人類社會，哪一種人最願意維持現狀，歌頌現狀，並且把這種維持現狀歌頌現狀的意識傳給別人呢？就是說，哪一種人，最需要宣傳最需要寫文章，同時也最有工夫有能力寫文章，最有機會發表文章呢？何消說，一定是勞心的人們，也就是尊貴的人們。這尊貴的人們寫文章的時候究竟願

意用那一種人底語言寫，能夠用那一種人底語言寫呢？卑賤者的語言，他們是鄙視的，平常連說都不說，難道還願意用它寫文章麼？並且爲他們生活習慣底隔膜，他們對於卑賤者底語言也隔膜了；就是想用那種語言寫，這隔膜也不能使他們運用。那末，剩下來的還有什麼語言呢？只有尊貴的人們底語言，也只有這種語言，他們願意用，能夠用。

還有表現某一種人底生活意識，只有用那種人自己底語言才能恰到好處，才能體貼，刻畫到‘入微’的程度；另外的語言一定會牛頭不對馬嘴。不但寫文章的人底表現問題，讀文章的人底理解問題也很要緊。寫給某一種人讀的文章，當然要用那讀的人所最了解的語言，要是不，讀的人一定不會了解；就算了解，也不會透澈。寫文章的既然是尊貴的人，他必須表現卑賤者的生活意識，以及特別寫給卑賤者讀的理由是不容易找到的。所以法國在革命以前，根本上就有兩種語言，貴族的和民衆的。據歷史學家所說：瑪拉特自己出版一種報紙民衆的朋友，還要知識份子裏面的人向民衆中去講解那報紙上所用的語言。那情形就像中國底文言文。原來文章上用的語言和一般人口頭語言的不同並不只是中國一國。

在文學方面，由語言引起的糾紛也是各國常有的。服爾德反對沙士比亞，說他的主人公的語言是不中貴族底意思的。法

蘭士反對左拉底語言也同樣著名。屠格涅夫不承認涅克拉梭夫底語言是文學語。起初許多戲子不願排演果戈里底‘欽差大臣’。因為那劇本裏頭的走卒說的是走卒底語言。

總之文章上的語言和口頭上的語言之所以不同，是因為口頭上的語言，先就分成幾種了。語言分成了幾種，寫文章的人卻只有一種；寫起文章來，他們又總是用自己說的語言，自然別種人看起來，就覺得隔膜了。

二

然而中國的文言文，不但和現在的卑賤者底語言不同，就是尊貴者底語言也不同，又是什麼道理呢？

第一，我們必須說：文章和語言底絕對的一致是沒有的。雖說文章應該是寫出來的語言，卻也有各自的特殊性。例如：語言是用口說，用耳朵聽的；文章卻是用手寫，用眼睛看的。幫助語言底表現的是肢體的動作，面部表情，以及聲音底高低快慢等等；幫助文章的卻是分段，標點，圖表，以及多量地引用別人底文章等等。語言受時間底限制非常厲害，不能今天說上句，明天再說下句，說出來了又不容易修改，所以需要較敏捷的思考力；文章不同，現在寫了上半句可以過好久了再來寫完

它，不好的句子還可以從容不迫地塗掉或掉換。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不同點，就是，語言一說完就沒有了，所能達到的空間也有限，除了當時當地，就不能聽到原來的語言；文章卻不但可以傳給別人，傳給遠處，還可以傳給後代。雖說現在有了留聲機，播音機，增加了語言底效力，可是因為應用上的不便，比起文章來還是差得太遠。文章既然可以傳給後代，那傳到後代的文章一定還是古人底文章，原樣未動；語言可不同，它時時刻刻在變化，在新的生活裏頭吸收，創造那必需的新的東西，淘汰修改那失了時效的舊東西。這樣。現代的語言當然和古代的文章不同了。

第二，一篇文章，必然有它一定的內容，那內容一定會在別人面前或後代人面前發生影響；內容越豐富那影響也就越大。有人說，文言文是周朝人底語言；根據前面的分析只能說周朝的尊貴的人底語言。周朝是封建經濟（也許是奴隸或農奴經濟，於中國古代社會史，我是外行，不過姑妄言之，不必過份認真）。開化的時代；禮制文物大備，文化思想爛熟，那時候的文章，內容最豐富，給與當時和後代的影響最大，在歷史上佔着支配的地位。同時，文章底內容，是寄托在一定的形式上頭的。內容最豐富的文章往往形式也最完整（也有內容超過形式或形式超過內容的，大概一種新思想在形成的過程中，內容

會超過形式；一種舊思想在沒落的過程中，形式就超過內容；在全盛時期則內容和形式統一）。周朝的文章內容既給後代以最大的影響，佔着支配的地位，和那內容分不開的完整的形式，自然也一同影響着後代，佔着支配的地位。內容和形式既都給後代以大影響，佔着支配的地位，就免不了被後代的人所崇拜，模仿，而能夠模仿得到的又往往不是內容倒只是形式，例如，體裁，風格，語彙，表現法等等。於是，作為形式方面的重要成分的語言也就為後代所崇拜，模仿着。前面說過，文章上的語言和口頭上的語言本來有多少不同，語言一寫進文章又不容易改變，那末，我們可以說：第一，周朝的文章到現在還是周朝的文章；現在的語言卻早已不是周朝的語言了。本來是周朝的語言的文言文，怎麼會和現在的人底語言相同呢？第二，周朝的文章像前面說過的一樣是周朝的尊貴的人們用尊貴的人們底語言寫的，和周朝一般人底口頭語言，就很不相同。因為後代的人模仿那種語言，周朝的文章才逐漸定型化，成為所謂文言文。於是文言文就縱然是現代的人寫的，也和現代的任何一種人底語言都不同了。

第三，文言文雖說是周朝尊貴的人們底語言，卻也不過是一種省文，并非那時的尊貴的人底話都有寫進文章的資格，也不能照那原樣一絲不改。除了像前面說過的特殊性的關係以

外，還有別種理由，就是，紙張底出現以前，寫文章要在‘竹’‘帛’上‘欹斲’那夠多麼麻煩；在印刷術還未發明的時候，文章要傳世不能不靠別人抄寫，又夠多麼麻煩；加以我們底文字是一種象形文字（自然現在連形也不像了），難寫，難識，難記，又不容易創造新字；雖說周朝的語言應該比現在的語言簡單，可是那文字恐怕更為缺少；寫起文章來一定不會夠用，寫出來的文章一定是簡之又簡，省之又省的語言。疑古玄同在歷史的漢字改革論上說過這樣的話：

左傳第一句：‘惠公元妃孟子’，寫完全了應該是惠公之元妃曰孟子。因為工具不方便，要思省寫，於是就把介詞‘之’和動詞‘曰’都省略了——又如孟子裏有一句：‘許子冠乎？’意思是說‘許子戴帽子麼？’單寫一個‘冠字’無論作名詞或動詞用，都有些不成話。我們若說：‘許子帽子麼？’固然不通；就是‘許子戴麼？’也就含糊得可以了。

這樣看來，文言文不但和周朝一般人底語言不同，就是和周朝尊貴的人們底語言也不很同，自然和現在無論什麼人底語言更不同了。

還有，文言文之所以能支持到幾千年，雖說是由於周朝的文章影響大，後人底模仿性強，同時也該是有一種文章職業家

存在的原故，尊貴的人們，雖然又叫做‘勞心者’，其實是許多人連心也不勞的；有許多人雖然勞心，卻不勞在寫文章上。因此，寫文章的事，在尊貴的人們中間。也並非人人會做，倒成了一部份人底專門技能或職業。那些文章職業家既然崇拜模仿周朝的文章，周朝的文章底內容又在幾千年中沒有本質的改變，自然只能以周朝的尊貴的人們底語言底省文爲基礎，或是使簡單的文章變得稍稍複雜，或是使已經複雜了的文章變得仍舊簡單而已。文章職業家既然是尊貴的人（雖然不一定是尊貴的人），並且是尊貴人們中間的特殊份子，那就一定是：文章越是懂的人少，就越顯得自己底特殊和尊貴，自己底地位就越穩固，何況有時要爲尊貴的人們全體‘粉飾太平’，文章也確有不能使一般人都懂得的苦處。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果大家都懂得文章，豈不大家都知道許多事情了麼？什麼事都讓大家知道，在尊貴的人們看來，的確是很危險的。於是是一般人都不懂的古言文就不但成爲文章職業家底法寶，也就成爲尊貴者全體底法寶了。

三

古言文還有一個最大的存在的理由，就是它是用方塊字

寫的。前面說過，寫文章是尊貴的人們的事；可是方塊字尤其是尊貴的人們底文字。卑賤的人們就是勞力的人們，全部時間耗費在勞苦的生活之中，沒有工夫來學習這難寫難認難記的方塊字；作算忙裏偷閒，學會了有數的幾個，也必然會變成別字，手頭字那樣的東西，不能自由運用，拿它來寫出自己底語言是不消說得的。能夠學習運用方塊字的只有過着閒適生活的尊貴的人們，也只有他們底語言才被它簡略地寫出來過。方塊字既然沒有寫出過卑賤的人們底語言，對尊貴的人們底語言又寫得很簡略，那末，說它從來就和語言的關係很少，尤其是和現在的語言的關係很少，似乎不算過火。

方塊字是象形文字，單音文字，無頭無尾，不能依照語言底變化而變化；同時，字形繁多，複雜，呆板，新字底創造極感困難，這都是使它離開語言的原因。人類底語言不斷地隨着生活底變換，豐富；而變換，豐富，不斷地產生新的東西，也不斷地淘汰舊的東西。方塊字也有它自己底進步吧；可是它最初就沒有和語言一致，又因為本身有上述的那些缺點，進步的速度一定比語言遲緩得多，彼此底距離越隔越遠，不能不脫離口頭語言成為只能寫紙書面的文言文的東西。五四以來的白話文，說對方塊字和口頭語言的拉攏工作費了很大的力氣，結果白話文仍舊只看得懂聽不懂，就是方塊字缺乏和語言合作的精神

底明證。

方塊字固然不容易寫出口頭語言，可是也有些地方，因為方塊字是靠字形來表示意義的（固然形聲字也有表音的成分，可終究不是拼音字），不必照口頭話寫也可以懂——‘目’就是眼睛，‘髮’就是頭髮，凡認識的人一看就懂，何必多寫幾個呢？‘二桃殺三士’，‘此生或彼生’，曖昧固然曖昧，簡潔也實在簡潔，文言文底擁護論，也並不是毫無理由。文言文底存在，是方塊字給與了最大的可能，是毫無疑義的。方塊字不用說，是因為文章而存在；可是從以上的分析看來，在它成為定型之後，卻又反轉去影響文章，使文章不容易接近口頭語言。然而方塊字底罪惡還不止如此，它還要去阻礙語言底發展，助長語言底紛歧。不錯，前面說過，方塊字和語言的關係很少，可是和文章的關係卻很深。那文章雖說是從語言（尊貴的人底語言）中出來的，正和方塊字影響文章一樣；也必然會反轉去影響語言。於是，方塊字不但直接影響文章，同時又間接影響語言。

第一，因為方塊字底無法變化，使口頭上本有變化的語言不能儘量地按照容易變化的路線發展，甚至使原來複雜多變的語言變成簡單不變的東西。（A）複音詞兒寫成一個方塊字就變成單音，例如眼睛就成為‘目’，再由‘目’造成了種種

熟語：‘十目所視’，‘遠人無目’之類。這些詞兒和熟語，如果都混進語言裏去，就會增加語言底艱澀，如果不混進去，又削弱了語言底內容。(B)有語尾的詞兒寫成一個方塊字，就變得沒有語尾，例如盤兒碗兒之類，也可以只說‘盤’‘碗’。(C)本有變化的詞兒寫成方塊字就變成沒有變化或使變化不容易顯出，例如，所有的動詞，都是如此，以致不但在文章上，就是在語言上都弄得混淆不清，使語言和文章底文法成爲一個苦惱的問題。

第二，因爲方塊字靠字形分別，口頭上的同音詞兒，無需弄得不同；更不能借助文章來弄得不同。例如，‘張’和‘章’，‘武’和‘伍’，本來都是不同的姓，但連姓着這些姓的人們，也不怎麼感到混淆；如果不是方塊字幫忙，難道他們能不另想辦法麼？因此我想，如果沒有方塊字，有了‘功績’這個詞兒，一定不會有‘供給’或‘攻擊’那些發音完全相同，含義完全不同的詞兒的吧；爲了弄出種種區別的標記，中國語言中的每一個詞兒底音段，不會這樣短簡的吧；分別不同的意義，不會靠那野蠻的平上去入的吧；那末，我們的語言就不會有這們多的同音字，縱然以前有過，從今以後，該會逐漸的減少，至少不會加多的吧。

第三，因爲方塊字無法科學地標出音來，一個字底唸法就

可以因地而不同。一個‘茶’字，有的地方唸‘查’，有的地方唸‘德’；一個‘吃’字，有的唸‘七’，有的唸‘恰’，有的唸‘加’。雖然我不知道在語言底紛歧上，方塊字盡過怎樣的任務；卻可以斷言，在語言底統一上，方塊字一定是個大的阻礙——既然不能標音，各人除了照自己習慣了的音讀，沒有另外的辦法（國語統一運動不能不借助於注音符號之類就是明證）。此外，不標出音來，新字出現時就無法唸出，例如‘納’，究竟唸‘內’呢，還是‘納’呢，還是‘芮’呢？無法斷定。

以上是就方塊字和文章，語言的直接關係說的；在別方面，方塊字又是阻礙文化進展的魔王。不用說，方塊字本身底難學難記以及它和文章，語言的關係，處處都表示它阻礙着文化進展的，這裏不過指出幾點特殊的事實罷了。例如，(A)方塊字在文言文中造出了許多特殊的文體和玩意兒——八股，駢文，試帖，排律，詞，賦，箴，銘，對聯，匾額，詩鐘，字謎以及官廳的公文佈告，廟宇裏的籤譜，舊戲，歌詞，開篇唱本等等。這些東西都是因方塊字而存在的，裏頭有許多把戲需要很長的時期的學習；縱然學會了，也毫用實際的用途，於文化思想沒有任何補益。(B)方塊字底寫法很難，寫好更難，寫字這件事裏頭，又有許許多多的玩意兒。要了解寫字，要把字寫好，也需要很長時期的學習。最無理的是簡直把寫字當作一種藝術，常

常有入化很大的代價去尋求或保藏它。有正書局，榮寶齋，商務印書館那些地方，掛滿了所謂‘名人書法’，有許多是用珂羅版影印出來的，多少可寶貴的精力耗費在這無用的廢物身上了哇！至於在印刷上，鑄字排字底麻煩；在記錄上，打字速記底困難；都足以阻礙文化思想底發展，似乎已經有人說過，這裏不必重複了。

方塊字這們壞，不是早就應該消滅了麼？不，一件東西底存在與否，往往不以它本身底完美與否爲斷，倒是看社會上沒有人需要它。方塊字和卑賤的人們本來沒有發生過關係，它底煩難以及種種壞處又是卑賤的人們接近文化生活的大阻礙，當然被卑賤的人們所唾棄的吧；可是這種情形卻是尊貴的人們底利益，一定會爲他們所需要，所擁護：那末，方塊字底廢除與否，就不能是它本身的問題，要靠尊貴的人們和卑賤的人們這兩種力量底搏鬥底結果來決定。

一九三六，七，七。

開快車時候的一個備忘錄

一 引 言

‘文言文，白話文，大衆語’這問題發展得真快，簡直不容許我從從容容地寫出我對於這問題的好些意見。假如我還慢條斯理地寫，不知甚麼時候，才能跟現在所提出的論點聯結起來。加以天熱，事多，人懶，筆笨，不但一天寫不出兩篇，甚至兩天寫一篇還很吃力。我們進行太慢了。我應當開快車，搬去許多暫時可以擱下或留幾天的文章。但是一方面怕自己忘了，一方面又怕跳得太遠，讀者摸不清線索，先來一個備忘錄。

二 文 言 文

文言文是跟封建制度相終始的。起於封建制度底繁榮，衰於封建制度底衰落，壽終正寢於封建殘餘底肅清。這裏有幾點解釋：第一，封建勢力雖也用話寫了文章來麻醉人；封建制度裏面，也會孕育‘白話文’底萌芽，但是主要的還是文言文。第二，封建殘餘一天不死，總要掙扎一天，因此，就會給‘文言文’辯護一天。第三，現在的封建勢力，像某先生所說，已經學會住洋樓，坐汽車，吃大菜，跳探戈舞。滿口‘yes’‘no’的了。他們攻擊‘白話文’，已經不像林紓那種老實地說它是‘引車買漿者流’底話了。

三 白 話 文

‘白話文’生長於封建社會，發揚於民主政治擡頭時代。在歷史上‘第三等人’（不是第三種人）底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它盡過不小的反封建的任務。但是因為‘第三等人’反封建底虎頭蛇尾。有始無終，一轉眼，反跟封建勢力結合了，所以‘白話文’正跟它爸爸一樣。搬了許多文言的東西進去，成為

一種‘新文言’。但，雖然這樣，它究竟已經不是純粹的文言文了。

四 文白爭執底本質

- ‘文言文’跟‘白話文’的爭執底本質，用我杜撰的話說，是個讀者羣衆的問題。例如：‘此生或彼生’，不用說是章士釗律師底‘兩個桃子殺死三個讀書人’底重複，雖省事，卻曖昧，非看上下文不能懂得意思。既需看上下文，其實一個‘他或他’就可代替，比起來更省事。大衆有了複雜準確的話，硬要大衆說簡單迷糊的話；甚至大衆有了簡單準確的話，硬要大衆說複雜迷糊的話。可見‘省事’只是一隻羊頭，賣的卻是‘迷糊’的狗肉。

五 文白爭執底意義

現在提出文言文跟白話文來討論，是很有意思的；因為在文化領域現在還需要反封建的民權運動。不過新的反文言文運動，不是單獨反對文言文就可了事。現在提倡文言文，是和其它許多復古開倒車的事聯合一氣，計畫地向新勢力的人進

攻。反對文言文，必需同時反對整個讀經尊孔，逃禪佞佛的整個復古運動。

六 大衆語底建立問題底提出

大衆語這名詞，是在文章應該用話寫這前題下提出來的，是因爲白話文，並不徹底是話，夾雜着許多中國跟外國的文言，爲大衆看不懂聽不懂，寫不出，纔提出來的。是在‘白話文’不能表出大衆底意識，生活，或不是表達大衆底意識，生活的最好的工具的這情形之下提出來的。

七 大衆語跟文章內容

因此，大衆語底提出，同時就是提出了用大衆話寫的文章底內容。如果不是要大衆自己寫，不是爲大衆寫，不是寫大衆，換句話說，不是代表大衆的意識，大衆語這名詞不必提出。封建勞力或帝國主義的傳教士們已經在用大衆容易懂的話寫文章去欺騙大衆，但是那不是大衆話。理由：它不是代表大衆的意識的。至少，不是大衆底大衆語——只是尊貴者羣底所謂大衆語。

八 大衆語跟白話文

大衆語不是在白話文之外另外建立一種全新的寫文章的話。因此，大衆語不能完全拋棄，或反對白話文。大衆語是白話文中的‘話’的一部份底發展，使它更明確，豐富，充實，活潑；同時也是白話文中的‘文’的部份底澈底肅清。

九 大衆語跟土話

現在並非已經有一種大衆在說着的大衆語存在。雖然長江黃河流域，有比較普通的話，也不過是比較有作大衆語底基礎的資格，並非已經就是大衆語了。這普通話底語彙很少，表現力非常不充分。它需要大衆來充實，但是廣大的大衆說的還是土話，懂得最深的也還是土話。如果把土話否定了，就是斷絕了充實普通話，使普通話成爲大衆語的一種根源。只有提倡土話，掘發土話中的寶藏，纔容易提高大衆底文化水準，纔容易養成大衆底寫作纔容易使普通話更豐貴，也就容易建立起大衆語來。對於土話的態度，應該跟對文學遺產的態度一樣；批判地接受，合理地揚棄。更應該向蘇聯提倡各民族底話跟文

學底史實學習。

十 建立大眾語是個實踐問題

大眾語不存在於文人們底腦子裏，不存在於書房，亭子間或前樓。因此，建立大眾語，是個實踐問題。要向大眾學習，要提高大眾底文化水準；可是，並不是要辦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大眾語傳習所’，叫大眾來受訓練。建立大眾語，應該嚴厲地糾正一部份文人學者們底波格達諾甫傾向。

十一 建立大眾語應該避除樂觀的放任主義色彩

有些人以為文言文底沒落是必然的，頂多，也只發生一點點‘輕微的阻力’。同樣，大眾語底形成，也是必然的吧，這說法，自然是對歷史的發展法則，看得清楚極了；不過，很容易被誤解為可以忽視或放任。要知道文言文雖必然會沒落，但要是沒有人給它送葬，它不會自己爬到墳坑裏去。大眾語雖然會形成，但要是沒有人推動，也不會憑空掉下來，即使來，也不知甚麼時候。樂觀的放任主義會取消了當前的工作。

大衆語跟土話

我是主張提倡用土話寫文章的。但是因爲我底‘備忘錄’。字句寫得太疏忽，把這意思寫成‘提倡土話’了。有些人反對土話，也許是因爲這個原故。譬如寬璐先生，主張‘批判地接受土語中的語彙及其地方色彩’，跟我底主張底一部份，差不得好遠，可是他卻寫了很長的文章來反對我。不過，給一個機會讓我重說一遍我底意見也好。

我說：大衆語這名詞，是在文章應該用話寫這個前提之下提出來的。但是話，不止一種，有尊貴者羣底話，有卑賤者羣的話，究竟應該用哪一種話寫呢？如果不是要大衆自己寫，不是

爲大衆寫，不是寫大衆，大衆語這名詞不必提出。所以，在汪懋祖、胡懷琛先生們看來，用甚麼話寫文章是不成問題的。最好當然是文言，開明一點，也可以用‘本色語’。他們不是有人老實地招供過麼：‘我不了解大衆，不了解大衆語，更不了解大衆語文學’（晨曦，莫衰先生作：所謂大衆語文學）。

我們呢？我們是要大衆寫，寫大衆，爲大衆寫的。因此，就應該用大衆語寫，就是說用卑賤者羣底話寫。

但是現在並非已經有一種大衆在說着的全國通行的大衆語存在。雖然有比較普通的話，也不過是比較有作大衆語底基礎的資格，並非已經就是我們所要建設的大衆語了。這普通話底語彙很少，表現力，表現方法都非常不充分，它需要大衆來充實。但是廣大的大衆說的還是土話，懂得最深的也還是土話。要大家充實普通話，使普通話豐富起來，成爲最普通有力的大衆語，還需要大衆底努力。自然，辦法是不止一種的。但辦法之一，應該是提倡用土話寫文章，掘發土話中的寶藏。如果把土話否定了，就是斷絕了充實普通話，使普通話成爲大衆語一種動力。對土話的態度，應該跟對文學遺產的態度一樣：批判地接受，合理地揚棄。更應該向蘇聯提倡各民族底話跟文章的史實學習。

以上是說過了的話底重複。只遺漏了用土話寫文章，容易

提高大衆文化水準，容易養成大衆底寫作能力兩句。

這意見。雖然經過幾位先生底指摘，我還是認爲對的。如果有錯誤，應該是在我太看重了普通話這一點。不過我底備忘錄也未免太簡單了。

第一，沒有強調道地的大衆語，存在於土話之中。雖然已經有大衆在說普通話。更多的大衆，說的卻還是土話。土話是不能跟大衆底日常生活分開的。不是有人特爲到楊樹浦工廠區域去採訪大衆語麼？結果是得來了幾段土話（見申報‘談言’）。這位先生底態度，也許是不該恭維的，但他卻展露了一部份的真實。中國最大的都市上海尚且這樣，別處就不消說了。如果我們不把‘大衆’這名詞跟蓮岳先生所說的‘小衆’對立起來。認爲是指人數或地域底面積；又不像寫‘隨意小酌’的莫襄先生認爲可以指‘一國民族’或‘全世界人羣’，也不把建設大衆語運動，當作國語統一運動去理解的話。那末，大衆這名詞，應該是指他們在這社會上所佔的經濟的政治的某種地位，‘大衆語’應該是跟封建餘孽，買辦資產階級所用的文言文，語錄體，白而文而歐化的驢子話對立的東西。因此，‘大衆語’這名詞本身，本來就該含有土話在內。用大衆語寫文章這句話，本來就該含有用土話寫文章的意思在內。建設大衆語運動，本來就該含有以土話爲基本要素的意思在

內。

第二，沒有指明所謂普通話，是由各地的土話形成的。它底前身是土話，現在也只是地方色彩較少通行地域較大的土話。把幾個地方的土話拌合起來，去掉那偏僻性最大的部份。選擇那幾個地方共同的部份，這樣就成了普通話。這種普通話，其實比用以造成它的任何一種土話底語彙還要少，表現力還要不充分；因為它只是任何一種土話底一部份而不是各種土話底總合。用它來表達大衆底生活，意識，思想，情感，是很不夠的。如果說普通話已經夠用了，那就是說現在已經有了一種大衆語，我們只要用好了；大衆語建設問題，根本用不着提出。大衆語建設問題底提出，正是因為它不夠用。它必需大衆來充實，使它成為豐富的够用的話，才能算跟大衆底日常生活分不開的最為廣大的大衆所常用的大衆語。用甚麼東西來充實呢？照有些先生們底意見，是不用土話。除了土話，現成的可以拿來充實普通話成為大衆語的東西是甚麼呢？可惜又沒給指出來。

第三，我沒有指明五四時代的白話文運動之所以失敗，不肯採用土話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五四運動底階級基礎是誰都曉得的。由那階級基礎所決定，那時的新貴們，不能也不敢採用土話。他們所能做的，只是拿北京的‘官話’當作標準去做國

語統一運動。這北京的‘官話’，不但跟任何地方的土話，不同，連跟北京的土話也不同。它沒有一點兒土的氣息，土的氣息，有的只官氣息——封建氣息。因之它不但不能表達大衆底生活，意識，思想，情感；甚至表達那班新貴們底生活，意識，思想，情感也不够用。作爲悲慘的結果，必然是大批大批地向文言借兵，被文言所同化。大衆語底建設，不能那樣隨便向文言借兵，是說也不用說的；不隨便向文言借兵，必然會大膽地大量地採用土話。反對土話的先生們底過慮，大衆自己底作家跟前進的作家，會在實踐上給以答復。

第四，我沒有指明大衆語底建設，是一個文化鬭爭的實踐問題。雖然我說過‘容易提高大衆底文化水準，養成大衆底寫作能力’，也是很空洞的。作爲一個鬭爭的實踐，我們不應該同意猛克先生底‘一般的大衆’的說法。大衆就是大衆，沒有甚麼一般的跟特殊的。‘一般的大衆’只是一個想象的抽象名詞；抽掉了各各說着土話的大衆，‘一般的大衆’究竟是甚麼呢？就算能够說普通話的大衆是‘一般的大衆’吧，我們有甚麼權利撇開那不能說普通話的‘特殊的大衆’，簡直不爲他們計算呢？在這裏，我覺得高荒先生的提示是對的。他說：一方面被以大衆底生活需要爲基礎的文化鬭爭任務所規定，一方面被中國言語底分歧條件所規定，所謂‘大衆語’，一定不是

一元的‘國語’式的東西，就是各各以當地的大衆爲對象的多元的發展，……所以，實際的文化鬭爭工作，會產生以上海底大衆爲主要對象的大衆語作品，以廣東底大衆爲主要對象的大衆語作品，以長江中部底大衆爲主要對象的大衆語作品……。這樣的大衆語作品，一方面各各地適應了大衆底需要，一方面包含了向更高的大衆語發展的最好的成分。

以上是我對備忘錄上關於土話的問顯的補充。

但是非難土話的先生們，提出了很多意見：我應該怎樣解答呢？我以爲那些意見，很少‘言之成理’的。

例如，有人說，土話是封建的，要不得；爲了打倒封建勢力，必需反對土話。但是爲甚麼土話是封建的呢？爲甚麼只要是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東西，就簡直要不得呢？更爲甚麼打倒封建勢力必需反對土話呢？這理由，沒有提，真有點叫人摸不着頭腦。這些先生們，有的甚至是在藝術上主張採用舊形式的主將；又都沒有反對過批判地接受文學遺產。但在土話問題面前，卻改變了態度。不錯，我們底社會是從封建制度來的。我們說的話——當然不止話，帶有多或少的封建色彩，土話也不能例外，是事實；現在，過去的封建意識；許多是靠着土話在傳達。也是事實。但這豈不明明可以像對於藝術底內容跟形式的問題那樣去理解的麼？如果只要是封建時代留下來的東西，就

全盤要不得，爲甚麼我們又常常說批判地接受包含封建時代的文學在內的文學遺產呢？

又有人說，各人用各自底土話寫文章，結果會增加各地大衆相互間的語言上的隔閡。要免除大衆相互間的隔閡，這盛意是可感的。可惜不是個根本的說法。大衆相互間由交通而至於結合，並不光靠語言。主要的是他們底生活內容。他們因爲生活相同，要求相同，使他們彼此容易互相了解，而結合起來。無論甚麼語言上的隔閡，都不能阻止他們。世界上有着兩三種乃至幾十種話的國度，那些國度裏的大衆，並沒有因語言上的隔閡而互不了解。就算語言上的隔閡有多少影響吧，但提倡土話文章底實際情形，會剛剛同這班先生們所推測的相反。語言上的相互間的隔閡，通過了作者底表現跟解釋，會使本來不懂這種土話的人看起來，都比較容易懂。土話是大衆最能聽能看能說能寫的話。因之，就是提高大衆文化水準，養成大衆寫作能力的最好的工具。在大衆文化水準逐漸提高的過程中，大衆底理解力會加強起來；他們不但說自己底土話用自己底土話寫文章，還要借那自己底土話中間所沒有而存在於別處底土話中間的特別的話來說話，來寫文章。這樣彼此借來借去，他們會把那原來的語言上的隔閡打成粉碎。像‘像煞有介事’，‘壓根兒’，‘丟那媽’，這些話，是幾個地方的土話。因爲有人

用這些土話寫，現在懂這些土話，寫這些土話的人，已經不止是說這些土話的本地人了。瞧，寫‘丟那媽答章芸生’的胡秋原，跟廣東人有甚麼關係呢？這就說明用土話寫文章，不但增加相互間的隔閡。倒打破了相互間的隔閡。

還有人以為土話中間有‘奶奶雄’，‘丟那媽，……’等等罵人的話，不雅，太骯髒。如果用土話寫文章，就會有寫成奶奶雄文學的危險。這種話提出給大家笑笑是可以的。不應該成爲一個正式的意見。土話中間並非只有‘奶奶雄’甚麼的，是不消說的，用土話寫文章，並非盡寫‘奶奶雄’甚麼的，也是不消說的。必需指出的是這種雅俗觀念，是尊貴者羣底觀念，汪懋祖先生底‘敢問如何表出’，就是這樣。紳士淑女們，雖然他們常常是色情的玩弄者，但是在表面上，在談話中，總以為性器官乃至性器官周圍的東西，性行爲乃至性行爲底類似或影射都是不雅的，骯髒的。這觀念是根據他們底生活的必需而來的。我勸你看看萬迪鶴先生底小說‘王家’（文學三卷一號）下等娼婦王家有過這樣的念頭：‘做太太就了不得？一樣麻皮換錢！都一樣！夾得緊！脹不破……’如果大眾能明明顯顯地看見，破得紳士淑女們跟自己底‘都一樣’，於尊貴者羣底尊嚴乃至支配，是有莫大的危險的。於是紳士淑女們不得不把生理的一部份掩飾。隱秘起來。同時，也許正因為他們是色

情的玩弄者，性器官乃至性行爲，在他們底良心(?)上，真正成爲骯髒的，猥褻的，羞辱的東西。(性器官一名生殖器，有人又叫做淫具，我以爲是有分別的。紳士淑女們底東西叫淫具。大衆底叫生殖器)。所以他們在口頭上，人面前避免它，隱諱它。只有他們才需要這種虛偽的粉飾。大衆底每一句話也都是從生活底需要產生出來的。不需要，就不會有。主要的是表示憤怒，有時甚至是表示親密或愛撫，就用了這種罵人的話。罵人的話，很多場合，雖然還是那樣的字句卻連半點罵人的氣息都沒有了。大衆不是紳士淑女，不該用紳士淑女底眼光看大衆，不該希望大衆做紳士淑女，不該在大衆面前裝紳士淑女底樣子。一句話，不該給大衆以虛偽的粉飾。無論甚麼話，如果必要，都該寫；不要怕紳士淑女看見了皺眉頭，吐口水，我們沒有使無論哪一個紳士淑女舒服的任務。用嚴肅的眼光看，‘奶奶雄’也好。‘丟那媽’也好。都有它嚴肅的意義。只有用骯髒的眼光看，它才會成爲不雅或骯髒的東西。這意見好像沒有人提出過，爲了減少誤會。還要申說幾句：同是一句罵人的話，會因爲說出的人不同而有本質上的差別。莖生底‘漢奸的供狀’跟胡秋原底‘丟那媽章答莖生’，是兩首著名的最油滑的詩。但是‘漢奸的供狀’，代表的是大衆底憤怒；‘丟那媽章’不過是紳士淑女們底說客掛上流氓式的油嘴而已。

還有一個重要的非難，就是有人說，土話中間有許多只有音沒有字的。用土話寫，必需造出許多新字，太麻煩。這又是不能成爲理由的。怕麻煩，壓根兒就用不着建設大衆語：建設大衆語，壓根兒就會有許多麻煩的。不用說，新字，應該造，必需造。問題是在造出怎樣的新字：還是方塊字呢，還是拼音字呢？方塊字，雖然本身已經發展得很高，比起拼音字來，仍舊是落後的東西。它底沒落是必然的。中文拉丁化，已經成了大衆底呼聲，並且已經有地方在實驗。如果方塊字經過這樣一個大革命，那些有音無字的土話的問題，壓根兒就不能成立。造新字，簡直連麻煩都沒有。我們應該進一步討論怎樣展開這中文拉丁化運動。自然，中文拉丁化，並不是一樁容易的事，在現狀之下，紳士淑女底代表們，必然會用無論甚麼方法來反對，打擊；因爲中文拉丁化一實現，把他們底甚麼廟堂文章，甚麼公文佈告，乃至那載着支配中國大衆幾千年了的任何昏亂思想的高文典冊，都一古腦兒從根本上不知扔到甚麼地方去了。中文拉丁化，必然跟大衆語建設運動不能分開地成爲大衆文化上的一個主要的鬭爭。在完全用拉丁字代替方塊字以前，寫文章的人，碰到有音無字的土話，怎麼辦呢？用拉丁字母拼。我相信，中文拉丁化，至少對於已經認識許多方塊字的人們，決不會是‘從某年某月某日起’，完全廢除方塊字，用拉丁字母代替。

一定有一個過渡時期，有一種拉丁字跟方塊字夾雜着的文字出現，像現在的日文。現在寫文章的人，在全部方塊字的文章裏，夾幾個拼音字是無妨的。自然，這種文章，大眾不會第一次看見了就懂的。但這是說，建設大眾語，不是一個孤立運動，必需跟整個文化運動，例如大眾教育之類一同進行，而建設大眾語本身，也是大眾教育之一。那些討論是先建設大眾語了纔教育大眾呢，還要先教育大眾了再建設大眾語呢的問題的文章，是多餘的。

我對於用土話寫文章的見解，大致是這樣。但是這篇文章也寫得不很清楚，讀者會從文章裏看出我有兩個互不一致的意見：一個是簡直用土話寫，一個是用比較普通的話寫，批判地採用土話中間的特殊的語彙或表現法。不錯，我底意見是這樣。以下，把這兩種意見交代清楚一下。

一篇作品，如果是知識份子層爲主要的對象——附帶着一些撞過州，過過縣，知識較高，理解力較強的都市的大眾，不應該拿那偏僻性太濃厚的某一個地方的土話去麻煩他們。用比較普通的話寫，批判地採用土話中間的特殊的語彙或表現法。運動這種比較普通的話。形成事實上够用的，流行最廣的大眾語。這是指一般的所謂作家底作品說的，也就是指甚麼‘一般的大眾’的場合。要使自己最容易得到‘作家’的尊

號，要使自己底作品在較大的範圍裏傳播，自然這樣就够了；但作爲一個文化鬭爭的實踐，作爲一個教育大衆的工作，這是決不夠的。我們必需有一種以某一個地方的大衆爲主要對象的，完全用某一個地方的土話寫的作品。運用一切的形式，運用最土的土話，就是大衆最容易了解的土話也就是現有的不折不扣的大衆語寫文章。並且我們不能只把土話寫出來了就算完事，還要逐漸選擇某些土話告訴讀者大衆：這種話在別處的土話怎樣說，普通話怎樣說。於是，土話作品，除了完成那作品本來所要完成的任務以外，除了提高大衆文化水準，養成大衆寫作能力以外，附帶地還會收到整理土話，使土話逐漸消失其偏僻性，逐漸打破土話跟土話之間的隔閡的統一土話的效果。土話文學，不用說，不是國語統一運動；然而它卻自然而然地有更切實，更容易地達到國語統一運動所要達而達不到的目的的可能。它會完全跟反對土話的先生們所想像的相反。

末了，我慎重地申明：爲了大衆語底建設，爲了使這一次的論戰不致白費，用土話寫文章跟文章中間採用土話，是必要的。必需採用土話，必需提倡土話文學，大衆語才能到得本質的勝利。

由反對文言文到建設大衆語

文言文復活運動是封建復古潮流中當然有的現象，對於這一運動的鬭爭，當然而且必然是反封建復古運動底一翼。那麼，被整個反封建的陣容所規定，這個鬭爭底基本力量是勞苦大衆底力量，此刻表現得最明顯的，是站在勞苦大衆底立場上的知識份子思想家底力量。換句話說，這個運動是勞苦大衆底文化鬭爭日程上的一項，目前最緊急的一項。

所以，‘大衆語’問題底提出，表示了這個問題得到了正確的發展。這意思並不是說由一個問題發展到了另外一個問題，而是指出：這是一個運動底兩面。認清了封建復古運動中

的文言文復活運動底本質，就一定會達到建設‘大衆語’的結論；祇有‘大衆語’問題得到了具體的解決和實踐的效果以後，反文言文鬭爭才能够爭取實質上的勝利。

首先要觸到的，是這個論戰到現在爲止，所提了出來的幾個重要的具體問題；對於文言文底勢力的估計，對於‘白話’底性質的估計，對於‘大衆語’底內容的規定。

文言文固然已經成了僵屍，但僵屍而居然復活了，這就說明了還有使這個僵屍能够復活的堅實的基礎。反對文言文運動是這個鬭爭底一面，一切過小的估計都是有害的。文言文底勢力一方面表現在它還沒有失掉的廣大的地盤（公文，信札，各種應酬文，報紙，……最重要的是學校國文作文等）上面，另一方面一部分的所謂白話文，在內容上形式上都是和文言文相通的白話文，是文言文最有力的友軍或後備勢力。

其次，爭執得最利害的是關於‘白話文’底性質。說白話文是買辦資產階級底東西，這顯然是一個不正確的估計。白話文固然有和買辦資產階級相通的一面，但也有和大衆相通的一面。在形勢上，白話文底基本的詞彙，語法，也是勞苦大衆口頭話底基礎的部分；在內容上，白話文現在創造了不少的進步的作品，是理論繙譯文底唯一工具。我們不能把和大衆底生活

需要結合着的白話文拋掉。大衆裏面的作家會把白話文裏面合乎大衆需要的部分提高，不合乎大衆需要的部分消滅，在實踐中將白話文‘揚棄’。

然而，什麼是‘大衆語’呢？在許多解答裏面，表現了一個最強的傾向；‘國語統一運動’的傾向。先在腦子裏面放下了抽象的原則，想創造出一個合乎這個原則的全國通用的‘大衆語’來。有的人只是抱住這個原則，左邊反對白話，右邊反對土話方言，使‘大衆語’成了一個烏有的東西。有的人甚至發表了以北京話爲標準的奇怪議論。

但是，建設‘大衆語’必然地是大衆底文化運動中的一個問題。從大衆底生活需要出發的文化鬭爭，一方面要反對一切封建的文化麻醉，一方面要滿足他們底文化欲求，使他們底向前的志願和切膚的情緒得到表現。所以，真正的大衆語作品，必然地要帶有大衆底土底氣息，汗底氣息，能够充分地傳達大衆底生活需要，表現大衆底生活色彩。

那麼，一方面被以大衆底生活需要爲基礎的文化鬭爭任務所規定，一方面被中國言語底分歧條件所規定，所謂‘大衆語’，一定不是一元的‘國語’式的東西，而是各各以當地的大衆爲對象的多元的發展。在實踐裏面的作家或大衆自己的作家，對於他所選作主要對象的特定領域裏的大衆所熟悉的

白話(普通話)裏面的成分,他一定會儘量地運用,一方面採用必要的方言土話,使他底作品能夠充分表現他所要表現的大衆底生活。所以,實際的文化鬭爭工作,會產生以上海底大衆爲主要對象的大衆語作品,以廣東底大衆爲主要對象的大衆語作品,以長江中部底大衆爲主要對象的大衆語作品……。這樣的大衆語作品,一方面各各地適應了大衆底需要,一方面包含了向更高的大衆語發展的最好的成分。

所以,大衆語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言語學上的問題,而是一個以大衆底生活需要爲基礎的文化運動的問題。

五四的白話文運動,兩年前的對於白話的批判和建設大衆語運動。近代口語底變遷及分佈系統,寫法拉丁化問題,大衆語與大衆文藝問題,國際的國內的復古運動與大衆語建設運動……等,都要展開具體的討論,要展開具體的描寫和分析。防範這一運動底流產,反對一切退陣或過於樂觀的現象。然而,一切鬭爭都要沿着在這裏簡單地提出了的主線前進。

“白話”和“大衆語”的界限

作爲決定戰略問題的基礎，也就是原則上的估計，我指出了：所謂‘白話’，有和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相通的一面，也有和勞苦大衆相通的一面。我們所要建設的筆頭用的‘大衆語’，既不是和‘白話’截然分開的，但也不就是‘白話’，而是：基於各地大衆底實踐需要，各各口頭語變成筆頭語的多元的東西。爲了免除對於這個估計的可能的誤解，關於‘白話’和‘大衆語’的界限問題，先做一個簡單的補充的說明。

第一，論爭中的所謂‘白話’，所謂‘大衆語’，都指的是筆頭用的傳達意思（ Meaning ）的工具。‘白話’不是指

的流行的‘普通話’，而是指現在大家用來寫‘白話文’的文字。‘大衆語’不是指的無形的大衆口頭所說的說，而是指能够表現大衆底生活需要而又爲大衆所懂的筆頭用的文字。所以，建設‘大衆語’並不是建設一種全國大衆通用的口語，而是把各地大衆底口頭語(Spoken language)變成筆頭語(Written language)的運動。

第二，據說中國有六七個方言區，專門學者還會給我們詳細的材料和分析。所以，從各地大衆底口頭語建設起來的筆頭用的‘大衆語’，一定是多元的東西。勞苦大衆是以共同的生活需要而團結，並不是以言語而團結的。在這裏，我們反對鄙視土話方言，‘國語運動’式的傾向。這樣的傾向是根本離開大衆的。當然，這裏剩有一個‘記錄’(寫法)的問題。除了原有的漢字以外，已經提出的有：簡字，注音字母，羅馬字，拉丁化等。專門學者底研究和實際工作底成果會使這個問題得到解決的。(我在那篇文章裏面說，實際的文化鬭爭工作會產生以廣東大衆爲主要對象的大衆語作品，以長江中部底大衆爲主要對象的大衆語作品……等，這不過是假定的例子，並不是肯定了廣東或長江中部是一個方言區的。)

第三，說現在筆頭用的‘白話’也有和勞苦大衆相通的一面，那意思是：在它底本身構造上（我在那篇文章裏面說是

‘在形式上’)它底基本的語彙語法，也是大衆口語底基礎的部分；在它功能上（我說是‘在內容上’），它是繙譯文，論文，……等底唯一武器。所以，對於‘白話’，不是支持也不是反對，而是以大衆底實踐需要爲基礎加以‘揚棄’。對於‘白話’，機械的籠統的‘反對’，也是脫離大衆的。

那麼，‘白話’和‘大衆語’的界限，就可以簡單地鈎畫出來。

大衆語是多元的，但并不是彼此完全獨立的。現在‘普通話’裏面的基本的語彙語法，既是各地大衆口語裏的基礎的部分；從各地的大衆口語變成的各地的大衆語，它底基本的語彙語法，一定是和白話相連的。

因此，大衆語彼此之間有有機的聯系。假定說，兩湖底大衆語和廣東底大衆語雖然相隔很大，相通的成分比較少，然而，兩湖底大衆語和贛北底大衆語相通的成分是很多的，贛北和贛南，贛南和廣東，相通的成分也是很多的。所以，雖然兩湖底大衆語包含白話底成分多，影響的領域也比較廣大（例如皖西贛北川東豫南），但廣東大衆語也包含有白話底成分，它底影響也要達到別的地方（例如閩西贛南桂東）的。

大衆底生活需要是統一的，大衆語一定會一方面提高或加多和白話相通的成分，一方面獲得更多的了解者，部分地部

分地在白話裏面爭得地位。

而且，大衆底生活需要是變動的，發展的，他們對於客觀現實的認識能力也是一天一天地改變或加深。所以，爲了表現他們底新的需要或認識，在大衆語裏面加入新的字彙新的表現法就絕對必要了。而供給新的字彙新的表現法的唯一的源泉，就是白話。換句話說，爲了適應實際的生活需要，大衆語會部分地部分地征服白話，部分地部分地把白話變成自己的東西。產業工人對於機械名詞等的了解，兵士對於武器和各種表現軍隊生活規律的名詞等的了解，農民對於變動生活中的名詞和流行說法等的了解，就是明證。

那麼，現在的‘白話’是不是有獨立的功能呢？我底答覆是肯定的。語錄體，不文不白的驢子話，當然要反對，但句法底歐化，輸入新字，批判地採用文言詞彙，不但不應該籠統地反對，而且必要，雖然另一方面要盡可能地使它容易懂。繙譯，論文，銷行廣大的地域報紙，會議決議等，非用這種白話不可。我還以爲，以學生、知識分子、店員、小市民爲對象的文藝作品，這樣的白話也是絕對必要的（我曾見過能看一天的工作爲自由書的工人）。這樣的白話，雖然很少能够直接被大衆所了解，然而都是間接被大衆所需要。這樣的白話，隨着大衆底反帝反封建的國民經濟改造的發展和勝利，一方面部分地部分地被

大衆語征服，成爲大衆語底源泉之一，一方面漸漸被大衆語所充實所揚棄，可以成爲高級的大衆語底前身。

‘白話’和‘大衆語’並不是對立的。

七，十九，一九三四。

怎樣前進一步？

反對封建復古潮流中的文言復活和建設大衆語的運動，現在似乎漸漸現出了疲乏了的神氣。但實際上這還不過僅僅是一個開頭，不把戰線向各方面擴大是不免要流產的。

到現在爲止，只是問題底提出和原則上的爭執，而且大部分只是止於原則上的爭執。這樣說，我並不是否認或者輕視了，正確的原則底被承認是爭得勝利的前提，而是想說明：一方面，空空洞洞地把原則上的問題反來復去，很容易和當前的實際問題游離，另一方面，只有從各個角度提出充分的具體材料，發動實際工作，才能證明原則底正確不正確，使正確的原

則被充實內容，或者受到部分的修正。爲原則而鬭爭應該就是爲執行實際工作而鬭爭。

如果這個理解是不錯的，那我們就可以在這個運動裏面看出幾點主要的缺陷。前進一步的工作應該從填補這些缺陷開始的罷。

第一是，放鬆了反對文言復活的任務。並不是不承認文言底毒害，而是只把反對文言當作一個原則上的問題，大家承認，文言是封建殭尸，當然是要反對的，但似乎沒有迫切地感覺到有移到實際工作上的必要。沒有痛快地把文言在五·四以後的罪狀向大衆宣佈，沒有向文言底堡壘進攻，用具體的戰術一步一步地把文言底地盤佔據。因爲看輕了這個重大任務，因而原則上的爭執有時完全和實際問題游離了。譬如說，有人主張‘白話’是應該反對的，但如果他沒有忘記反對文言在目前有重大的迫切意義，他就會曉得，知識分子所使用的比較合用的‘白話’，目前是搶奪文言地盤的最重要的武器，他就會看到白話所做的反帝反封建的工作。

在店員裏面曾經有過不寫文言同盟的組織，我們希望在教育家著作家大中學生裏面能夠產生各種反對文言的運動，使文言在各方面碰壁。

當然，就是白話完全把文言底地盤佔據過來了，也不能够

斷定反對封建復古的鬭爭已經完全勝利。封建勢力也一樣地能够用容易懂的‘白話’做武器。然而，反對掉了文言就是毀掉了封建精神所寄身的最毒的殭屍，削弱了封建勢力底傳播力量，使反封建的工作容易開展，也就是反封建工作底部分勝利。至於封建勢力底徹底消滅，自然非等到大衆底反封建勢力全部勝利不可。而在大衆反封建運動底過程中，一定要建設能够適應他們底生活需要的‘大衆語’的。

第二，沒有提出豐富的具體材料。反對白話的沒有把白話在五·四以後的文化運動上所做的工作給過具體的分析，主張方言土話的沒有具體地把各國新興文藝的遺產，教會底工作，民間文藝，方言文學運動等提出來作證。其他如，中國語言底性質和分佈狀況，注音字母，羅馬字運動底經驗，拉丁化工作底實況，也還沒有看到言語學者底報告或意見。我們等待着這些能够使原則充實的研究。雖然不能夠用重金禮聘，我們應該誠懇地邀請各方面的學者專門家來參加，傾聽他們底積學的結果。

第三，沒有發動實際的工作。還沒有造成用實際工作來爭取原則上的勝利的風氣。希望這個運動的參加者，能够舉行各種推動這個運動的事業：短小的大衆文藝刊物，常識小冊子。爲大衆編輯的小新聞，畫報。連環圖畫……等，在這些工

作裏面，各各使用合乎自己底原則的‘大衆語’，在大衆裏面爭取影響。主張方言土話的頂好先從上海話開始，把這個運動深入到上海工人和近郊農民裏面。在電影界方面，可用上海話攝製新聞片，小型的影片，卡通畫等，在工人和近郊農民裏面放映，戲劇界方面可組織簡單的上海話流動劇團……。有人主張建設大衆語應該從識字運動開始，有人以爲建設大衆語應該和平民教育運動結合，雖然在原則上和我們是不同的，但我們卻歡迎識字運動，在平民教育領域裏面宣傳建設大衆語的這些具體工作。這些工作可以轉變成性質不同的前途。

爲了前進，爲了勝利，我以爲：這個運動的參加者，應該從反封建復古這一主要的任務出發，用各種各樣的具體工作來爭得原則上的勝利。

這樣說，我並不是勸大家不要作原則上的爭執，而是指出，原則上的爭執只有用具體的材料和實際的工作才可以形成能夠真正決定勝負的陣勢。

附記：我在‘由反對文言文到建設大衆語’底最後，說一切鬭爭應該沿着我所提出的主線前進。朋友們笑問我，是不是不要人家有不同的意見？這是一個誤解，我不過是和一切發表自己底主張的朋友們一樣，表明自己底相信，以爲只有沿着這條主線才能爭得勝利而已，絕對沒有免強

別人贊成我的意思。那篇文章寫得太倉卒，留下了這樣的印象，是應當抱歉的。

七，二八，一九三四。

爲白話文敬告林語堂先生

一連幾天，看見自由談上徐懋庸、曹聚仁、陳子展幾位先生提到‘文言文’跟‘白話文’的問題。真是倒霉透啦，想不到到了今天，還要讀這種五四時代剩下來的文章！

五四時代，是個反封建的時代。文化上最重要的封建鬼魂之一的‘文言文’，在那時受到了猛烈的打擊。因爲五四時代反封建的不澈底，許多封建的鬼魂，並未連根剷除。到了現在，那壓根兒沒有被打倒過的不必說，許多已被打倒的鬼魂，又在洋大人底砲火之下，實業領袖們底大洋鈔票之中，洋場大亨中鴉片毒品之內以及將軍大員們底槍桿或別的甚麼之上復活起

來了。打開每天的新聞，各種各樣的封建鬼魂底耀武揚威，簡直是‘若汗牛之充棟’，叫人從腳跟冷到頭頂！文言文又要起來取得它‘紗籠的天下’，也就是封建勢力擡頭的一個現象，或者說一個鐵證。

有一件事是值得提出的。現在已經很少像林琴南先生之流的傻子，在爲文言辯護。理論甚麼的，已經成爲累贅，乾脆地用實力來代替了它。多幹，少說，或者只幹不說，這纔是聰明，厲害辦法。瞧，大亨辦的中學，在教學生讀‘幼學’，‘聲律啓蒙’，‘動向’上不見有過記載麼？誰敢去質問他底理由？不過，想不到的是：作爲反對‘白話文’，提倡‘文言文’的實行家，身體力行了幾年的，倒是我們新文壇的幽默大師林語堂先生！

平心說，林語堂先生是個很潔身自好的人。至少他還沒有像浮士德一樣，把靈魂賣給魔鬼。他的私生活，據他自己說，比有些人還嚴肅（見‘說罵’）。他底‘我的話’中，也的確可以發見不少的反封建的氣分。他看不得許多醜惡的東西。他要加以討伐。但是他是一個無拳無勇的學者，不得已，只好託之於幽默。這些，都是相當地值得尊敬的。但是，不幸得很，林先生有一件事我們卻不能容忍——跟對他那以悠閒的態度提倡小品文的不能容忍一樣，誰要容忍，誰就不是林先生底忠實的

朋友——儘管林先生底思想中有多少反封建的成份，但他用來表達他底思想的工具，卻是一個最厲害的封建的鬼魂：‘文言文’！在林先生底許多文章中，幾乎找不出一篇是用純粹的話寫的；反過來，卻可以找出很多篇，是用純粹的‘文言文’寫的。甚至他罵人都是‘僮夫俗子’‘方巾氣’，等等文言的名詞。

林先生不但自己用‘文言文’寫文章，還公開地提倡‘語錄體’。‘語錄體’在那班宋朝的道學先生們當時，也許有一些改革的氣分，但到了現在，已同任何體裁的‘文言文’一樣成了封建的鬼魂！不僅這樣，他還把他所編的刊物，叫做‘論語’，叫做‘人間世’；都是死了幾千年的古人底書名或篇名。也不僅這樣。他還把孔孟程朱老莊們底在當時也許有的是用口說的話，但現在早已成爲‘文言文’了的東西，印在刊物底封面上。還不僅這樣。他又把古人底詩文甚麼的印在他編的刊物中，當作幽默材料。至於採用許多關於已死或還活着的死人們底詩話對聯之類，還不算。

‘論語’有時候，簡直用編輯翻印‘笑林廣記’。這種無意義的事，也許不會是林先生自己幹的；但是，斷乎是在林先生底影響之下幹的。‘論語’一出世，甚麼‘大學’，‘中庸’……跟着也出來了，不用說，也是受了林先生底影響。我們怎能說‘人

聞世’出世之後。一定沒有‘逍遙遊’，‘齊物論’，‘秋水’，‘馬蹄’，……等等刊物出來呢？

因此，我們可以說：林先生底這種舉動，無論他主觀上有沒有提倡‘文言文’，反對‘白話文’的企圖；客觀上，他確乎發生了提倡‘文言文’，反對‘白話文’的效果！林先生，也許是不自覺地做了提倡‘文言文’反對‘白話文’的身體力行的實行家！至少至少！林先生不自覺地幫助了那真正在提倡文言文，反對白話文的人們。換句話說，幫助了封建勢力。雖然林先生對於‘逃禪佞佛’的醜態，深惡痛絕；但在用文言文寫文章這一點上，他卻是跟‘逃禪佞佛’一鼻孔出氣的——因為‘逃禪佞佛’是封建勢力底另一種表現！封建勢力，現在用‘重金’到處‘禮聘’像林先生這樣有思想有學問有聲望的學者。替他們去提倡‘文言文’，反對‘白話文’而不可得；林先生卻不收聘禮地替他們‘客串’了那最重要的腳色！

假如這樣下去，林先生底前途，實在太危險了！我們對林先生還存着不少的希望的人們，必需向林先生指出他底這種迷途。必需向林先生說：來吧，扔掉你書架上的古書，擺脫封建鬼魂底迷惑，來同我們一道兒，乾乾脆脆，痛痛快快地用話寫文章。不用甚麼‘官話’，就用普通話吧；不會用普通話，就用你福建或無論甚麼地方的土話也行。自然，不是說這樣就够

了，到現在爲止在研究看的古書，不知還要迷惑林先生到甚麼時候；但作爲第一步，他必需先用話寫文章。

不過，我得聲明？以上，完全是我對林先生的忠告，並沒有絲毫惡意；假如林先生又認爲‘是罵’，是無名小卒想‘登龍’，或者甚至於是‘政治的’；不但不聽，反而走起極端來，甚至發宣言，著專書，提倡‘文言文’，反對‘白話文’，我當然沒有辦法。我不能站在黃浦江邊，把每個投水的人都拉回來。

末了，避免這篇文章底空洞，作爲實例，姑且從林先生底許多文章中引幾句他最近發表的文章在下面：

一 ‘論語’第四十三期：‘夢影’

於是仰天而嘯，攬天而問，欲卜休咎，天只不應。俯視平土，內爲中原，外爲胡虜，長城蜿蜒，如一長身白蛇……想是彼輩所謂太平景象；而鄭孝胥、羅振玉亦在焉。

二 ‘人間世’第五期：‘母豬渡河’

中國有名言曰：‘眼不見爲淨’。夫‘眼不見爲淨’者孟子齊人一妻一妾章之註腳也。夫良人者，所仰望於終身也。故‘宜壓酒肉而後返’，‘所與飲食者’，‘盡富貴也’，亦理之宜。齊人之妻若肯不見，豈不淨乎？然彼婦偏欲‘矚良人之所之’，於是發見東郭播祭乞徐事實，卒至‘相泣中庭’，家庭破裂，皆一‘矚之罪也，吾人讀人文章，不應根問人之行徑。此爲上策。其次，

爲齋人妻者，既發見東郭乞祭事實，當良人‘施施從外來’時，不必‘訕’，亦不必‘泣’，只須迎笑上前摸其大腹曰：‘今日又是那裏吃得貴人一腹酒肉’？良人必喜甚。如此家庭亦可不致破裂。

三 ‘社會’月報創刊號：‘說罵’

夫逃禪何事也，而舉國若狂，尊班禪若父母，敬喇嘛若神明，若謂王何清談足以亡晉，則逃禪佞佛足以滅中華而有餘。……俗語曰：‘眼不見爲淨’吾欲裝作不見，則滿天下皆比我關心國事之人也。

六月十九日

爲大眾語敬告林語堂先生

林語堂先生最近又用文言寫了一篇文章：‘怎樣洗鍊白話入文。’重要的任務是對大眾語提出了種種非難。

這篇文章底論點，跟林先生近來的文章一樣，大部分是昏亂的。在檢討以前，我們必需注意下面的幾樁事：

第一，避免一切咬文嚼字的小節上的吹毛求疵。像‘大眾語並非方言，便是普通話’，‘純係敷淺之見’，以及‘若胡適之所引“你是給奴才做奴才的奴才”白話達意傳情句子’……等文字上的不通，白字，或欠缺，如果一一指摘出來，也未嘗不可以引起讀者一笑；但，我們知道，林先生最大的努力，是獻給英

交了的；他編的開明英文讀本，據說，是我們現有的最好的一種。那末，即使他簡直寫不來這用方塊字一塊一塊地堆起來的文章，已經够我們對他表示很大的敬意。何況他起初因語絲同人底潤色，後來以公安諸子尺牘爲範本，居然能寫出洋洋數千言的中文文章來，簡直應該把他當作天才文人看待。

第二，避免搬弄任何社會科學上的名詞術語。林先生不是說麼：他跟錦黎熙先生一樣，也不懂大衆語跟國語白話有甚麼分別。我們不能因爲他老實地招供了就看不起他。因爲在一個沒有歷史或社會科學的知識的人面前，大衆語跟國語白話底分別，本來就不像袁中郎全集那麼容易懂——雖然有人證明他跟劉大杰先生他們標點的袁中郎全集，並不比許嘯天、陶樂勤他們底標點書高明。林先生既然完全同意黎先生底卓見，我們還像寫社會科學論文那樣寫文章給他看，他定哈哈大笑：你不說我還明白，你越說我越糊塗了。

第三，原諒林先生底許多性靈的幽默，例如他說：‘若曰，文字欲其美……是小資產階級意識，非大衆所需要，’你不能真以爲誰在甚麼地方這樣‘曰’過。又如他說：‘蘇俄新成立時，以爲婦女皆應不搽粉……今則並由蘇俄政府分送胭脂與女工矣。’你更不必對他解釋：‘新成立時’，連吃的也成問題，自然‘應不搽粉’；‘最近蘇聯建設，已經達到了希望以外的成功。大

衆在日常的生活中，不僅可以受到充分的文化教育，而且……’
(十月十二日大晚報剪影)爲甚麼呢？因爲他有時性靈來了，
偶然幽默一下子，原沒有叫你當作經典看的。誰要認真，就是
誰不懂幽默，誰底方巾氣太濃厚。

以上三點，一筆表過不題。下面且把一個名詞的問題弄清
楚了再入正文。

林先生自己說是愛白話，擁護白話的，究竟他擁護了甚麼
白話呢？

他說：‘白話作文是天經地義，今人做得不好耳。’‘胡適
之下白話之定義曰“明白之白，”二十年來結果，文人作白話，
仍是不明不白’，又說，‘須知今日白話之病，不在白話自身，
而在文人之白話不白而已’。並且重複說，‘須知流行白話
之可憎，乃白話作家之罪，尤其是海派作家之罪，非白話之
罪。’

從這些話看來，他所擁護的白話，並不是‘今人’寫的‘流
行白話’，倒是這之外的，古人寫的現在不流行的白話。這種
白話，從他底全文看來，大約是野叟曝言、紅樓夢之類。

他又說，‘白話範圍寬大。有何不容？……大衆語並非方
言，便是普通話，普通話非白話乎？……由大衆提高之白話非
白話乎？大衆語主張摻入歐化新名詞，摻入歐化新名詞之白

話非白話乎？’把這幾句話聯同上一段所引的話跟‘高爾基教人洗練白話入文’，‘大凡野叟、紅樓白話之佳’等句一齊看來，他所說的白話，其實就是一切非文言文的文章，一切用口頭話寫成文章。難怪說‘白話範圍寬大，有何不容’了。

照他那樣解釋，在我們底討論上只有使問題格外紛歧，我們不應該同意。

第一，雖說白話這名詞在五四以前就有了，但是最多量地被使用，卻是指從五四到現在的這種白話文；在歷史上只有從五四到現在，白話文這東西才佔文學上的主要勢力。作算白話這名詞可以泛指一切非文言乃至非純文言的東西，但主要的卻是指從五四到現在的‘今人’們所寫的‘流行白話。’

第二，作算白話是泛指一切，但非‘今人’所寫的白話，因為過去已久，影響較小，又沒有‘流行’的原故，用不着加以大的注意。我們所不滿的，要它揚棄不好的成分的，望它百尺竿頭進一步的，雖不能說簡直沒有那些東西，主要的卻是現在正在‘流行’的，‘今人’所寫的白話。

因此可以說林先生所指的白話跟我們所指的，並不是一個東西。

然而我們重要的不是要研究林先生怎樣為‘範圍寬大’的白話洗刷，倒是要明白他對從五四到現在流行白話，表示了怎

樣的態度。

對五四以來的白話，林先生不但沒有擁護，並且痛恨。把它挖苦透了。以下舉例：

‘夫文人惡習好填塞，爲文曰，“一顆受了重創而殘破的心靈，是永遠蘊藏在他的懷抱。”曰，“女人最可畏的物質貪慾和虛榮心她漸漸的都被培養成。”既不明又不白，魯望魯蘇，則非糾正不可。’

‘吾所恨者白話文人老習氣不改，不敢作“大君不要出頭”之句耳。’

‘白話提倡至今十餘載，而白話語法之妙，文人尚未盡量移入文中，若胡適之所引“你是給奴才做奴才的奴才”白話達意傳情句子，在今人作品中極少見之。’

‘新文人白話之劣，正在不敢傳入俗語口吻。’

‘白話文不敢用引車賣漿之流之語？好用爛調。’

‘不能知人之心則曰“我豈汝肚中之應聲蟲？”此是如何活潑一種說法。若今日文人必曰“我何以能够了解你底意志呢？”再進一步必又曰“我何以能推知你思維之程序呢？”’

‘今人白話，不如清人小說，明人尺牘，且井不如元人之戲曲。’

好極了，這些話如果不嫌過火，不嫌太抹煞了白話文在歷

史上所演的任務，簡直可說跟大衆語論者底意見接近得很。再看吧，林先生還有一個理想哩。他說：

‘吾理想中之文字，乃英國之文字。英國文字，所謂最正派者，乃極多土語成語之文，非書本氣味之文……英文其所以靈健，乃因其尊土語成語爲正統也。’

‘吾理想中之白話文，乃是多加入最好京語的色彩之普通話也。’

多麼可寶貴的理想喲，我簡直要疑心他也是大衆語論者了。但是不幸得很，只有到此爲止，林先生才是跟大衆語論者接近的。這以後，他完全走了相反的路。路一走錯，他底論點混亂了，他并且反對大衆語了。

他那理想，那要‘糾正’白話的志向，用甚麼方法去達到，貫徹呢？主要的方法是：‘取文言而洗盡一切俗態！’他主張‘借之乎者也以穿插之亦不礙事，’‘放進一二矣焉亦可。’他極力推崇公安諸子尺牘，甚至說‘古文詩詞佳句’底‘字面’。‘萬古常新’，‘白話文中，此種句子儘管放進去無妨。’他奉李笠翁曲話爲‘絕好不過之文章作法指導’叫人‘用心磨鍊’。一句話，他底辦法是拿文言做主體，是叫人鑽舊紙堆。是還元了他底‘文言之白’的老調，他還說：‘此那真正的解放，名之曰白話亦可，名之曰文言亦可，名之曰語錄亦可：’——謝謝他，

沒有說：名之曰大衆語亦可咧！有這樣的妙論麼？因爲白話太文了，不寫土話，不敢引用引車賣漿的話，所以要‘糾正’，‘糾正’的辦法是：用文言寫，向文言的書本子去學，不過，當然，用點土話跟引車賣漿的話進去！‘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林先生卻爽興叫西子蹲在糞缸裏，不過灑幾點花露水。這樣就可人皆不掩鼻了。也許是的吧，不是說，‘海外有逐臭之夫’麼！

我們大衆語論者，一本正經地告訴林先生：要糾正‘白話’，要達到他底理想，這方法是完全錯誤的。唯一正確的方法是照口頭話寫。不過這口頭話，不是指官僚買辦文人學者底口頭話。官僚買辦文人學者少數人底口頭話，受封建傳統的影響太深——中文言文底毒太深，不能使筆頭語從文言的束縛解放出來；仍舊只有少數人能理解，能寫作，仍舊只能表達少數人底生活，思想，感情，意識。這是不需要的。必需的是，照絕對大多數的大衆（這名詞雖然含有大多數的意義，主要的是指社會地位）底口頭話寫。洗鍊大衆底口頭話，使它成爲筆頭語。用這種筆頭語寫的文章，才是大衆所需要，所了解的；才是可以寫大衆，大衆也寫得出的。這就叫做大衆語，大衆語文。（林先生說無人能說明大衆語是何物，完全是他自己做夢！）我們一面要向大衆學習，一面要用洗鍊了的大衆語去教育大衆。

在必要的場合，還要批判地採納（一）土話中的特殊語彙跟表現法，（二）學術上的名詞術語，（三）外來語跟外來的表現法，（四）文言留下來的有用的東西，使大衆語在口頭在筆下，都成爲最豐富的語言，使大衆底文化水準逐漸提高。

現在我們要問：林先生底辦法跟我們底，爲甚麼這樣不同呢？這不是偶然的。林先生雖然表示了若干跟我們底主張近似的意見，根本原則，卻沒有共同之點。我說過：‘如果不是要大衆自己寫，不是爲大衆寫，不是寫大衆，大衆語這名詞不必提出。’林先生底文章裏找得出這樣意見麼？是的，他要‘糾正’白話，引用土語成語？但爲甚麼要這樣呢？找不出答案！再告訴林先生：撇開了大衆，不是要使大衆能懂能寫，用甚麼話寫文章，是應該不成問題的。無論用甚麼話寫。難道少數人還會不懂麼？況且林先生愛自由。反對一道同風，那末，各人自由好了，白話，文言，語錄體，隨使用，何必你糾正我我糾正你，鬧得大家不自由呢？

要對林先生講的話盡於此了。最後，看看他這篇文章，盡了甚麼任務。

幾個月來，語文論戰發展的結果，不但大衆語在新的知識份子層中樹立了理論基礎，就是封建勢力，提倡文言攻擊白話的，也改變了態度，寬容白話，反對大衆語。林先生呢，如果我

從前說他用文言寫文章，是身體力行地提倡文言文，爲封建勢力‘客串’了復古的要角（見六月尾動向）的話不算很錯，那末他現在也進了步，戴着擁護白話的面具，來實際提倡文言文，反對大衆語。換句話說，已經不是客串，倒是乾脆地‘下了海’。他那始終用文言寫文章的態度，那存心非難大衆語的論調，無論他自己以爲站在怎樣高超的地位，都不難一看就明白他客觀上究竟幫助了誰！

一〇，一五，一九二四。

擁護吳老將軍底“大衆語萬歲”

話說大衆語論戰，在烈日炎天之下，擺成了三個陣勢，一個是文言文，一個是白話文，一個是大衆語。三個陣勢之中，各有猛將如雲，勇士如雨。你跟我鏖戰，我同他交鋒，槍來劍往，刀壓斧迎。只殺得天昏地慘，鬼哭神愁。正在難解難分之際，不知從甚麼地方跳出一員大將，大喝一聲：

‘大衆語萬歲’！

衆將聞聲，停槍勒馬，舉目看時，只見此人銅盔鐵甲，皓首蒼髯，豹頭環眼，虎臂狼腰，手挽兩把大斧，殺奔前來。

提起此人，真是誰個不知，那個不曉，當年玄科之役，立下

汗馬功勞，其後身經大小數百戰，無不旗開得勝，赤髮鬼劉唐，豹子頭林冲，尙且不是他底對手，遑論其他？舊話休提；此人姓吳名敬恆，表字稚暉，乃‘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之一員老將也。一向在快活嶺閑居無事，好不快活；今日想是閒得心慌，‘口裏淡出鳥來’，聞得廝殺之聲，便偷了板斧，跑下山嶺，‘大衆語萬歲’，只此一句，便當得別人底千軍萬馬，好一個一語破敵的吳老將軍，真乃非同小可！

但是吳老將軍此次出馬的功勞，還不止此。他把那主張統一國語，或有這種傾向的大將們，殺得落花流水，人仰馬翻。我們且看他底殺法：

四百兆大衆一齊懂得的，是叫統一語，不是現在第一步急需的大衆語。

反對土話的大將們一齊向他進攻：這不是把大衆隔離了麼？這不是把中國大衆在言語上分成幾個國了麼？吳老將軍哈哈大笑：

僚侂也有大衆，阿拉也有大衆。僚侂的大衆，把僚侂的語文合一起來。阿拉的大衆把阿拉的語文合一起來。僚侂的大衆與阿拉的大衆，有了合一的語文，又互相合一起來。一種的統一語，還讓大衆來造成，是第二步。

對於像馮執中教授那種國語統一主義者，他更是手起斧

落，毫不容情

一道同風，就是欽定的反面。我國一道同風的觀念，不但入了政界，咬牢了雞巴，雞腿都挽不動，就在文學界，也是移動一毫，就要若喪考妣的傷感的。破壞統一之罪，在政界是頂大的罪名，在學界何嘗不是呢？

大衆語論戰到現在，沒有過這樣大膽的痛快的喊聲，沒有過這樣高妙的痛快的殺法。沒有，也沒有人敢。只有我們底吳老將軍！吳老將軍畢竟是非凡的。好漢們，上，擁護我們底吳老將軍！正是：

沙場百戰，大將生來膽氣豪；

板橋一聲，小鬼死去屁尿滾。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擁護了吳老將軍之後

擁護了一陣吳老將軍（此處及前文作吳老將軍，借胡適博士語；後作吳老丈，用劉復博士遺語）之後，我們對於‘大衆語萬歲’那篇文章中間的不正確的意見，也有指出的必要。

第一，用某先生在人間世論戰中所用過的話說，這篇文章，首先就在爲‘惡劣的環境洗刷’。文言復興運動，是跟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整個復古運動一齊，作爲整個運動底一翼而起來的。斷乎不是甚麼‘汪柳諸先生他們’少數個人底一種‘忽然’的主張。固然，像柳某之流，如吳老丈所說，‘是進過畜牲道的’，中毒太深，個人筆調（借林大師底話），或者真是無藥可

露；但是他們底中毒，既然不是從現在起的，何以好久以來（柳某在五四前後，曾寫過一些反對白話的文章，跟提倡‘本色語’的胡懷琛在五四時代以改胡適底詩著名一樣，都是老守舊派，準確地說，就是封建餘孽底代表），都銷聲匿跡；要到了現在，才‘忽然’又大吹大擂地提倡起文言文來了呢？豈不明明是說，好久以來，只有此刻現在的環境，最適宜，最容許，最唆使他們發表這種‘主張’麼？吳老丈把‘汪柳諸先生他們’說成一種理想的人物，甚麼‘救人之意七分，衛道之意或亦有三分’，好像他們真是悲天憫人，一片婆心似的。無論以怎樣的動機來提倡文言文，本都是非常毛細的事；問題在於怎樣的環境，養成，容許，支持了他們底主張。吳老丈底胸中是雪亮的，他自己也說，‘文言文太蹩腳，不適於有司之程式’，‘兼習點合於有司程式的文言……也足夠考試院取中，機關登庸’。左一個有司程式，右一個有司程式，豈不明明是說，文言文復興運動，是不能跟‘有司’所提倡的讀經尊孔逃禪佞佛以及其它種種的整個復古運動分開來想的麼？然而吳老丈一點也不問‘有司’何以有這種‘程式’，卻只叫‘小世兄’們去適合這種程式！‘小世兄’們從前聽信了吳老丈底話，把線裝書都扔到毛坑裏去了；現在吳老丈又叫‘小世兄’們去‘適合’甚麼‘程式’，不得不到毛坑裏去撈線裝書。爲無論甚麼環境辯護固無不可，但是不要叫我們‘小

世兄’太爲難了呀！

第二，吳老丈不但爲環境辯護，還爲文言文辯護。他說：

然而文體與衛道有關，我是不大相信。說文言中有道，何以總理的三民主義，竟能把白話寫成的呢？說白話完全是道，何以白話家又常聽見攆斥某某派某某小說呢？可見得文言白話大衆語，止是工具。有容易普遍，或不容易普遍之分罷了。

這就是說，文章全在內容，無論用文言，白話或大衆語表出都一樣。文言可以載道，白話也可以載道，將來的大衆語又何嘗不一樣地載道呢？倒過來說，大衆語，白話所能辦到的，文言也一樣辦得到。好在有一句‘有容易普遍或不容易普遍之分’，不然，不但大衆語底前途給輕輕一下打成粉碎，就是吳老丈從前盡許多力提倡白話，也簡直是多此一舉。這意見斷乎是不對的。雖然同是‘工具’，但‘工具’跟‘工具’之間，因爲各各所受的社會制約不同，彼此就有非常之遠的差別。石器時代的工具，決不是鐵器時代的工具；以手工業爲主要生產的社會底工具，在近代使用機器的工廠裏，會像廢物一樣無用。文言，固然可以‘載’某一時期的‘道’，盡過‘工具’的任務；但它已經不能‘載’我們現在所要‘載’的‘道’，它已經不是最好的工具了。所以文言，白話，大衆語之‘分’決不是容不容易普遍這麼簡單。

第三，吳老丈否定文學，他說：

然而一到文學，便烏煙瘴氣，文言的好文學，如袁中郎的小品文，止供象牙塔裏人消悶，而白話文學的好的，亦不過供亭子間裏朋友排悶而已。其多數的怪物，簡直在大衆都莫明其妙，與古文觀止一樣。所以到了這樣，兄弟願意貢獻的：不要建設了大衆語，跟着便是大衆語文學。建得起大衆語文學，當然亦像胡適之先生把白話文學建成了白話。可是後頭還來一個打倒，是一定不免的。

又說：

我是崇拜文學的，文言白話的文學，都崇拜的。可惜看人沒有力量，止末裝小腳，是實可臭惡的。而且因而害於爾國，兇於爾家，所以敢下斷語，以答先生明問曰：

文學不死，大禍不止。

瞧，‘文學不死，大禍不止’，把引起無論甚麼‘大禍’的罪都推到文學底頭上，顯然又是在那裏‘洗刷’。不錯，那些‘烏煙瘴氣’，‘裝小腳’，‘供象牙塔’或‘亭子間’的人‘排悶’的文學，那些‘大衆都莫明其妙，與古文觀止一樣’的文學，是應該堅決地反對的。但是表現真實，暴露黑暗，可以啓迪大衆，教化大衆，又爲大衆深明其妙的文學，卻又絕對地需要。吳老丈把這種文學也不要叫我們只‘寫點粗淺的工藝文’，顯然是要繳我

們幹文學的‘小世兄’們底械；‘小世兄’們，並不都是傻子，不會一聽見唸唸有詞，就把械都繳出去的。‘工藝文’縱然要，也是另一班人底任務，與文學者無涉。如果叫大家都寫工藝文，不寫文學，那就成了‘一道同風，是欽定的反面’，吳老丈不是很反對‘欽定’的麼？並且，‘工藝文’，也看作甚麼用，‘惠及大眾的飯碗’，固然也說得冠冕堂皇；又安知沒有無恥之徒，專門用以給廠主或‘事業家’們‘幫忙’或‘幫閒’呢？

第四，吳老丈還有個釜底抽薪的辦法，叫知識份子不要幫助大眾建立大眾語文學。他說：

就是大眾語將來需要文學，讓大眾自己創造起來，不要好像白話文學，還是幾個文言文學家改頭換面的代辦。

又說：

所以大眾語要鼓吹文學，是很要當心的。最好遵從陶先生的意思，讓大眾自己來創造，不要代辦。

話真漂亮。完全‘代辦’，自然要不得；但簡直叫知識份子滾開，完全‘讓大眾自己來創造’的辦法，無非就是從大眾的隊伍裏趕走他們底軍師。被奴役，朦混了幾千年的無智的大眾，叫他們憑甚麼來‘創造’文學呢？吳老丈開口‘總理’，閉口‘總理’，難道忘了‘總理遺囑’上也說過‘必須喚起民眾’麼？既曰‘喚起民眾’，可見自己不一定是‘民眾’，而且‘喚起’之後，‘喚’

的人並非就可溜之大吉，逍遙事外，還必須同他們‘共同奮鬥’的呀。依吳老丈說來，‘讓大衆自己來’，壓根兒用不着‘喚起’，就算紆尊降貴地‘喚起’一下，也趁早離開是非場，‘讓大衆自己來’，甚麼‘共同奮鬥’管他娘！不用說，這是完全不對的。‘知識值幾文錢一斤’也好，‘飢不能食，寒不能衣’也好，只要不是‘灌輸大家抱頭痛哭的知識’，知識是要的，知識份子也是要的，無論誰想挑撥離間，想把知識份子從大衆的隊伍趕開，我相信，在進步的知識份子跟進步的大衆之前，一定是不能奏效的。

以上幾點，是‘大衆語萬歲’上最不能令人同意的地方。其它如科工問題，衙堂消遣品問題，階級縱橫問題，埋沒劉半農問題，自稱大衆問題，都算跟正文無大關係，姑且存而不論。好在說來說去，仍然是‘二十年前舊板橋’，雖然一向‘大隱在朝’，跟學術界隔離已久；這回重來，也並沒有玩出甚麼新把戲；大家馬虎一點也就算了。閒話休提。爲了大衆語‘萬歲’，本文指出的這幾點。我們必需堅決地反對，嚴防這種思想混進我們底陣營裏來。雖然吳老丈是贊同大衆語底建立的，雖然他底文章裏也有很可寶貴的卓見。一句話：

擁護了吳老將軍之後，不要忘記了反對吳老丈。

大眾語“決不是含有階級性的”

黎錦熙先生說：‘這（大眾語）決不是含有階級性的’（大眾語文學短論之一）。又說，‘建設的“大眾語”是沒有階級性的；建設的“大眾語文學”也是一樣，也是沒有階級性的’（大眾語短論之十五）。

你看見過黎先生底‘大眾語真詮’麼？他用好多中國跟外國的古典來解釋過‘大眾’這名詞。不過，要是再讀讀樂嗣炳先生底“‘大眾真詮’在日本”（社會月報十月號），我們怎知道黎先生所說的‘大眾’是甚麼東西呢？並且黎先生說‘新詞的分量增加，語言的程度自然提高，階級性就打破了’。又說，‘……纔

把通俗教育家“你們啃窩窩頭，我吃肉”的“階級意識”打破’。那末，我們又怎知道他所說的‘階級性’是甚麼東西呢？既不知道他所說的‘大衆’跟階級性是甚麼東西，更怎知道他所說的‘大衆語’跟‘大衆語文學’是沒有階級性的這話是甚麼意思呢？

如果這樣想，那是我們太老實了。黎先生是聰明人，手腕比我們高妙得多；他明知大衆語是有階級性的，但是不明說。一明說，你想，他還能把他底一二十篇文章油印了寄到全國的刊物雜誌上發表麼？這年頭兒，說話困難，發表文章更困難，他知道得比我們還多，所以他使了一點小手術，再三說大衆語跟大衆語文學是沒有階級性的；實際呢，卻處處在證明它有。

我們知道，大衆語跟大衆語文學有沒有階級性的問題，就是話跟文章有沒有階級性的問題。如果別的話跟文章都沒有階級性，大衆語跟大衆語文學不能獨有；如果別的話跟文章都有階級性，大衆語跟大衆語文學不能獨無。林語堂先生說得好：

天下沒有一種語言不可拼音的，只有中國語言不可拼音，奇不奇？別種語言的拼音讀起來都可懂，中國的拼音字讀起來倒必不可懂，此亦是奇聞。

現在讓我來套他底文章：

天下沒有一種話跟文章是沒有階級性的，只有大衆

產過程，兩者之間底生活習慣，就慢慢不同起來；不但行爲，就是觀念也慢慢不同起來；不消說，兩者之間底生活習慣行爲思想所需要的話，自然也跟著不同起來。時代底進化，就是說生產工具跟生產關係底逐漸改變，兩方面的生活習慣行爲思想也以不同的發展路線逐漸改變；兩方面的話底不同程度，就逐漸增大。

具體點說，‘紗籠’裏面，紳士淑女們底清談或情話，大衆固然不容易聽得懂；從大衆自己底生活習慣，行爲思想產生出來的特殊的話，紳士淑女們不但聽不懂，甚至簡直不聽。因此，如果要大多數的人‘聽得懂’纔算‘大衆語’，‘大衆語’一定有階級性。

其次‘彼此聽得懂說得出’，未必就沒有階級性。這裏又抄我在‘大衆語跟土話’一文中說過的話：

同是一句罵人的話，會因為說出的人不同而有本質上的差別。芸生底漢奸的供狀跟胡秋原底丟那媽章答芸生，是兩首著名的最油滑的詩。但是漢奸的供狀，代表的是大衆底憤怒；丟那媽章，不過是紳士淑女們底說客掛上流氓式的油嘴而已。

可見即使聽得懂，說得出，也仍然有階級性。

好了，以上對黎先生底短論中的階級性問題，總算交代清

於大衆的語言)了。晚周南方民間的大衆語歌謠，也被屈大夫們寫出來……，漸衍爲貴族的‘賦’體；而中古史中的‘誥’‘誓’文和‘諸子著述文’中的用詞造句，多少也直接受了些‘大衆語’的影響。

多麼清楚呀，一邊是大衆，是口頭的大衆語文學，是大衆語歌謠；另一邊是貴族，是士大夫（“諸子”，“屈大夫”們），是和大衆語分歧了的，供貴族之用的詩經，楚辭，賦，誥誓文，諸子著述文等等。像這樣的分析，這篇短論通篇都是，這裏不能全引，且看他對五四時代的‘文學革命’，又下了怎樣的斷案：

對於大衆的自身總沒有甚麼影響，一切都還是知識階級，即所謂小衆的勾當。

你想，黎先生有絲毫否認文章跟話中有階級性的意思麼？

或者你要說，黎先生雖用巧妙的手腕證明話跟文章是有階級性的；但是他沒有說大衆語跟大衆語文學也是有階級性的。剛剛相反，他還再三說沒有呀！

這又是你太老實了。黎先生底十九篇短論中；有一個跟‘大衆’對立的名詞：‘小衆’。你以爲是他在望文生義地玩方塊字的把戲麼？不是！他一開始就告訴我們，‘用詞不覈名實，就不能討論一切問題’，所以你不能只看那‘名’，還要‘覈’那‘實’呀。短論十九：

以上十八篇短論所有‘大衆’字樣都可一律改爲‘民衆’；對稱的‘小衆’呢，改爲‘士大夫’。

懂了麼？大衆——民衆，小衆——士大夫，這階級的輪廓多清楚！

我們前面說的：話跟文章，是有階級性的。我們曉得由那推論：大衆底話——大衆語，跟大衆底話的文章——大衆語文學，也是有階級性的。現在黎先生告訴我們‘大衆’是跟‘小衆’對立的，就是說，有階級性的；那末，當然也可以一推論：大衆底話——大衆語，也是有階級性的；再推論，用大衆底話寫的文章——大衆語文學，一樣是有階級性的。難道你還以爲黎先生把大衆（民衆）跟小衆（士大夫）當作同一個階級的人物看待了麼？自然，黎先生用的名詞，甚麼‘民衆’呀，‘士大夫’呀，是略略嫌籠統一點。但是不是告訴過你麼，他正因爲這樣，才能把許多文章在到處發表；假如寫得像科學論文一樣，說不定會受到妨害的。‘用科學的眼光看’，這是我們讀者底事。

不對，不對！黎先生明明說：‘一國全民族大多數的人同時彼此聽得懂說得出的語言，就叫“大衆語”’。不用說，‘一國全民族大多數’，就是大衆。他底大衆跟小衆，是依人數多少來分的，不是以地位來分的。因此，大衆語跟小衆語，也是以‘聽得懂，說得出’的人數多少來分的，‘決不是含有階級性的’。跟我

們現在所說的簡直不同。

我說我底先生，像你這樣老實，簡直不消活得了。依人數分也好，依地位分也好，實際是一句話底兩種說法。瞧，‘一國全民族大多數的人’，難道不是大眾，不是民衆，倒是小衆，是士大夫麼？‘一國全民族大多數的人彼此聽得懂說得出’的話，不是大眾底話，民衆底話，難道還是小衆底話，士大夫底話麼？固然黎先生使了一點掩眼法，那內面，階級性還是活靈活現的呀。

不對吧，也許黎先生所說的大多數，是連小衆也包括在內的，大多數的民衆能懂的話，也就是少數士大夫能懂的話。只有士大夫底話，大眾不懂；沒有大眾底話，士大夫不懂的。所以小衆底話纔是有階級性的；大眾底話，沒有！

不過我們要說，‘彼此聽得懂說得出’這句話中的‘彼此’一定只能指大眾自己之間；如果包括小衆在內，那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首先第一，就‘彼此’不能聽得懂。先從拙著‘話跟話底分家’抄一段話：

所謂‘勞心者羣’（此處應改爲小衆）跟‘勞力者羣’（此處應改爲大眾）的分別，無非就是參加生產過程跟離開生產過程的分別。因爲有的參加生產過程，有的離開生

產過程，兩者之間底生活習慣，就慢慢不同起來；不但行爲，就是觀念也慢慢不同起來；不消說，兩者之間底生活習慣行爲思想所需要的話，自然也跟著不同起來。時代底進化，就是說生產工具跟生產關係底逐漸改變，兩方面的生活習慣行爲思想也以不同的發展路線逐漸改變；兩方面的話底不同程度，就逐漸增大。

具體點說，‘紗籠’裏面，紳士淑女們底清談或情話，大衆固然不容易聽得懂；從大衆自己底生活習慣，行爲思想產生出來的特殊的話，紳士淑女們不但聽不懂，甚至簡直不聽。因此，如果要大多數的人‘聽得懂’纔算‘大衆語’，‘大衆語’一定有階級性。

其次‘彼此聽得懂說得出’，未必就沒有階級性。這裏又抄我在‘大衆語跟土話’一文中說過的話：

同是一句罵人的話，會因爲說出的人不同而有本質上的差別。芸生底漢奸的供狀跟胡秋原底丟那媽章答芸生，是兩首著名的最油滑的詩。但是漢奸的供狀，代表的是大衆底憤怒；丟那媽章，不過是紳士淑女們底說客掛上流氓式的油嘴而已。

可見即使聽得懂，說得出，也仍然有階級性。

好了，以上對黎先生底短論中的階級性問題，總算交代清

楚了。這一回檢討得來的教訓是，我們讀別人底文章，不能光看他表面上說了甚麼話，還要分析他實際上說了甚麼話。那怕黎先生滿口是這沒有階級性，那沒有階級性，他底文章，除了‘沒有階級性’這幾個字面以外，卻到處都在表明是有階級性的。這是一個矛盾。這矛盾，我們特別善意地解釋，是黎先生在故意使用遮眼法。如果這解釋不對，恐怕就是由於他認識不夠的原故了。

十一月五日，一九三四。

一九三四年大衆語論戰回顧

用甚麼話寫文章這一問題，在中國底文化界，已經提出了幾十年，到十幾年前，纔得到部份的解決。這問題底提出，並不是像有些時下的論客所說，僅僅是甚麼工具或技巧方面的事；剛剛相反，一開始就是連同內容問題一齊提出來的。不；是內容發生了問題，內容進步了，發展了，舊有的工具，技巧，不能適應新的內容了，這寫文章用的語言才發生問題。如果不是中國封建制度底根本動搖，不是西洋資本主義文化底侵入，不是土著資產階級底興起，就不會有五四時代的所謂新文化運動，文學革命運動；用甚麼話寫文章，也就不會成爲問題，不會得

到像五四時代那樣部份的解決。同樣，如果不是整個資本主義文化底癱爛，不是中國大眾不能忍耐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底嚴重的壓榨而遂行著血的鬭爭，不是這殘酷的現實對中國文化給予了新的魄力，新的內容，也就不會有現階段的新興文化運動；大眾語運動，當然無法產生。因此，用甚麼話寫文章這一問題，雖然看起來像是屬於工具或技巧方面的問題，實質上卻是一開始就是社會鬭爭明確的反映，作為社會鬭爭的一翼而展開的。

‘文言文’這種筆頭語是幾千年以前的特殊階級底話底省文，極為簡單，貧乏，開始就跟口頭話相差很遠。並且中國字是一種最難學習的象形字，是一個方塊字表一個音的單音字，它底伸縮變化，非常困難，就限制著文言文底發展。時代越進步，口頭話越變得豐富複雜，文言文就遙遠地落在後頭了。字既不容易學，文章又跟口頭話隔得很遠，必然會跟大多數勞苦著的大眾無關而完全落在極少數的特殊階級手裏。在封建社會的特殊階級手裏把持了幾千年，更必然在形式上，內容上都成為跟封建思想分不開的一個整體了。五四運動底結果，“白話文”奪取了文言文不少的地盤，在文章上佔了相當的優勢，是應該在中國文化史上大書特書的。所謂白話文，就是寫得淺白易懂，‘明白如話’的文章，比較複雜，清楚，完備，準確的文章。比

起文言文來，的確是邁進了一大步。如果得到正當的發展，不斷地克服本身的缺點，儘量地跟口頭話接近，到現在也許能成爲大衆底東西。但是歷史決定五四運動不能澈底肅清封建文化；封建餘孽在五四以後，重新以各種姿態逐漸抬起頭來；不但不斷地企圖恢復文言文原有的天下，並且侵入白話文中玩著‘借屍還魂’的把戲。白話文在這樣情勢之下，既因爲當時提倡的人們本來保持著多少封建影響，自己底文章裏面，也殘留著不少的文言文的成份。又因爲封建文化底侵入跟唆使，使這些成份，通過了後起的人底模仿，不但沒有削減，反擴張起來，成爲一種借以衒學的風氣。同時又因西洋文化的影響，白話文固然變得較爲豐富準確，但也加入了許多陌生的必要以上的生吞活剝的歐化句法，於是許多人寫的白話文，就成爲文不文，話不話，中不中，西不西的東西。連智識份子中也只限於由近代學校出身的才能看得懂，當然更難吸收大衆。再加上方塊字底根本難學，大衆中識字的人太少，於是他們雖迫切地需要精神的糧食，可是沒有方法取得。

近年來的文藝大衆化的口號正是針對著這一事實而來的，雖然沒有展開廣泛的討論，卻已有了不少比較正當的提示，成爲現在大衆語運動底遠景。至於直接使大衆語運動爆發的導火線，則是去年（一九三四）的復古運動。一九三四年封建

殘餘，在各方面開始了五四以來的空前的活躍，有公然主張恢復舊道德（封建道德）的運動，有班禪大師底時輪金剛法會，有張天師底打醮求雨，有各小學讀經及禁止男女同學同行的明令，同時在教育界也就有官僚們底中小學應教文言文及白話文不能算治學的工具的主張。

一九三四年六月，上海文化界爲了回答在南京發表的提倡文言文的言論，在幾個日報副刊上提出了建設大衆語這一口號。不久，許多定期刊物，都有了響應，漸漸就擴大到全國。到現在爲止還沒有停止討論。參加討論的有教育家，科學家，文學家，戲劇家，美術學，電影導演，及批評家，新聞記者。也有職業婦女以及工廠的職工農村的農民等等。發表文章有幾百篇，字數在一百萬以上，涉及到文化運動許多問題。實是近年以來一個最熱烈最普遍最有影響的論爭。雖然內中有文言派的反對和中傷，白話派底曲解或譏笑，以及大衆語論者當中各種不正確的傾向，大衆語卻在進步的大衆之中確立了理論的基礎。以下是半年來討論結果底概述。

第一大衆語是甚麼呢？大衆語是大衆能懂（聽得懂，看得懂，說得出）能寫的一種筆頭語，是能表現大衆底意識，生活的一種筆頭語。大衆是不懂得文言文也不很懂那一般的白話文的，大衆沒有文字，只有話。文章要使大衆懂，首先必需照口

頭話寫。但照甚麼人底口頭話寫呢？軍閥官僚地主買辦資本家以及文人學者們底口頭話，都受了很深的文言文的毒，或者還含有許多必要以上的歐化成份，因為他們底生活習慣跟大衆底生活習慣相差太遠，生活習慣上所需要的話，也跟大衆底生活有著很遠的距離。用他們底話表現他們自己底意識，生活，或者够用，自己能懂，但拿來表現跟他們底生活習慣完全不同的大衆的時候，就成為極其貧乏同時也是大衆不懂的東西。因此，這裏的照口頭話寫的意思，就是：照大衆底口頭話寫。只有用這種大衆能懂能寫的大衆自己底話寫文章，洗鍊大衆自己底口頭話成為筆頭語，才能肅清在文章中殘存著的封建影響，才能驅除現在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文人學者們在文章中所布的煙幕，才能表出大衆底苦痛與鬭爭；才能教育大衆，提高大衆底文化水準，使大衆中產出自己底作家來。自然，在必要的時候，還要批判地採取大衆口頭話中所沒有白話文，歐化文甚至文言文中所特有的語彙或表現法；但那是在大衆文化水準逐漸提高的過程中，大衆底能力對那些特有的語彙或表現法，已經能夠消化，能夠收為自己底東西的時候的事。

第二大衆語跟文言文 大衆語跟文言文是勢不兩立的對頭是不消說得的。文言文復活運動，是封建復古潮流中當然有的現象，反對文言文，就是反封建復古運動的一翼，現在需要

的是從實際工作著手，痛快地向大眾宣布文言文在五四以後的罪狀，要向文言文的堡壘進攻，用具體的戰術，一步一步地佔據文言文底地盤。要在教育家，著作家，大中學生裏面發動各種反對文言文的運動。當然，就是完全佔領了文言文的地盤，也不能斷定反封建復古的鬭爭已經完全勝利，然而反對掉了文言文，就是毀掉了封建精神所寄托的最毒的僵屍，削弱了封建勢力底傳播力量，使反封建的工作容易開展也就是反封建工作底部份勝利。反對文言文在討論中是最爲一致的一點，只有很少的人，對它作了過低的估價，忽視了使它復興的基礎，以爲它對大眾的解放運動，只是一點輕微的阻力，縱然有人硬裝進青年腦子裏，也一定會吐棄出來；以爲提倡讀經的時代已不會再來，要青年學文言文，不能收多少效果等等，在論爭中已經得到正當的克服。

第三大眾語跟白話文 在這次論爭當中爭得最劇烈的是白話文的估價。有人以爲大眾語跟白話沒有甚麼分別，另外的人則以爲白話是買辦資產階級用的筆頭語。因爲估計的不同，對於白話的態度也就相差很遠。建設筆頭用的大眾語，應該不是跟白話分開的，也不就是白話，而是基於各地大眾底實際需要，各各把口頭語變成筆頭語的多元的東西。白話文固然有和買辦資產階級乃至封建殘餘相通的一面，但也有和大眾相通

的一面。在形式上，白話文底基本的語彙語法，也是大衆口頭語底基本的部份。在內容上，白話文現在創造了不少的進步的作品，是理論翻譯文的唯一工具，應該提高白話文裏面合乎大衆需要的部份，消滅不合乎大衆的需要的部份，在實際中揚棄白話文。大衆底生活需要是統一的，大衆語一定會一方面提高或加多和白話相通的成分，一方面獲得更多的了解者，部份地部份地在白話裏面爭得地位，部份地部份地把白話變成自己底東西。總之，說白話就是大衆語固然錯誤，籠統地反對白話也是不對的。隨著大衆底反帝反封建的，國民經濟改造的發展和勝利，白話，一方面部份地部份地被大衆語征服，成爲大衆語底源泉之一，一方面漸漸被大衆語所充實所揚棄，成爲高級的大衆語底前身。

第四大衆語跟土話 關於土話的問題，在這次論爭中，也有許多不同的意見。反對提倡土話的人，最大的擔心是恐怕引起鄉土觀念，助長落後意識，妨礙吸收外來文化，阻礙統一的大衆語底發展，甚至說它使中國變成幾個國，這些意見，都是不正確的。建設大衆語並不是建立一種全國大衆通用的口語，而是把各地大衆底口頭語變成筆頭語。如果要從各地大衆底口頭語建設筆頭用的大衆語，要建設帶有大衆底土底氣息，汗底氣息，能够充分傳達大衆底生活需要，表現大衆底生活色彩

的大衆語，一定不是一元的國語式的東西，而是各各以當地的大衆爲對象的多元的發展。實際的文化鬭爭工作，曾產生以各地底大衆爲主要對象的大衆語作品。這些大衆語作品，一方面各各適應了大衆底需要，一方面包含了向更高的大衆語發展的成份。將來會有一種由各種土話溶合或匯合而成的統一的大衆語，那也不能從天上掉下來，也應該儘量使各地的土話發展，使它們更能够成爲統一的大衆語底構成要素。大衆在文化水準逐漸提高的過程中，理解力一定會加強起來：他們不但說自己底土話，用自己底土話寫文章，還要借那自己底土話中間所沒有而存在於別處的土話中間的特別的話來說話寫文章。土話作品，正適應了大衆底這一需要。並且土話通過了作者底表現，會使原來不懂得的人都容易懂而收到整理土話，使土話逐漸消失其偏僻性，逐漸打破土話跟土話之間的隔閡的統一土話的效果。

第五大衆語底紀錄問題 建設大衆語，既然是把口頭語變成筆頭語，那末，應該用甚麼符號來寫呢？中國底方塊字，前面已經說過，是最難學的象形字，單音字，是整個封建精神寄托的所在，同時跟大衆底關係又非常少，要大衆來學習這種難學而有害的東西，是不可能的。因此廢除方塊字改用拼音字就成爲大衆語建設的必要的條件。關於中國話底拼音化，過去已

經有國語統一籌備會的注音符號跟國語羅馬字。注音符號因爲不能忘情於方塊字，結果成了非驢非馬的怪物而又不便書寫，國語羅馬字，又因爲要嚴格區別四聲，拼法非常煩雜，據說知識份子也須兩三年才能學會。現在最容易學的拼音字，有蘇聯遠東邊疆拉丁化委員會創製的‘拉丁化中文’只要二百八十點鐘到四百點鐘就可學會看書寫信，伯力海參崴的華僑正在用這種新文字做著廣大的文盲掃除運動。這一事實的教訓，大衆語建設，國內文盲掃除也只有改用拉丁化的寫法，擴大拉丁化運動，按照全國幾個土語中心區製定拉丁字母，發展下去，大衆語建設問題，才得到正常的解決。至於大衆中已經認識多少方塊字的人，固然要他們學習拉丁字母，同時寫簡筆字跟別字，也是一個過渡時期中的辦法。當然，目前拉丁化運動，一定會有許多的非難和打擊，應該用最大的努力去推行。

以上五點，是這次論戰中最主要最具體的問題。其它涉及到的，似乎沒有詳述的必要。今後的實踐，必然是跟大衆爭取生存與自由的鬥爭取著密切的聯繫。因爲這種鬥爭是團結大衆，充實大衆底生活——卽是創造將來成功的大衆語的前提和條件。真正的大衆語底完全勝利必然要在大衆的鬥爭完全勝利以後，但是現在多努力一分就是增加一分它底成功的條件，我們必需廣泛地創設和擴大大衆語教育的工作，多方面來

提高大眾文化水準，切實地到大眾中去學習，這是直接間接團結大眾，幫助大眾鬭爭，同時又是促進大眾語運動的工作。大眾語運動，有著光輝的偉大的前途。

一九三四，一二，五。

方塊字·別字·手頭字

林語堂先生把‘有時過客題詩，山門繫馬；竟日高人看竹，方丈留鸞’，點成‘有時過客題詩山門，繫馬竟日；高人看竹，方丈留鸞’（見新語林創刊號）。劉大杰教授標點的袁中郎全集，單就最初出版的一冊，經曹聚仁先生指出來的錯誤，爲數已很可觀。最有趣的是，有幾句話，劉先生不懂，還叫曹先生用白話翻出來；曹先生也就翻出來，刊在某報副刊上。反對文言文的人們常常說，文言文底壞處，在於一般人看不懂。但這理由，還不足以說服擁護文言文的人們；因爲擁護文言文的人，根本就沒有要一般人懂。現在我們進一步地說：文言文，不但一般人

看不懂，就是頂頂大名的學者，文學家，有名刊物的編輯主任，大學教授像林語堂、劉大杰兩位先生也看不懂。如果林劉兩先生是反對文言文的，平常不看文言文的，那末，不懂還不足奇；現在林劉兩先生是擁護文言文的陣營中最新的角色，他倆用最巧妙的方法在擁護文言文。以這樣的角色，卻公然把文言文點得一塌糊塗，並且公開地表示不懂文言文，叫人用白話翻譯，即解釋給他看！就林劉兩先生個人說，自然，這是一樁不很體面的事；但就全體說，卻是個很好的現象。難道連擁護文言文的學者教授都不懂或不很懂文言文，還不足以說明文言文真正到了末日，簡直無法挽回了麼？

不過現在的問題，不是要證明文言文到了末日沒有；重要的是，怎樣才能澈底肅清文言文底餘毒。沒有方法辦到這一層，那就任你白話也好，大衆語也好，文言文那老太婆，總會巧裝打扮，混進你們旗袍高跟鞋的少女歌舞團的。五四以來的白話，如今受到了許多非難，就是個很好的例子。要澈底肅清文言文底影響，固然應該有種種辦法；但首先第一，應該是廢除方塊字，用拼音字來代替。

原來方塊字是不能跟文言文分開來說的。第一，中國幾年來的文言文都是用方塊字寫的；第二，方塊字最適宜於寫的文章只是文言文；只要方塊字存在，文言文是斷不會絕跡的。第

三，方塊字雖然可以巴巴結結地寫一點書面的白話文，卻斷不適宜於寫口頭語。反對大衆語的人們一致地喊：‘拿貨色來看’；我要回答他們，方塊字一天不廢除，真正的大衆語貨色不會有的。方塊字早把那些貨色在娘肚子裏就殺死了！

第一，第二兩項，淺而易見，不必多說；現在我想以一個作者的資格來說說第三項。

我寫過幾篇小說。在小說中我一貫地盡量用口頭話寫。但是每一個忠於口頭話的作者，都應該有同樣的經驗：百分之百，不，百分之五十的口頭話作品是不會有的。爲甚麼呢？因爲許多口頭話底詞彙，不能用方塊字寫出來，方塊字不够用。起初我也想，大膽地創造新字。但是朋友，一個作者並不是萬能博士，能寫小說，不一定同時能夠創字或編字典。卽算勉強可以，活的口頭話，也決不是死笨的方塊字所能表得出來的。舉兩個淺近的例子：

1. 亞歷山大 宋思妥夫思基 煙士披里純（或因斯筆力順），試把這說給一個外國人聽，誰能懂？費了這麼多的力量寫出這些字，還表不出原來的音，豈非戴起確窠唱戲——吃虧不討好？

2. 甲：您上哪兒去？ 乙：玩兒去。‘哪兒’跟‘玩兒’，究竟是應寫一個字還是寫兩個字呢？寫一個字，表不出那

一點點兒‘兒’的音，已經不是口頭話；寫兩個字，那一點兒‘兒’的音，又表出得太多了，仍舊不是口頭話；並且安知天下後世沒有人把‘玩兒’當作玩兒子解呢？

此外還有：我們現在一塊塊地記字，記了幾千，已經够麻煩的了；再要添字，不怕增加讀者腦筋底負擔麼？要知道，越要記得方塊字多才能看書，能看書的人只有越發減少的。這就說明：爲甚麼五四以來的白話文中保存着那末多的文言文成分；爲甚麼真正大衆語貨色一時拿不出！

不過，方塊字既然是跟文言文分不開的；現在文言文已經到了末日，方塊字底情形又怎樣呢？有人說，它跟大衆底生活密接着；但另外的人卻說，中國等於沒有文字。從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文盲這件事看起來，說方塊字跟大衆密接，實在是有意無意地造謠。撇開文盲大衆，單就能夠進學校的學生說，方塊字底運命也悲慘得很！

去年十二月十二日，民報副刊，有一篇煙橋先生底中學生的私生活與寫別字問題；同月十四日，晨報副刊，有一篇陳友琴先生底中學以上的學生應該寫別字嗎？這兩位先生都不主張寫別字。不過理由可找不出。只有陳先生有一句‘中學以上的學生，還不免於寫別字。這實是國家的奇恥大辱’，意思很不容易明白。兩位先生都把寫別字歸咎於學生無出息，一點兒

也不提到方塊字本身有沒有缺點，立論是很巧妙的。我不願意批評兩位先生底文章，只想借他們底話來證明方塊字在學生中間是怎樣的情形。

陳先生說：

今日的中學生，對於文字的觀念很浮淺，字體的正確與否，尤易模糊，翻開課卷，胡亂湊成的離奇字兒，真是改不勝改。偶將某校高中學生的課卷，抄其常寫的誤字，先分兩類，列表於下……

(1) 以音同而訛誤者(例二十六條，略)

(2) 以形似而訛誤者(例二十條，略)

煙橋先生說：

從前科舉時代，字體是很講究的，因為寫了別字，於功名有關……學校裏就馬虎，所以別字連篇，連大學生也不能免……學生們的觀念很浮淺的，對於字的辨認，最容易模糊，我記得一個‘機’字的寫法，曾經向學生們說過六七遍，但是還有好幾個要寫錯……還有現在的學生喜歡用鋼筆——並且以自來水筆為更多——因此字體的間架結構，更不能語於中學生了。

明白了吧：方塊字不但跟大眾沒有關係，就是‘中等以上的學生’，對於它的‘觀念’也‘很浮淺’，‘胡亂湊成的離奇字

兒，改不勝改’，一個字底寫法，‘說過六七遍，還有好幾個要寫錯’，它底‘間架結構’，已經‘更不能語於中學生了’！記住，方塊字是不能語於中學生的！就是說，更更不能語於小學生，更更更不能語於大眾！

就現在的學制說，小學畢業要六年。讀了六年書，當然，寫字問題，談也不要談起！中學畢業，是再加上六年。從七年到十二年的長期間，我們底國文老師，還不能跟他底學生談字底間架結構，或者學生從第七年到十二年中還聽不懂字底間架結構；如果不把中國學生，想爲老天爺特別打發下來的一批蠢材，就只好怪方塊字那東西太高不可攀了！有這種讀十二年書還不能談的方塊字，這樣的方塊字還未廢除，‘這實是國家的奇恥大辱’！

煙橋先生說得好：‘從前科舉時代……因爲寫了別字於功名有關’，寫別字就會影響一個讀書人底生活。現在呢，已經不是‘從前科舉時代’了，縱然再有科舉的鐵鍊，也未必能鎖住現在的學生，學生們寫不寫別字，已經不‘於功名有關’，生活不發生影響，任你國文老師講一百遍，教育家寫一百篇文章，教育行政機關下一百道訓令，新時代的學生們，還是要自由地‘胡亂湊成’些‘離奇字兒’出來，一直到他們學會了方塊字底代替物的時候。讀十二年書的中學生是這樣，讀六年書的小學

生只有這樣，讀三兩年書的工人農人小商人們，更天公地道地不能不這樣。如果方塊字跟一部分的大衆有多少關係，那關係是全靠別字（還有省筆字）維持着的！寫別字已經成爲方塊字底不可挽回的運命。

但是現在有人提倡寫別字，他們底主張怎樣呢？據我看，別字是每天都不知有多少人在寫的，特別說來提倡，無非教我們直接間接多少受過‘科舉時代’的‘恩惠’，僥天之倖，已經能够不寫別字或少寫別字的知識分子：第一，寬容大衆無心寫出來的別來；第二，爲了要大衆比較容易看懂我們寫的文章，不妨有心寫些大衆所常寫常見的別字。它並不是終極目的，不過是使高不可攀的方塊字比較接近大衆的手段之一種。大衆能自由運用以發表意見的文字，根本不能是方塊字，寫別字不過在過渡期間，可以發生相當作用罷了。

和提倡寫別字的用意同樣，最近手頭字推行會提出的手頭字推行辦法，是值得推許的。所謂手頭字，就是不但大衆手頭，就是我們知識分子手頭也常寫的省筆字。但是手頭雖說這樣寫，書本上卻不這樣印。讀書的人對於許多方塊字就要同時記住兩種以上的形態——手頭的跟書面的。方塊字本來就多，一個字又有幾種形態，雖然不能就說是全體方塊字用幾來乘，但增加記住方塊字的困難是不成問題。大衆語有一個最基本的

原則，就是照口頭話寫。照口頭話寫有很多好處，內中有一個是，不照口頭話寫的文言文（或白話文），雖然簡單，卻難懂難學難記；照口頭話寫，雖然複雜，卻容易懂容易學容易記。但是照口頭說的話寫出來了，如果不照手頭寫的字印出來，在我們已經成為知識分子了的人也許不成問題，記得方塊字很少的大眾，卻不能說不感困難。所以手頭字底原則，就是照手頭寫的字印。手頭字推行開了，受實惠的不僅是大眾，就是對於知識分子也有許多幫助。因為我們現在不但要記住那些一筆不苟的方塊字底印刷體，還要研究簡省的方塊字底手頭寫法。我們應該承認，我們用過許多工夫‘臨’那楷書行書甚至草書的字帖。那些工夫是冤枉花的。如果手頭字跟印刷體統一起來，就不會有甚麼楷行草的分別，而免掉許多學習的麻煩。現在推行着的手頭字，就可以盡那逐漸打倒楷行草的分別的任務的。對於知識分子尚且有這樣大的幫助，對於大眾，不用說，更是會解除許多讀書的困難了。不過手頭字也只是方塊字還存在的時期中的一種使它比較接近大眾的辦法，到了方塊字底代替物風行起來的時候，就會成為完全無用的東西。

從大眾語到提倡寫別字跟推行手頭字，表面上看來，好像是退縮了若干步；其實不然，大眾語跟方塊字底代替物，都不能從天上掉下來，我們就不能不運用一切的手段去爭取它底

實現，同時大衆語運動，必需大衆自己來參加；要大衆來參加，必需使文化跟文化工具比較容易爲大衆所接受，使大衆文化水準比較地容易提高，如果方塊字不是跟全體大衆全然絕緣，如果方塊字底代替物不是今天就可以普遍，提倡寫別字跟推行手頭字，使方塊字變得容易一些，對於一部分的大衆是很有用處的。別字跟手頭字都將成爲葬送方塊字的有力的工具。

三，一〇，一九三五。

一九三五年的中國語文運動

中國底語文運動，一開始就是連同文章底內容一齊提出的，決不是像黎錦熙之流所說，只是個形式的問題。文章底內容，一開始就帶着充分的功利色彩，被規定作為工具或武器而提出的，決不是像周作人之流所說，文學有什麼‘載道’‘言志’兩派。新文學是屬於‘言志派’的。

五四時代的白話文，是和那時的新文學運動分不開的東西；那時的新文學卻以反封建意識為主要內容。以後屢次的文言和白話的鬭爭，乃至大眾語和文言及文言式的白話的鬭爭，無非新文化和舊文化的鬭爭，封建勢力和民主勢力，特權者和

大眾的鬭爭底反映。

一九三五年的語文運動也和從前一樣，不過已經發展到更高的階段了。

我們不會忘記：作爲一九三四年的大衆語論戰所引起的反動；作爲整個復古運動底理論基礎的，是‘存文會’底出現和十教授建設中國本位文化的宣言底發表。存文會擁護汗字，主張恢復文言文；十教授底中國本位文化，無非以中國固有文化即封建文化爲本位而排斥（雖然他們說的是‘採取’）其它。存文會底意見說明了十教授底主張所需要的形式，十教授宣言規定了存文會底主張底內容，它們原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東西。

存文會和十教授以前，有禁止男女同行，提倡良妻賢母之類的事實，並且愚夫愚婦底迎神賽會，天師活佛底羅天大醮和金剛法會都成了救國良圖；同時盛大的祀孔大典又在皇皇明令之下舉行了。由於這些事實所暗示或由於以前更多的同類事實所暗示，在書業商方面，有大規模的舊書底翻印。四庫什麼之類不用談，凡是用方塊字寫的，已經被忘記或沒有被注意過的書，無論是什麼性質，無論是什麼體裁，差不多都被翻印出來了，以極便宜的價錢推銷到全國無論怎樣偏僻的地方。這就是說無論怎樣封建的讀物下流的讀物都送到全國讀者底面

前了。這是一架山，一座萬里長城，是用幾千幾百年以前的陳死人底屍骨堆積起來的，它要堵住全國大眾走向新的文化生活的路。這一可悲的事實，是被當局所允許或獎勵的。

然而這一事實，在存文會和十教授以前，只限於吸血獸一樣的書業商，他們沒有通過文人學者，沒有任何理論根據，不過眼明手快在濃厚的復古空氣中趁機發財罷了。到了存文會和十教授出現，他們底事業才隨同整個復古運動一齊得到合理的解釋。因為他們翻印的那些東西正是中國固有的，正是用汗字寫的，而且大多數正是文言文。不過這時候，存文會和十教授只是翻印舊書的書業商底代言人，並沒有自己變成書業商，也沒有發宣言擬計畫打出種種漂亮的招牌運用種種巧妙的辦法來直接翻印舊書，更沒有彰明較著地一口咬定那些下品的封建文學色情文學是世界名著或偉大的創作。這存文會和十教授所不做或不能做的事情，新文學的健將鄭振鐸先生一個人在‘世界文庫’上完全做了。鄭振鐸使翻印舊書的事由書業商手裏轉移到文人學者手裏，使文人用舊書騙錢成為風氣，連施蛰存之流都找到了‘新’的出路，使什麼‘珍本叢書’充斥書肆，要看極淫穢的‘足本金瓶梅’，只消向某書店訂閱叢書若干種或索取某雜誌公司另印的贈品就行了。

我們知道鄭振鐸在新文學運動上有着悠久的歷史，在十

教授宣言發表之後，又表示過相當進步的態度；在幾次反復古運動的宣言中也都有過他底簽名。我們似乎不能輕易把他底世界文庫和普通書業商底翻印舊書乃至存文會，十教授底高論相提並論。但是這些事實，最多不過說他或者不是意識地爲書業商和存文會十教授服務，卻不能因此減少客觀上任何可能的效果，反而正因爲他有着光榮的歷史，有過進步的言論，正因他把那些舊書和真正的世界名著弄在一起，借世界名著底聲譽，借那些譯者在讀者中間的信用，沉默地說明了金瓶梅之類的封建文學色情文學是和吉訶德先生死魂靈一樣的偉大作品，使一般守舊的人，使存文會和十教授都振振有詞地說：‘瞧，連你們所謂新文學或新文化運動的健將鄭振鐸都說中國的舊文學是世界名著，偉大作品。足見中國固有的文化或文學底可貴是鐵一樣的事實。中國有這樣多的世界名著偉大作品，足見中國固有文化是世界最優勝的文化，不但中國應該建設中國本位文化，就是世界文化也應以中國文化爲本位。同時那些中國固有的世界名著偉大作品，都是用汗字寫的，絕對大多數是用文言文寫的。汗字和文言文既能產生這許多的世界名著偉大作品，足見汗字應該擁護，文言文應該恢復’。這樣由鄭振鐸提供了無比的實證，存文會和十教授底理論便十分圓滿，那般年來翻印舊書，在文化運動上犯了彌天大罪的血吸獸都轉而

成了最熱心的文化倡導者了。讀者方面不用說也正因為信仰他底歷史和言論，可以毫不戒備地接受他底任何給予。這樣，如果有人說他是十教授以外的‘第十一教授’，我們也很難爲他辯解。

不用說從吸血獸似的書業商到存文會十教授乃至‘第十一教授’，這一系列的倒行列車，他們底企圖無異是使中華民族自絕於高度文化。必然爲廣大的覺醒了的大衆所唾棄，可是也必然會爲被中國傳統文化所麻痺朦混了幾千年的無智的大衆所接受。它所能發生的影響，那影響裏頭所潛伏的危機，是每個進步的中國人所不能忽視的。一九三五年的語文運動，正是瞄準了這一系列的倒行列車而發出的狙擊。

首先應該提出的是由十幾個文化團體一百幾十個作家在七月間發表的‘我們對於文化運動的意見’：

“我們相信救國不必讀經，讀經和救國沒有關係……十三經只是古代一部分著作的結集。抱着二千多年前古人的著作以爲熟讀了便可以救國，若不是相信那經書有通天的魔術的作用，便無法解釋這可笑的舉動。

同時我們相信民族自救的責任不是少數人所能擔負的，必須大衆來通力合作。怎樣普及知識於大衆是今日最重要的問題。所以我們對於改革汗字的運動覺得是必要

的。

我們相信文字和文化運動有極密切的關係，文言文或古文早已走上了末路，那些僵硬了的文章組織實在不足以表現現代的生活。依照口頭語寫成的‘國語文’在修詞學上看來，其精密詳密的程度比較文言文進步得多，決不是淺陋苟簡的東西。”

這意見書正針對着存文會和十教授底主張。

可是這些意見是很不夠的。第一，它只是消極的反抗，完全沒有指出中國新文化底前途應該或必然是什麼。雖然全文上有‘向維新的路上走去’一句話，可是因為‘維新’這名詞本身底曖昧，意見書又沒有加以一個字的解釋，不但和沒有這句話沒有分別，並且可以容許各種不同的曲解。第二，對經書的估價太低，僅僅說‘讀經與救國無關’，經書沒有‘通天的魔術的作用’；卻沒有指出經書裏頭所包含的思想如何不適用於現代生活，如何足以妨害現代生活。它雖然‘與救國無關’，卻斷乎與害國有關；雖然沒有‘通天的魔術的作用’，卻斷乎是有組織，麻痺大眾的作用的。如果以為經書與救國或害國都無關，又沒有任何作用，就是承認讀經也無甚妨害。讀經無妨論和讀經救國論底距離是有限的。第三，對於汗字也只籠統地主張‘改革’，而不敢說‘廢除’它，用新文字來代替；作為和文言文對

抗的東西，又止提出了抽象的所謂‘國語文’。這意見比先一年大衆語論戰顯然表示了不少的退步。第四，是自己底陣容不整飭。發表意見的人中間甚至有‘第十一教授’鄭振鐸底名字。因之這意見書完全忽視了翻印舊書和存文會十教授的聯繫，忽視了鄭振鐸和他底‘世界文庫’爲存文會十教授所盡的任務。以致雖然反對讀經，卻默認了廣大的讀者在那讀經以外的，由吸血獸到鄭振鐸所翻印出來的無數的封建讀物色情讀物的事實。總之這意見書沒有把歷來語文論戰底成果尤其是大衆語論戰底成果，弄成自己底東西，是它主要的缺點，它只作爲十幾個文化團體和一百幾十個個人底集體意見，作爲在發表意見把意見弄成印刷品都極端困難的時機中的呼聲，才顯出它積極的意義。

給存文會十教授乃至‘第十一教授’以事實的答復的是這一年的手頭字運動，通俗文運動和新文字運動。

手頭字運動是由兩百個作家十五個文化團體所發起的。他們底‘推行手頭字緣起’發表於三月間的各種報章雜誌上：

我們日常有許多便當的字，手頭上大家都這麼寫，可是書本上並不這麼印。識一個字須得認兩種以上的形體，何等不便。現在我們主張把‘手頭字’用到印刷上去，省掉讀書人記憶幾種字體的麻煩，使得文字比較容易識容易

寫更能够普及到大衆。

同時提出了三百個手頭字作為第一期的字彙。

這運動曾引起相當的注意。由於它本身所包含的改良色彩容易為當局採納，使教育部也在手頭字運動興起之後來了個推行簡筆字的命令。

手頭字運動如果作為大衆語運動樹立了理論基礎之後的一個比較注重實際的問題而提出，作為暴露汗字底缺點打破汗字尊嚴的運動，它是有不可抹煞的意義的。它底缺點在於沒有拋棄汗字，很容易使人誤會它雖然要‘改革’汗字，同時卻擁護‘改革’了的汗字底存在。其實手頭字運動本身並不是終極目的，只是從汗字到新文字（拉丁化）的過度中的一個擾亂汗字陣容的手段。這任務就決定它沒有遙遠的前途。所以‘手頭字推行會’不久就變成‘中國語言學會’，並且現在連中國語言學會也不知所終了。

和手頭字運動同樣是注重實際問題的通俗文運動，是由‘讀書生活’‘生活知識’‘通俗文化’‘生活教育’‘婦女生活’‘漫畫和生活’‘客觀’‘中國農村’等幾個刊物發起的。是從辦刊物的實際經驗中產生出來的。這運動從它底名字所表示，是比較注重文章技巧，通俗，容易懂的技巧的。可是不能忘記：內容底大衆化，適合讀者大衆底需要，是這運動底前提。不是這

樣，這運動就不能產生，就算能產生也沒有什麼意義。通俗文運動只有把大衆語論戰底成果收歸己有，並且和新文字運動合流才有遠大的前途。現在這運動還只剛剛開始，我們會看見它底發展的。

或者說，既然有了新文字運動，通俗文運動豈不是可以不要了麼？新文字一普遍，用新文字寫出來的文章，沒有不通俗的可能，還有什麼通俗不通俗的問題呢？這話自然有相當理由；可是在新文字還未普遍的現在，在文章和口頭話還有遙遠的距離的現在，作爲新文字運動底別動隊，縮短文章和口頭話底距離，使新文字普遍的可能性加大，汗字在文章中的效用減少，通俗文運動是不可少的。就是新文字普遍了的時候，相當時期以內，寫文章這件事恐怕還是少數知識分子底職業；這些文章職業家一定有不少的人是從漢字時代培養出來的，是寫慣了汗字文章的，在那時候縱然不能不儘力地寫得通俗，卻難保不保留着多少汗字時代的惡影響，讓那些惡影響擴大到新文字的文章裏頭去。現在新文字刊物上用新文字寫的文章，常常有不很容易懂的地方就是最好的證據。通俗文運動不但在汗字時代給那些寫文章的人以適當的訓練，就在新文字時代也可以訓練他們。通俗文運動並不是有了新文字運動就可取消的東西。

不過通俗文運動和手頭字運動，一眼看來，所注意的都是形式問題，雖然裏面隱藏着內容問題，卻並不十分明顯。對於存文會底主張（擁護汗字，恢復文言文）固然給予了相當的回擊；在對於十教授宣言和‘第十一教授’底實驗（以中國固有文化爲本位，翻印舊書宣揚固有文化）的場合卻不容易看出直接的，正面的衝突。它們在整個語文陣線上都只算擔負了一部分較小的任務。尤其是手頭字底不徹底性，規定了那運動不能有長期的支持和遠大的發展。

新文字運動和手頭字或通俗文運動都不同，它不是個臨時的手段，也不是局部改良，更不僅是一個技術問題；它是中國文字底根本革命。不僅是形式問題，而是從形式到內容一系列的各種糾紛底總解決。有了新文字誰還把汗字當作什麼呢？誰還寫文言文，寫了誰又懂得呢？誰還去讀經或經以外的‘王右丞詩集’和蘇軾底文章（世界文庫）呢？同時新文字底普遍，一定增加中國文化向國際文化水準發展底速度，那時候縱然封建文化底支持者們把經書翻成口頭話了用新文字印出來或把金瓶梅拼成新文字，那經書或金瓶梅在生活在高度文化中的人看來，不是仍舊不懂就是什麼也沒有的。一個將來的中國人，誰要看從‘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翻出來的詩句，從‘粵若稽古帝堯曰放勳’翻出來的記述，以及從‘毋不敬儆若思’翻出來

的教訓呢？更有誰看那‘玉莖’‘陰戶’‘一洩如注’‘連呼達達不止’的描寫呢？新文字在語文陣線上是個堅強無比的坦克車，它底輪齒會把它底敵人和敵人底一切嚼得粉碎。

新文字運動就是主張廢除十惡不赦的汗字，用拉丁字母記錄中國話的運動。因為汗字是少數特權者底工具，世界上所有的文字中間最難學的一種，它須要十幾年的學習和修養才能自由運用，因之和絕對大多數的勤勞大眾是絕緣的。在中國文化必需向國際水準發展，必需廣大的大眾來參加，支持的現在，廢除汗字有絕對的必要，問題是用什麼東西來代替。拼音文字是老早的呼聲，注音字母和國語羅馬字底出現也有很久。可是注音字母仍舊未脫汗字底形態，不適合於拼音連寫，並且是從各國文字孤立的，不便吸收必需的外來語言。國語羅馬字因為注重四聲，雖然比漢字容易，卻也保持了不少的學習上的困難。又因為和注音字母一樣是統一國語的工具，和大眾底實際生活沒有關係，也和注音字母一樣不能為大眾所接受。新文字沒有注音字母國語羅馬字所有的任何缺點，它是拼音字中最容易學會的一種，又是從和大眾實際生活有密切關係的土話底拼音化出發的，所以容易為大眾所接受。在蘇聯的華僑中早已有了幾千工人學會了新文字，早已有了許多新文字的報紙雜誌和書籍。可是在國內，到了大眾語論戰發生的時候，它

才被正確地認識；這運動底具體化到一九三五年才剛剛開始。

現在，新文字已經有了北方話，上海話，寧波話三種方案。關於新文字的已有‘上海拉丁化研究會’出版的拉丁化底理論原則方案文盲課本，天馬書局出版的拉丁化概論拉丁化課本（以上均葉籟士編著）拉丁化檢字（應人編）門外文談（魯迅著）等。專門研究新文字的刊物有上海的‘新文字月刊’，北平的‘新文字半月刊’，太原的‘拉丁化半月刊’。經常刊載關於新文字的文章或闕有專欄刊載用新文字寫的文章的刊物更多，上海的‘生活知識’‘讀書生活’‘客觀’‘婦女生活’‘通俗文化’‘漫畫和生活’，天津的‘北調’，太原的‘文藝舞臺’等都是。組織方面上海已經有了新文字座談會和研究會及學習班，幾百個文化工作者在爲新文字活動着，不少的勤勞大衆在學習它。這些組織，不久就要向全國各地擴大開去，最近的將來一定有大規模的發展。至於各地單獨的自發的運動，雖然無法統計，實際卻比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還要熱烈，還要普遍。因爲新文字是從大衆生活需要產生出來的，是大衆底文化工具，它能够把幾萬萬一向住在文化國土以外的大衆從無智的深淵中解救出來，所以必然會爲廣大的大衆所擁護，必然會成爲大衆自己底運動，而且必然會將得到預期的勝利。

總結以上所說，一九三五年的語文戰線，一方面是以‘第

十一教授’鄭振鐸爲出色代表，利用他過去在新文化運動上的歷史，利用他現在在出版界的地位，利用他相當的書業經驗，並且利用西萬提斯，戈果爾等作者和魯迅傅東華等譯者在讀者中的信仰，巧妙地做出了最大的宣揚封建文化色情文學的工作。另一方面是以新文字運動爲最高表現，而新文字運動因爲承繼了歷來語文論戰的成果，澈底地解決了一切糾紛，因爲是從大衆生活需要中產生出來的，是大衆自己底最好的文化工具，爲無數的大衆所擁護，它必然會粉碎任何封建文化支持者底任何陰謀。這鬭爭無疑地已到了空前尖銳的程度。當然我們不能說新文字運動在最近期間就一定通行無阻地得到飛躍的進展；因爲文化運動不能是孤立的存在，倒是和整個社會運動相連接相配合的東西。如果主導的社會運動沒有得到完全的勝利，文化運動也是不能得到完全的勝利的。新文字運動現在還只是一個苦難的開始。前面說過，語文論戰無非是新文化和舊文化的鬭爭，是封建勢力和民主勢力，特權者和大衆的鬭爭底反映；這新舊兩方面的鬭爭，如果不是舊勢力完全倒臺，是不會終止的。在一九三六年會看到更精采的武劇。

“國語運動史綱”

我讀完了國語統一運動的老將黎錦熙先生底國語運動史綱。

這是一部並不算很小的書。序文就有一百幾十頁，正文四百幾十頁。正文共分四卷，國語運動也分爲四個時期。第一卷爲‘緒言’和（一）‘切音運動時期’，（二）‘簡字運動時期’；第二卷爲（三）‘注音字母與新文學聯合運動時期’；第三、第四兩卷，爲‘國語羅馬字與注音符號推進運動時期’。全書從一八九二年盧戇章底‘切音新字’起，到寫這部書的時候一九三四年止，共敘述了四十二年的史實，列舉了‘教育法令’二十五件；

‘重要論文函牘’七十四件，牽涉到的古今中外的有名人馬連作者自己共六百二十幾人，有六十二頁上有作著自己底名字，佔登場次數的第一位（詳索引）。從這部書上，我們可以知道四十年來的國語運動底情勢，可以看見這一運動的參加者底各種各樣的見解，並且還可以得到在別的地方不很容易得到的重要的文獻等等。

雖說這樣，這本書卻不能使人讀了之後感到滿足，它有着作爲一本歷史書的最重要的缺點。

作者黎先生說：‘四十年來的國語運動，是把“工具”的改進問題作中心的……國語運動乃是根據着專科學理而發生的一種實際運動……其本身只是些實際問題，實際以外，用不着那些很廣泛的理論，牠底理論就包括在實際的過程中’（序，頁一一五——六。）最近又在一篇論拉丁化的中國字母（見二月二十五日世界日報副刊）上說：‘我只能站在技術的立場來說話，完全離開政治的立場’。這些話，都表白着黎先生對於國語運動的根本理解。這一理解是很難得到讀者底同意的。因爲所謂國語運動，絕對不僅是‘工具改進’或‘技術’之類的‘實際問題’，絕對不是‘離開政治的立場’，或‘不需要那些廣泛的理論’所能講得通的。

從盧齋章底‘切音新字’製成的那年（一八九二）起，倒數

上去恰恰半個世紀，正是南京條約訂立的那年（一七四二）。南京條約是‘鴉片戰爭’的結束；爲了鴉片戰爭‘最初的歐羅巴之族’才飄颻到中國境內來。從此以後，不但接二連三地有許多辱國喪權的不平等條約，並且還有‘髮匪’，‘捻匪’，乃至以後的‘拳匪’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變亂。這樣，一方面是中國的封建經濟已經到了日暮途窮的時期，本來不能保持着原有的安寧秩序；另一方面是帝國主義的炮艦政策衝破了中國的海禁，基督教，鴉片煙，攜帶着工業品，長驅直入地湧進中國內地，加速了農村手工業底崩潰。於是由一部分進步的封建地主蛻化而來的，在封建社會已經有了相當成長的市民階級才恍然大悟：中國原有的腐敗的封建的政治，決不足以圖存，才高叫出種種改革的口號，發動種種改革運動。廢科舉，興學堂，派留洋學生，練水師，開兵工廠，興實業，講洋務……而根本大計則是普及教育。這時候，中國古老的教訓尤其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類的教訓以及整個文化思想，都動搖起來了。‘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雖然現在看起來，‘十教授宣言’高明不了多少，在當時卻不失爲一種代表的思想。因爲既說‘中學’不能‘爲用’，也就無異宣布了‘中學’底死刑，或者說‘中學’本來不過是一種死東西罷了。可是普及教育以及種種改革，都不是一天兩天可以完成的，有許多東西，還須臨時到外國去學，

學會了才能回國來教；不用說也必須有比較充分的時間。這一時間問題，卻是那時迫不及待的改革運動所最苦惱的東西。由於這種苦惱，新起的市民階級才不得不想出一切的補救方法。於是中國文字，才在外國文字底相形之下，被認為改革運動上的莫大的障礙，改革中國文字本身的種種方案就也不斷地產生了。

竊謂國之富強，基於格致；格致之興，基於老幼皆好學識理。其所以能好學識理者，基於切音爲字，則字母與切法習完，凡字無師能自讀……亦即易於著筆。省費十餘載之光陰，將此光陰專攻於算學格致化學以及種種之實學，何患國不富強也哉！

——盧懋章切音新字序見史綱頁——

今全國共二十萬秀才，舉人，進士，比日本五千萬受過普通教育的人民少過二百五十倍。以一敵二百五，還有什麼策略可說？中國政府非注重下層教育不可；欲去下層教育的障礙，非出一種溝通語文的文字使言文合一不可。

——王照底話，見史綱頁三四——三五——

伏惟方今時局，誠可謂危急存亡之秋矣；有識之士，咸思所以救之。以言乎弱，則宜尚武事，然無兵學，無以練兵也；以言乎貧，則宜講實業，然無農工商學，無以興利

也；以言乎人心偷薄，則宜重道德，然無義理之學，無以興民行也；是則興學尚矣。……是故今日欲救中國，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識之字不可；欲爲易識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

——勞乃宣呈簡字講錄摺，見文字的歷史觀與革命論頁三三五——六——

從上面這些話看來，文字改革，並不是什麼‘根據專科學理而發生的’，‘牠底理論’，決不能完全‘包括在實際的過程中’，雖說表面上好像只是‘工具’或‘技術’的問題，實際上從來沒有和內容或意識的問題離開過。因此我們研究它底‘發生’，絕對不能‘完全離開政治的立場’。

以上只說明了文字改革底來源，還要加上語言統一問題，才算整個的國語運動。‘國語統一’也正是市民階級底要求。爲什麼呢？市民階級底成長，必須工商業發達，更必需在交通和運輸的條件上有充分的便利，因此不但需要輪船火車，同時也需要打破那‘老死不相往來’的封建社會的風俗習慣，也就是需要全國人民底語言的統一。國語統一運動，就是這一需要的產兒。‘垂爲定程，通行全國，不得遷就方音，稍有出入’，從那時學部底意見（史綱頁一六）中，可以看得出一點消息來。不用說，這也不是什麼‘根據專科學理而發生’的，也絕對不能‘完

全離開政治的立場’！

國語運動雖然由於社會上某一階級層底需要而產生，在歷史上也有它不可忽視的意義，可是它底發展過程卻處處表露着失敗的痕跡。關於這，史綱上寫得很清楚：

自民國以來爲政府所採用而推行的，就是漢字改換的注音符號運動……但現在並沒有達到牠預期的效果，尤其是民國十九年國民政府那一道總動員令是白下了的——序頁四〇。

當時（一九二二）小學課程標準，還是遵照着民國九年的部令，國語科也有‘首宜教授注音字母正其發音’的規定，但頗遭一部分小學教育家的反對……於是七月間在濟南中華教育改進社第一次大會提出一個‘國民學校初年級應以注音字母代替漢字案’。十月，又在北京小學教育研究會提出一個‘改良注音字母教育法案’……結果是沒有影響。到了次年，學制改革，社會方面新擬的小學國語課程標準竟把初一首宜教授字母的規定取消，反對先教注音符號的小學教育家居然大告成功，而我的運動終於失敗了。——序頁四七〇

到了民國十九年……注音符號遂由中央黨部通過，知照國民政府下‘總動員令，推行全國……然而教育界終

竟低能，不喻其意；以致書業界胡說八道，大違其意，——序頁四八〇|

民國廿一年部頒小學國語課程標準，仍不恢復民國九年‘首宜教授注音符號’的規定，我那方案，前四項最重要、最有效的主張，還是根本沒落；影響所及，推行辦法廿五條都成了具文——序頁五十

自民十五到現在，對於此事，竟成反動時期，把這些（有注音符號的）讀本首冊都一掃而空了——序頁五二

南方各省，因為語文不如北方之為本地風光，所以有些學生的家庭，極端主張仍讀文言文。——頁一四三

但就國語研究會說起，這一舉（全國國語運動大會）可算是最後的‘迴光返照’了。——頁一一五

自此以後，雖有國語羅馬字週刊辦了一年，南京的民衆週刊也有好幾篇宣傳文章，但影響并不大。——頁一八六

試看王照官話字母時代出版的民衆讀物何其多，而現在何其少也！營業化了，或者苟簡化了，而最重要的障礙還是官僚化，故國民政府的命令，遞轉遞飭，終歸是一紙空文。——二五〇

最近三年間的國語運動，表面上沉寂得很，骨子裏的

準備也不見得充分。——二五七

國語羅馬字在國際的宣傳上卻沒有好成績——二九

七

國語運動爲什麼失敗了呢？這是個很複雜問題，這裏還不能給與詳細的解答。不過我們可以說，中國市民階級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卻是它底主要原因。中國市民階級興起的時候，西方的資本主義已經發達到了帝國主義階段，在中國境內已經取得了種種優益的權利。這就給與中國市民階級一個制命的威脅，同時原有的封建勢力，雖然已經病入膏肓，可是它底存在，卻是帝國主義底利益，所以帝國主義就扶植它，利用它，和它結成‘不願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的生死朋友，無異使封建勢力吃了一付起死回生的仙丹。近代中國的政治舞台，演的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雙簧戲’；羽毛未豐的市民階級，在裏外夾攻的形勢之下，只能乖乖地投在它們底懷抱，充充‘插科諷打’的角色。歐洲大戰（五四運動）那樣千載一時的機會，還沒有爬得起來，市民階級底遭際也就可想而知了。遭際既然如此，怎能不喪失那初期的活氣，那想大事改革的雄心呢？縱然還想改革，又有什麼方法實現呢？於是國語運動就成了‘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畸形兒。

據史綱所說，國語運動幾乎完全是歷來教育部底德政。這

表示着什麼呢？第一，這是說雖然在北洋軍閥時代，教育部究竟還比較開明，也可說是最能代表市民階級的要求的機關，所以對國語運動盡了不少的力量；第二，這是說，市民階級因為投到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底懷抱，離開了廣大的羣衆，它底要求，就看不見社會底同情和支持，所以終於失敗。並且，就是教育部本身，在那時的整個政府機關中，也只是最不被重視，最窮，也最無力量的一部分，常常因為整個政局底牽掣影響，對任何改革都不能爲所欲爲，有時候主持者還是完全反對國語運動的章士釗之流，自然更不能對國語運動有什麼幫助。近幾年來，史綱說是‘竟成反動時期’，其實應該有兩種說法。一九三六前後是個大動亂時代，當然沒有人注意到國語運動。最近三五年又正是封建勢力擡頭，復古空氣濃厚的時候，教育部連‘推行簡筆字’的成命都要收回，還談什麼國語運動！

以上是我對國語運動底‘實際的過程’的一點簡單粗淺的考察，不過想說明這‘實際的過程’也決不能‘離開政治的立場’，并且和什麼‘專科學理’很少關係。至於精詳的研究，還需要，‘廣泛的理論’，且留給別的機會吧。這裏且說幾句另外的話。

國語運動已經失敗了，可是史綱底作者好像還以為將來的中國會是國語羅馬字底天下似的，這真是個美麗的夢。市民

階級現在正帶着它底國語運動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一同到它們應該去的地方去，代之而起的是另外的勢力，自然也有另外的語文運動，並且現在已經有了。

提起另外的語文運動，我們不能忘記史綱底作者在大衆語論戰的時候所表示的‘併吞’的態度，他那十九篇短論現在已收進史綱裏作了序言。近來他對新文字運動又說了許多毫無理性的話，現在只舉史綱頁三〇二的話爲例：

謹站在民族的立場說句話：‘難道我們就佇立以待人家的‘文字侵略麼’？……末了站在語文學專科的立場問句話：‘國語羅馬字應該是本國人自己作的好呢？還是外國代我們作的好呢？’

最有趣的是他在序頁一〇三上說：“當中國的國家主義者他們對於文字問題還沒有澈底覺悟以前’……好像很看不起‘國家主義者’似地，想不到在同一本書上，他自己就變成‘國家主義者’了！至於那態度，似乎比五四時代的林琴南先生，還要不客氣一點兒。

末了，‘謹站在’讀者的‘立場問句話’：‘一個不知道歷史從那兒來，又不知道它會到那兒去的人，爲什麼偏要寫歷史書呢’？

一九三六，四，四。

新文字和大衆文學

中國的語文運動差不多有了半世紀的歷史，但到了白話文運動才開始了實際的改革，發生了巨大的影響。不過白話文還只是文章用語底某種程度的口頭話化，只對於語文問題底一部分給予了相當的解決；其餘的問題和白話文本身底更高度的發展，則不能不等候新文字底出現。

五四時代大家都覺得文言文不能表現現代生活，不能滿足現代文化底要求，所以有改用白話文的必要。可是忽略了方塊字是和文言文分不開的東西。方塊字不但難學難記，許多口頭話所常用的詞兒和新的生活所需要的詞兒，那裏頭根本沒

有；同時創造新字又非常困難，因此無論文章怎樣和口頭話接近，高不可攀的方塊字卻先把絕對大多數的人民大眾和文章隔絕了。第二，方塊字存在一天，文章受着方塊字底束縛，就沒有真正和口頭話接近的可能。

專門從文學運動方面來看，五四以來，尤其是五卅以來的新文學底主潮是大衆文學，新文學中間的最好的作品也就是最能够表現大衆底生活，情感和意識的作品，最爲大衆所了解的作品。雖說這樣，到今天爲止的大衆文學實際上還沒有得到廣大的大衆底擁護，並不是每一個有大衆存在的地方，同時也是大衆文學存在的地方。許許多多的大衆還居住在文化的國土以外，還在啼笑姻緣，江湖奇俠傳以及許多更卑俗更陳腐的讀物底影響之下過日子。爲什麼大衆會和大衆文學隔絕得這麼厲害的呢？原因不會止有一個，但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方塊字底難學，大衆沒有這麼多的時間去對付它。

此外，我們應該說真正爲大衆了解的，形式和內容一致的大衆文學，到現在爲止，還不曾有過。在討論‘文藝大衆化’的時候，有人提出土話文學底需要；但是提出者自己就說：‘最大的困難是沒有記錄土話的符號……這一難關未打通以前，土話文學只好不論’（止敬；問題中的大衆文藝）。討論‘大衆語’的時候，有人要求：‘拿貨色來看’。記得我對於這要求說過這樣

的話：‘每一個忠實於口頭話的作家，都應該有同樣的經驗：百分之百，不，百分之五十的口頭話作品是不會有的。爲什麼呢？因爲許多口頭話底詞彙不能用方塊字寫出來。’（方塊字，別字，手頭字）

一天有方塊字存在，大衆就無法接近文學，文學也無法大衆化。

新文字是一切語文問題底總解決，它把文章和口頭話之間的障隔，只要可以撤消的都撤消了——最大的障隔當然是苦惱，朦蔽中國人民大衆幾千年了的方塊字。

不過我們不能忘記：白話文之所以能够取得相當勝利，主要的是在實踐上：第一，和當時的社會運動，比如說，學生救國運動打成一片；第二，各部門的文化工作者尤其是文藝工作者都一齊用白話文寫文章。新文字運動必需而且必然會和目前的救亡運動打成一片的，關於這，我想留給別的機會再說。至於用新文字寫文章，無疑地現在還沒有得到文化工作者底大規模的動員；尤其是在文藝工作者之間，似乎還沒有引起應有的注意。我們堅決地相信，新文字一天沒有被每個作家經常的應用，就不算得到了完全的勝利；作家如果不馬上運用新文字寫文章，就隨時有和大衆隔離，落在大衆後頭的危險——新文字現在正受着大衆底熱烈的歡迎。

白話文運動開始不久，就有了狂人日記，阿Q正傳之類的小說，女神，冬夜之類的詩歌；劇本方面雖然成績欠佳，總算還有終身大事之類的東西；其它理論文章翻譯文章更是層出不窮。由於那些文章，白話文底勝利才得到確實的保證。新文字運動也和這一樣，必需有用新文字寫的種種作品。不錯，白話文中的優秀作品，現在已經或正在用新文字翻譯出來，使它成為新文字的東西；可是我們主要的工作，應該是直接用新文字寫，那些用白話文寫的文章，無不或多或少地受着方塊字底束縛，仍舊和口頭話保持着不小的距離，文法，語彙，表現法一定有許多是只有在方塊字的文章中才有聲有色，一改成新文字就變得索然無味的東西；一定有許多口頭上的活生生的語言沒有被寫出來。這都不是翻譯者或原作者現在來加以怎樣的修改所能補救的。新文字決不是方塊字文章底拼音化，而是口頭的活的語言底紀錄，只有直接用新文字寫的作品多起來，新文字運動才能得到正當的發展。一個極粗淺的例子；阿Q正傳之類的作品，都是直接用白話文寫的，並不是文言文底翻譯；雖說我們現在從白話文翻譯出來的東西，要比五四前後的什麼白話聊齋，白話秋水軒尺牘之類要適合於大眾底需要得多。

然而現在的作家對於用新文字寫文章這件事的躊躇不是沒有理由的。第一，白話文雖然和文言不同，可仍舊是用方塊

字寫的；凡認識方塊字的人，不問對白話文的態度怎樣，都可以一看就懂。用新文字寫文章卻沒有這種方便，它首先就會拒絕只認識方塊字的讀者。第二，現在的作家都受了很久的方塊字文章底訓練，習慣了和口頭話隔絕着的文章，習慣了只有方塊字文章裏頭才有的文法，語彙，表現法等等；一旦叫他們拋棄那些東西，運用新文字來照口頭話寫，反而使他們像被繳了械的武士一樣了。但這情形應該是說新文字運動需要作者底更大的努力和更大的決心，說作者底創作活動同時就是新領土底開拓活動——那開拓的意義比初期的白話文要大得多。不用說，努力底結果，作家會在不久的將來獲得更多的讀者，更大的寫作能力，比起他暫時的損失要超過十倍百倍。

每一個作家都應該運用這新的武器，每一個作家都應該同時是一個新文字運動者。

給一本廈門話新文字小冊子作的序

我現在被派定給這本小冊子寫一篇序。這本小冊子是關於廈門話方案的，我不懂廈門話，也不懂語音學，能夠說什麼呢？無法，說幾句也許是不着邊際的話吧。

有些人，尤其是國語統一運動者，說新文字底各方音區的方案，是破壞或反對國語統一。這是很笑話的。中國的語言本來不統一，是鐵一樣的事實，不是從新文字產生之後才開始，新文字也沒有要加強這種不統一，說是破壞，憑什麼理由呢？說這種話的人，先有一個錯誤的觀念，以為方塊文字統一的，那麼，新文字要打倒方塊字，然當就是破壞統一了。

他們不知道方塊字從來沒有統一過中國的語言。第一，方塊字底力量所能達到的範圍，只限於漢族。漢族以外的許多中國人底語言，什麼時候曾被它統一過呢？第二，在十幾年前，用方塊字寫出來的文章，差不多全是文言文，那種文言文和中國各地的語言的關係非常少，雖然全國（應該說全漢族）一致，但是因為它是語言以外的東西，口頭上的語言，仍舊是不統一的。近來，白話文通行，好的白話文，和口頭上的語言的確有相當接近，可是在不懂普通話的人看來，白話文也只是半外國語式的東西。和自己底語言還是很少關係。難道語言以外的或半外國語式的東西底一致，能夠算是統一了中國的語言麼？第三，方塊字只統一了識字的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文盲，和它毫無關係。難道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文盲不算中國人麼？他們底話不算中國的語言麼？方塊字已經把他們底語言統一了麼？如果沒有，那談得上什麼‘破壞’呢？至於反對國語統一，是反對以一個地方的話為標準，尤其是以北平腔的官話為標準，削足適履地，生吞活剝地強迫全國大眾拋棄自己從小就說着，和自己底生活有密切關聯的父母語，去學習那不知從那裏來的所謂國語，是反對這種侵略式獨裁式的辦法：並不是反對中國語言逐漸形成一種統一的民族語。我們堅決地相信，要促成民族語言底統一，只有，加緊大眾底語言教育，供給記錄各地語言

的文字,增加大衆底語言知識,提高大衆底文化水準,使大衆首先能够運用自己底生活環境裏頭的,鄉土的語言文字來表現自己底生活,意識,思想,情感;同時也逐漸養成對於由別種生活環境,別種鄉土關係產生出來的語言文字的理解力,也就是對於生活在別種生活環境,鄉土關係的人們底生活,意識,思想,情感的理解力。這樣,大衆才能因為國民經濟底改造,因為交通事業底發達,因為自己底實生活底變動,因為和新的環境,新的關係的接觸和認識,而在實踐上逐步逐步地獲得真正的,切實有用的交通工具統一的語言文字。在這種情形之下,各地方言土話由於大衆文化水準底提高而得到高度的發展;由於大衆底生活底變動而獲得和它種方言土話互相接觸,攝取,滲透,融合的機會而逐漸趨於統一。這樣形成的統一語,決不是一個地方的方言,也決不是任何方言以外的東西;它是根深蒂固,源遠流長,又豐富又充實的真正的民族語。那用“聖君賢相”站在“九重龍朝”看“齊民”的看法,用園丁拿剪草機剪草的手段來統一全國的國語統一運動,忽視了大衆底生活情態,也忽視了語言底社會生長性,雖然能够成為某一時期的政治機關底治術,卻不是大衆需要的東西,不是大衆自己底東西,因之,它底統一只是政治家或學者教授們底幻想。

可是我們說每一個方音區都必須有自己底方案,決不是

說同一的方音區應該有或可以有幾種方案。現在已經有一個方音區產生了兩種以上的方案的事實，足見熱心新文字運動的的確不少。不過方案的紛歧，總很麻煩：妨害方案底統一，養成工作者底宗派觀念，浪費教授和學習的人們底時間，給與反對論者以口實。今天以前，因為組織工作落後，各地運動，差不多還是自發狀態，各地研究或推行的團體又往往是以某一個方案為中心的結合，和別的同樣的團體沒有組織關係，甚至沒有任何連絡；方案的紛歧也許是難免的。這，除了加緊組織工作以外，我們希望各地不同的方案底工作者虛心地研究別人底方案，虛心地接受別人底批評，虛心地和別人作公開的討論；並且每一個人都應該把統一方案當作自己底最大的任務，都應該有犧牲自己底方案不妨把自己底方案底特點，當作提議提出討論的決心。如果這樣，無論是由有關係的各方面舉行討論會來解決，或是委托中國新文字研究會來決定，都不會成什麼問題的。此外，正在起草或打算起草方案的人應該先打聽那個方音有了方案沒有。如果有了，千萬別又草一個；對已有的方案不滿，儘可提出問題來討論，把自己底主張灌注到那已有的方案裏頭去。這樣，整個新文字運動就都可免掉許多麻煩了。

聶紺弩 一九三六年五月卅於中國新文字研究會

國語羅馬字呢？中國新文字呢？

——答黎錦熙論拉丁化的中國字母——

(一) 技術呢？政治呢？

國語羅馬字運動的先生們在中國文字革命史上，的確有着不朽的功勞，像宣布漢字的罪狀之類。現在雖然有存文會的論客江亢虎博士出來大談什麼文字平議，（四月七日大公報），想替方塊字保鑣。我們也用不着多說廢話，只消把錢玄同，趙元任幾位先生的文章抄幾段出來，就可打得他“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可是在中國文字革命運動向前發展，超過了他

們的那一階級的時候，他們中間卻有人出來對新的運動大肆攻擊，像黎錦熙先生的國語運動史綱裏頭的許多意見和最近在國語週刊和教育與文化上發表的那篇論拉丁化的中國字母也就是‘蘇俄的拉丁字母和國定的國語羅馬字’的比較論，可說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這一點兒也不希奇，錢玄同先生對於這種舉動早就有過最好意的解釋，叫做‘只此一家，並無分出’。歷史上的文字改革家像盧騷章王照那些老前輩就都是這麼一付面孔。不過黎先生比盧、王兩先生都聰明，爲了遮掩他的這付真正的尊容，先向讀者們使了一點兒掩眼法，說是他“只能站在技術的立場來說話，完全離開政治的立場”，“因爲是只在技術的範圍中說話，離開技術的立場就沒有話可說的，對於任何方面站在政治的立場來反對或贊成乃至推動都是一律堅壁清野的”。這些話裏頭究竟包含着一些什麼意思，我暫時還不想分析；我要說的是：國語羅馬字運動者中間，有沒有一個完全離開政治立場的人，我不知道，可是黎先生卻絕對沒有這們老實。瞧，他的文章的題目就是什麼‘蘇俄的’呀，‘國定的’呀，這些字眼，豈不明明是個‘政治的’煽動麼？豈不明明是表示出他底‘政治的立場’麼？不僅這一丁點兒。他在國語運動史綱三〇頁上對於中國新文字表示過這樣的意見：

竊站在民族的立場說句話‘難道我們就佇立以待學人家的‘文字侵略

麼”？……末了站在語文專科的立場問句話：“國語羅馬字應該是本國人作的好呢，還是外國人代我們作的好呢”？

難道這就叫做‘技術的立場’麼？技術的立場裏頭，談出‘文字侵略’(!)，談出‘本國人’‘外國人’來了，真是奇聞！還不僅這一點兒；一九三四年九月發表的國語羅馬字促進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上說：

……還用得着外國人來越俎代庖？……因此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來研究如何可以抵抗外來的破壞……

同時‘大會專刊’裏有一篇會員通訊：

近來在上海……也常常吃着些pudding……聽說那些所用的材料是用盧布買來送給上海的一位癩頭經理的……他們一面大吹法螺去推銷，一面又姘姘人家的貨色上市……希圖一時打倒人家獨佔的傾銷區域。跑街們本來連自己的貨色都沒嘗過，可是佣金豐厚就給迷惑了。在誇大與誣毀之間露出馬腳也顧不到了。

這裏頭的“pudding”不用說是影射着中國新文字（拉丁化）‘癩頭經理’是影射一個新文字運動者的名字，大概是葉籟士吧。瞧，簡直什麼‘盧布’哇‘佣金’啦，公然地造謠，還有什麼‘技術的立場’可說呢？他們要‘研究如何可以抵抗外來的破壞’，造謠，大概就是‘抵抗’的一種，雖然饒幸他們還沒有直接干涉的權力。這真像通訊上所說：怕人家打倒他們‘獨佔的傾

銷區域’‘嫉妬人家的貨色上市’‘在誇大與詆毀之間，露出馬腳也顧不到了’。從‘技術的立場’說：也簡直不‘技術’得很。

說拉丁字母是‘蘇俄的’，不但違反常識，同時也自相矛盾。拉丁字母現在並不是任何一國的，而是世界的東西，是週知的。并且拉丁字母也就是羅馬字母，黎先生自己也說：‘實在就是 G. R. (國語羅馬字)底所謂基本形式。’如果拉丁字母是蘇俄的，G. R. 也當然是蘇俄的，還拿什麼‘國定的’來自豪呢？新文字由於在蘇聯的華僑的需要而產生是事實。製定方案的時候有外國專門學者參加意見，或外國人幫助推行，大概也是事實。可是起草和決定方案的人都是中國人。不過這般中國人沒有在方案上印上商標，像‘盧翹章切音新字’‘趙式’或‘錢式’國語羅馬字，一望而知道它的創製者的姓名，所以我們現在不知道原起草人究竟是誰。想不到這倒給黎先生留下了一個中傷的口實。

就算完全是外國人製定的吧，外國人給我們製定字母是在幾百年以前就有了的事：意大利人利馬竇，法國人金尼閣，英國人威德，日本人伊澤修二，瀨上恕之助都曾‘越俎代庖’過。許多地方還有官話或方言字母的新約全書路加福音在那裏麻醉人民，現在郵電方面通用的羅馬字也是外國人幹出來的。這些史實，黎先生只有比我們更清楚，可是誰曾聽見黎先

生站在任何立場問過半句話麼？一到了和蘇聯有一丁點兒關係的時候，黎先生就大呼小叫，連忙搬出許多‘立場’來了！

黎先生問：是本國人自己作的好呢，還是外國人代作的好呢？沒有貨色爲憑，這是無法答復的。以爲本國作的一定好，我請他看吳稚暉先生底一段文章：

這好比從前李鴻章的幕友考察憲政的大臣于晦若先生，他的囊，必要將油紙包起，掛到牆上。其故，因爲那些尊囊是出於他的尊肚，不容不尊重的。

不過我們要鄭重地告訴黎先生，他所非難說是外國人‘越俎代庖’的東西，僅僅只有北方話方案一種；那以外，我們還有好幾種別的方言區的方案，都是‘本店自造’，百分之百的國貨，不知黎先生還可以站在什麼‘立場’來打擊一下麼？

其實國語統一運動的先生們能够真正完全離開‘政治的立場’專門和我們討論‘技術的’問題，那倒是我們最歡迎的事情。國內的新文字運動，從開始到現在，不過一年工夫。由於學習者自己的努力，由於無權無勢的文化青年們的熱心，毫無任何政治的憑藉地，在貧窮和飢餓中，在干涉和非難中所掙得的成績，雖說太值不得談起了，可是也是國語統一運動以十年二十年的工夫還沒有達到的。這現象的形成，當然有許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技術的優勝。國語羅馬字要和新文字比技術，那無異是把新文字安放在更有利的‘立場’上，叫我們替新文

字說話的人，比較地能够‘暢所欲言’了。

所謂‘技術’問題，在中國新文字和國語羅馬字的比較上，總共只有兩點：一，國語羅馬字主張用北平的官話統一全國，新文字注重各區的方言；第二，國語羅馬字要表四聲的符號，新文字不要。雖說兩點，其實也只是一點。國語羅馬字既要用一個地方的話來統一全國的所謂國語，強迫各地方的大眾說一個地方的話，學一個地方的文字，就不能不定出許多無謂的規則來，使別處的人學起來不致茫無頭緒，四聲就是規則的一種。并且也只有以一個地方話爲標準才能講究四聲；否則這個地方的四聲和那個地方的四聲就會打起架來。這裏以爲是平的，那裏以爲是仄，這裏以爲是上的，別處以爲是去。三聲，五聲，八聲，九聲，都自以爲只此一家，和別家勢不兩立，其實又都只能在自己那狹小的地域範圍以內稱孤道寡，一到了別的地域，馬上毫無作用。那末，四聲四聲，還有一點兒值得刮目相看的地方麼！相信四聲在中國話裏頭演着了不得的角色的先生們還能定出任何的四聲底標準麼？因此四聲這把戲就只有國語統一運動者才能玩，用杜子勁先生的話說，它天生的是國語羅馬字底‘無用的長衫’我們短衣幫的中國新文字，無福消受這高貴的寶物。

(二) 統一呢？不統一呢？

關於國語統一運動底起因和失敗我已經在談‘國語運動史綱’的那篇文章上提起過，這裏不再重複。凡看國語統一論者怎樣申述他們必需統一的理由——黎先生說：

主張‘國語統一’則可，反對‘國語統一’則不可，何以故？因為‘國語統一’乃是事實上需要的，除非斷絕勞苦大眾的交通，返之於‘老死不相往來’的原始社會生活。

——論拉丁化中國字母第(八)段——

物質上，經濟上，交通上，這三十年來在我國的進展也和勞（乃宜）先生當年大不相同了。平滬通車三十六小時可達，廣播無線電就在農村也可設播音機……‘湖絲阿姐’，和羊肉店的小伙計，佛照樓的‘老闆’和賣如意油的繡下大姐兒，本來不無交涉，往後更加頻繁；統一的大眾語已成了現階段急切的需要。這是由社會生活變動所形成之自然的趨勢。

——國語運動史綱序頁19——

假如你用山東土話寫一封拉丁字母拼音的信給北平人，北平人就不得不上同和房或廣和飯莊去找翻譯，北平人用北平土話回一封信去，他們又上什麼館子去找翻譯呢？

——史綱頁301——

這真是‘牛頭不對馬嘴’（黎先生底話）。反對國語統一，是反對只以一個地方的話為標準。尤其是以北平腔的官話為標準，削足適履地，生吞活剝地強迫全國大眾拋棄自己從小就說着，和自己底生活有密切關聯的父母語，去學習那不知從那

裏來的所謂國語；是反對這種侵略式獨裁式的辦法：并不是反對中國語言逐漸形成統一的民族語。我們堅決地相信，要促成民族語底統一，只有加緊大眾底語言教育，供給記錄各地語言的文字，增加大眾底語言知識，提高大眾底文化水準，使大眾首先能够運用自己底生活環境裏頭的，鄉土的語言文字來表現自己底生活，意識，思想，情感；同時逐漸養成對於由別種生活環境，別種鄉土關係的人們底生活，意識，思想，情感的理解力。這樣大眾才能因為國民經濟底改造，因為交通事業底發達，因為自己的實生活底變動，因為和新的環境，新的關係的接觸和認識，而在實踐上逐步逐步地獲得真正的，切實有用的交通工具——統一的語言文字。在這種情形之下，各地方言土話由於大眾文化水準底提高而各各得到高度的發展；由於大眾的生活底變動而獲得和牠種方言土語互相接觸，攝取，滲透，融合的機會而逐漸趨於統一。這樣形成的統一語，決不是一個地方的方言，也決不是任何方言以外的東西：而是又豐富又充實的真正的民族語。那用‘聖君賢相’站在‘九重龍朝’看‘齊民’的看法，用園丁拿剪草機剪草的手段來統一全國的國語統一運動，忽視了大眾的生活情態、也忽視了語言底社會生長性，雖然能夠成為某一時期的政治機關底治術，卻不是大眾需要的東西，不是大眾自己的東西，因之他的統一只是政治家

或學者教授們的幻想。

然而我們聽見了黎先生底答辨：‘G. R.的原則是豎立兩個旗桿：一個是國語統一（標準語）——一個是國語不統一（方言）’。（論拉丁化的中國字母第八段）什麼叫做國語不統一呢？黎先生說：‘不需要（統一語）的農村，只學 F. R.（方音羅馬字）’，也就是史綱頁二五三上的‘添製閩音字母’。可是這‘兩個旗桿’，大概因為下令豎立的是位大人物，這大人物又是一位有眼病的人；經手豎立的庶務先生貪了一點財，把費用中飽了一半，所以到現在還只豎起了一個（國語統一）；那另外的一個（不統一）呢，就只剩給黎先生底文章裏頭作詞藻了——也許黎先生還以為真豎立了兩個咧！我們要問：國語統一運動推行了好多年，G. R. 經‘數人會’底製定，政府底公布也已經好些年了；現在黎先生所說的‘F. R.’或‘閩音字母’，究竟在哪裏呢？黎先生底答復是‘未出版’（論拉丁化的中國字母第九段）！那末，現在的 G. R. 能够拼出上海話以及吳語區的方言麼？能够拼出廈門話以及閩南潮汕等處的方言麼？能够拼出廣州話，瓊崖話以及其他地方的方言麼？可憐的國語統一運動，‘現在蘇州一帶的工作’還‘只好來一套 F. J.（方聲注音符號）’！這是個事實的問題，似乎不能信口開合吧。

黎先生又答辨說：‘這種標準語（北平音的官話）就是過去

幾百年間由各種方言慢慢融化而成的’(論字母第十一段)。又抄全國國語運動大會宣言上的話說：‘北平的方言就是標準的方言，就是中華民國共同的語言，就是用來統一全國的標準國語。這也是自然的趨勢，用不着強迫的：因為交通上、文化上，學藝上，政治上，向來都是把北平地方作中樞’(史綱序頁25)。這完全是武斷的說法。試問：黎先生能舉出哪一種方言不是由過去幾百年乃至幾千年間各種土話各種地域範圍較小的方言慢慢融化而成的麼？有哪一種方言絕對沒有受過別種方言底影響麼？如果舉不出來，我們似乎可以把任何一種方言定為標準，何必北平話呢？何況所謂標準語也並不是北平的土話，倒是一種通常叫做‘官話’的東西，雖說黎先生也曾說官話就是土話，不過名稱問題罷了(見史綱序頁13—4)；實際上卻並不那樣，倒是官場或上流社會層常用的話。它沒有土的氣息，汗的氣息，有的是官的氣息，封建氣息，和大眾所需要的話差得很遠。至於北平的土話，我們並不輕視，不過始終認是方言土話中的一種趙元任先生說：北平話‘在各方言中算字音最少的當中的一個，不算四聲，只有420字音，算四聲有1380字音’(國語羅馬字的十大疑問)。‘站在語文學專科的立場’看起來，北平話至少在語音上是比較貧乏，並不精密的。如果語音多是一種進步的表象(原始的語言一定少，學者們就有證明中國古無輕

唇音或某種音之類的)，北平話就不算是最進步的。我們有什麼權利強迫那語音多的地方犧牲自己底精密複雜的語音呢？至於‘交通上，文化上，學藝上，政治上’的問題，似乎已經離開‘技術的立場’，而且現在也並不‘把北平地方作中樞’了。那末就黎先生底話說，豈不是從現在起，已經可以不以北平話爲標準了麼？

黎先生爲國語統一運動的辨解是很無力的。我們再看他對於新文字所提出來的非難。他說：‘反對國語統一的新文字，是只許有隔山的文字，不許有過山的文字’（論字母第八段）。三十年前就有人拿‘分裂語言文字的罪魁’這大帽子壓在勞乃宣頭上，黎先生不過舊話重提罷了。他爲什麼要提起三十年前的舊話呢？

第一是他對於新文字的認識不夠，只看見新文字底這一個方言區的方案和那一個方言區的方案不同（其實是語言上本來的不同與新文字無干），卻沒有看見它底整理和統一的功能。新文字只分開了那根本不同的幾種方言，至於那些大同小異的各種方言，卻又可以統一在一種方案之內。例如北方話方案，甚至可以統一凡說普通話或‘藍青官話’的區域。如果新文字只許有隔山的文字，‘而中國的方言，尤其是在南部，往往隔山就不同’（論字母第八段），就至少要有幾百種不同的方案才

够用，何以黎先生又承認新文字是‘把中國全國的方言分爲六至七種’（論字母第九段）呢？

第二是估計方言差異程度的錯誤。方言雖說‘往往隔山就不同’，可是那不同的程度究竟怎樣呢？如果只是像黎先生所說的山東人和北平人的那種差異，我們已經有了過山的文字。如果是像江浙人和廣東人或福建人的那種程度，光靠文字還是過不了山；仍舊要靠國民經濟底改造，交通事業底發達，大衆生活底變動種種條件，才有辦法。擁護方塊字的人們常常說中國現在已經有一種過山的文字就是方塊字。可是忘記了方塊字只過了少數特殊階層的人底山，並沒有過大衆底山，往往大衆在生活上，語言上，已經過了山，在文字上卻仍舊隔着山。這種過山的文字，這種光靠文字過山的辦法，應該成爲黎先生底一個很好的借鏡。

第三是對於交通的意義的誤解。大衆底交通是由他於他們底生活需要。有這種需要，語言文字上的某種程度的差異也阻隔不住他們；在說着無論什麼語言的國度裏都有我們底僑胞，何況是本國境內？如果沒有這種需要，偏要當作散步一樣地和別處的人交通一下的事是很難想象的。就拿黎先生舉的例子來說吧，一個山東人寫信給一個北平人，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既然已經到了彼此通信的程度，一定是在通訊之前，

已經有了語言或文字上的交通了，說不定他們都已經跑過了些地方，對於別處的語言文字（當然指新文字）已經有了相當的理解力，那有什麼必需找翻譯的事呢？如果以前沒有過任何的交通，也就是彼此毫無關係，那他們怎會有通信的事情呢？我們不妨把兩處的方言底差異還加大一點，把兩個人底知識程度還減低一點，譬如說，一個沒有到過別處的廣東農民用廣東話寫一封信給一個不懂廣東話的北平鄉巴佬，我可以斷定：非請人翻譯不可。可是縱然那位廣東農民吃飽飯，沒事幹，忽然心血來潮，要和那個不知家住哪裏姓甚名誰的北平鄉巴佬交通交通，試問這封信用什麼方法投遞呢？

這第一個非難的理由還欠充分。

黎先生又說：‘公共場合既有統一的標準語的需要’，民族語又要逐漸統一，那末‘對於現階段的需要又怎樣應付’（論字母第十一段）呢？

我們要問是什麼人在怎樣公共場合的需要。像達官貴人們底政治會議政務會議麼？他們是澈頭澈尾的新文字反對者，干涉者，新文字現在受到的障礙就是從他們那裏來的：最近的將來，一定也會這樣。那末我們也不遮掩，新文字決不想到他們那裏去討好，決不像國語羅馬字一樣，靠他們那種‘政治的大力量’（黎先生底話）來推行。這就是說他們在公共場合需要

什麼，新文字本來沒有替他們打算。黎先生難道相信他們會沒有辦法麼？其次是像黎先生們那樣的讀音統一會或數人會之類的公共場合的需要，如果他們看得起新文字，新文字當然會替他們服務，可是我不相信就算沒有一種欽定的標準語，黎先生們就會簡直沒有辦法；就算真正沒有辦法，甚至像黎先生所早已八卦算就的‘乞靈於漢字’（論字母第八段），也不算是新文字底莫大的恥辱和致命的缺點，因為新文字底主要對象並不是黎先生們這般文人學者。一種文字可以簡直不適合於達官貴人或文人學者的麼？當然不是這意思。如果達官貴人文人學者肯紆尊降貴來學新文字，新文字實在也無法拒絕；要是他們反對，干涉，懷疑，新文字也沒有非說服他們不可，非請他們採用不可，非爲他們打算看適不適合於任何場合不可的必要。我們雖然堅決地主張新文字今天就可以代替方塊字，可是也知道方塊字由於達官貴人，文人學者們（像江亢虎之流）底擁護，在‘現階段’上，還有苟延殘喘的最大的可能。那末，讓那般達官貴人文人學者們去‘乞靈於汗字’吧，新文字一丁點兒也不慚愧，一丁點兒也不惋惜。

新文字是小百姓底文字，大衆底文字，要看大衆底公共場合適不適用才能斷定它本身底價值。這樣的公共場合，決不是像黎先生所說，可以‘乞靈於汗字’的。小百姓有幾個人認識汗

字呢，又認識幾個汗字呢？他們縱然要乞靈於汗字，汗字之靈也無法被乞。所以‘乞靈於汗字’這話首先要一腳踢開；黎先生兩次三番說新文字爲汗字作虎張，也只算是信口栽誣。小百姓底公共場合的需要大概兩種，第一種是本地的集會和外鄉的同鄉會之類，自有共同的語言文字，不在話下。第二種是各地人都有，語言文字不統一的場合；這種公共場合底參加者，既然已經離鄉背井，和別處人發生了‘公共’的關係，就多少能說幾句‘洋涇浜的上海話’也就是所在地的普通話之類。如果需要文字，就算他連自己家鄉的新文字也沒有學會吧，開頭就學他此刻現在所最需要的那一種，也並不是要耗費三年五載甚至不要一年兩年的事情。如果已經學會一種新文字，另外多學一種，自然更加容易。反正新文字已經不像方塊字那樣高不可攀，學習一種文字又是由於生活底需要，花上十天半月的整天工夫或者三兩個月的零碎時間，還有什麼學不會的麼（這裏說的都是指應用的技術問題，和造學問之類無干）。何況公共場合也還有別的方法可以使大家互相了解，像把文字印成或寫成幾種方言之類。黎先生儘可放心，小百姓決不會因此就永遠互相隔絕，並且無法挽救的。請不要忘記，這只是說的‘現階段’，這現階段是從方言到統一的民族語的過渡時期，據黎先生底估計‘得五六十年’。五六十年，以我們個人底壽命說，誠

然不算很短；可是黎先生對文字改革不是有一句名言麼：‘一百年也可以’（史綱頁189）。既然一百年也可以，五六十年已經算打了很大的折扣了。

關於統一不統一的問題，我想在這裏結束了；作為餘興，這裏舉出主張國語統一的黎先生在史綱頁143上幾句不打自招的話：

南方各省因為口語文不如本地風光，所以有些學生家家長極端主張仍談文言。

（三）帶四聲呢？不帶四聲呢？

有一位蕭迪忱先生在國語週刊136期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拉丁化能够不要聲調嗎’，文章我沒有看見，照題目所發出的問題，卻是很奇怪的。當然，無論怎樣的語言文字都不能不要聲調，我們從來也沒有人說，任何的語言裏頭可以不要它。我們只是主張用新文字寫出來的中國話，可以不要帶標四聲的符號。這和‘聲調’并不是同一物。如果一個方塊字擁護者問：‘你們能够不要文字麼’？大家一定覺得滑稽，可是蕭先生卻發出了和這相同的疑問。不僅蕭先生一個人，黎錦熙先生以及別的國語統一論者都一樣，他們常常說什麼‘國音京調’‘京音京調’之類的話，都是把聲調看成和四聲是一個東西，雖說

他們似乎沒有把‘京調大觀’之類的書誤會到是講四聲問題的。

語言底發音上有高低輕重長短快慢的分別，這種分別因為各地的習慣不同，各人說話的神情態度不同，話裏頭的重心不同，並不嚴守着呆板的四聲底標準和範圍；我們不能在書面上給牠一個固定的符號。如果一定要給一種符號，就一定會顧此失彼顧彼失此，像現在的國語羅馬字，強迫沒有入聲的北方人說入聲，強迫可以不分上去的江浙人分上去，強迫有八聲九聲的閩粵人犧牲自己底四聲或五聲，結果是彼此都顧不着。十幾年前，劉復著了一本四聲實驗錄，用儀器來測驗四聲底差異。結果他怎樣說呢？

凡是本書所實驗的，都是逐字逐聲在儀器上咬嚼得很清楚的音，他沒有隨便一點，正像從前我們的先生教我們辨別四聲一樣。至於我們實際談話時，決不是這樣咬嚼的。因此，我們現在所實驗的四聲，可以叫做標準四聲，談話時的四聲，可以叫做自然四聲。以標準四聲與自然四聲相比，真是差異太多，問題太難了。

——頁55——

最透澈的還是吳稚暉先生（註一）底話：

他（四聲）現在一個固定的金剛不壞身到底是什麼東西呢？便是一部殷時夫做的沈約詩韻罷了。這部沈約詩韻之外，前古後今，還有什麼配冒充四聲……說穿了只是一部書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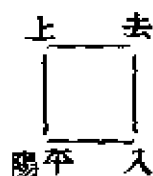
——‘四聲實驗錄’序——

既然‘自然四聲’和‘標準四聲’相去這末遠，既然‘標準四聲’不過‘只是一都書而已’，我們就可知道黎錦熙先生底‘G. R.之所以要帶標準四聲者，正爲的通俗化’（‘論字母第五段’）這話裏頭究竟有多少真實性。

所以我們主張廢除的是從周顒，沈約以來的書面上的四聲底分法和國語羅馬字底四聲符號，決不是口頭上發音的高低長短的聲調，這是討論這問題的人應該首先弄清楚的。

黎先生說：‘批評的人有一個大誤會，以爲聲調（四聲，記住不是同一物）這種把戲完全出於漢字，廢除漢字就沒有聲調（四聲）了’（論字母第五段），好像四聲和方塊字沒有關係似的。這真是‘一個大誤會’！

第一，方塊字有四個角，四聲各佔一個角，這是歷來的四聲底分法。連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教育部公佈注音字母的命令上，也是這樣畫着的：



（見文字的歷史觀和革命論頁565）

第二，有些地方本來不止四聲，可是仍舊叫做四聲（平上去入），卻在平上去入上加以另外的區別，像‘陰平’‘陽平’某上某去之類，明明是不敢破壞方塊字底端端正正的四方形。

第三，方塊字成爲固定的形式是從隸書起的。小篆大篆以前都是各式各樣，像日字是圓形，月字是半圓形之類。四聲的把戲，雖不是和隸書同時產生的，卻正是有了隸書以後才有的，隸書以前，絕對沒有。

第四，只有方塊字才有四聲。世界各國以及中國境內不用方塊字的民族底文字像蒙文回文之類都沒有四聲（可不是都沒有音調）。連同是用方塊字，但有非方塊形的東西滲雜在內，破壞了方塊字底統一性的日文也沒有四聲。

第五，只有方塊字才需要四聲。方塊字是單音字，結構又複雜，麻煩，難認難記，妨害着新字底增加，只好用‘通假’的辦法來敷衍敷衍；於是同形而音義不同或同音而形義不同的字非常多，又只好用四聲的辦法來敷衍敷衍，吳稚暉先生說：‘四聲在歷史上的功用，約略是三端：一則同形的字借他分別異義，……二則異形同音的字借他分別彼此……第三端者卽詩歌上的平仄是也’（‘四聲實驗錄’序）。關於第三端，下面再說；一二兩端都證明四聲和方塊字是分不開的。

第六，四聲最大的功用在舊詩或駢文上。差不多是因爲詩和駢文才發生才存在的。南史陸厥傳：‘汝南周顒善識音韻，爲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蠡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同’。庾肩吾

傳：‘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
劉復也說：‘我爲什麼對於這(四聲)問題似乎癖好甚深呢？因爲我自己喜歡胡謫幾句詩，更喜歡的是胡謫幾句白話詩’。(四聲實驗錄序頁23)。這裏且不說四聲怎樣束縛了舊詩文底形式，單說那舊詩駢文的形式，豈不是和對聯，詩鐘，字謎，詩謎之類一樣只是方塊字的把戲麼？豈不因爲是用方塊字寫的，才能用得上‘平平仄仄平平仄’，才能‘雲對雨，雪對風，酒綠對燈紅’麼？換句話說四聲這東西，豈不是仍舊和方塊字脫不了關係麼？

從上六點看來，四聲都是‘出於漢字’的，絕對和方塊字有關係的，是方塊底附屬物。我們既然要廢除方塊字，當然也要廢除它底附屬物——四聲。

主張帶標四聲的最大的理由不外‘濟單音之窮’（國語運動史網頁103），求‘混淆的減少’（傅斯年：漢字改革初步談）。可是我們也沒有說廢除四聲，在書面上馬上就毫無問題。如果這樣，還有什麼討論的必要呢？方塊字在我們的國度裏存在了幾千年，許多的詞兒是由方塊字構成的，尤其是學術上的用語，方塊字底影響非常濃厚。就是方塊字今天就絕跡了，那影響還要在新文字裏頭作祟到相當長久的時期。這就是說，單音詞兒，同音詞兒，以及只有用方塊字寫出來才看得懂的文言式

的詞兒，要成爲新文字推行上的苦惱，像常常被舉爲例子的‘山西’和‘陝西’，‘買’和‘賣’，‘戒嚴’和‘解嚴’以及‘油’，‘有’，‘又’之類，實在很多很多。新文字現在把感覺到了的，必須分別的都分別了，對於‘沒有入聲就不能過日子’的（見史綱頁104）江浙人，也有了使他們能够過日子的方法（見‘上海話方案’）雖然沒有把所有的問題完全解決，也會在實踐上逐漸地解決。我們並不頑固地拒絕必需的符號，不過不把每一個音都標出‘聲’來，並且把它叫做‘平上去入’罷了。

其實把混淆問題看得過份嚴重，就是把詞兒看成一種孤立的存在。一個詞兒必定和別的詞兒連結在一起才能成爲一句話，一句話必定和別的話連結在一起才能成爲一篇文章，一篇文章必定有一個特定的範圍，能够把這篇文章讀下去的人又必定有相當的理解力。故意把同音字搜集起來自然可以有相當的數目；一到了個別地用進文章裏頭去的時候，混淆的機會就不像想象的那樣多。從前有一位黎維岳先生舉出了好多同音字的例子：‘我的媽媽種麻……他的媽媽騎馬……蝦蟆不會罵人’（見文字的歷史觀與革命論頁434，原文還有幾句，因其餘都不算同音字，未錄），用新文字寫出來，有三個詞兒是同音的：麻，馬，罵。如果單獨看起來，的確不能看出是哪一個意思；可是有了一個整句子就容易了。‘麻’有‘種’的動詞，‘馬’

有‘騎’的動詞，‘罵’本身是個動詞，下面有‘人’的賓詞，很難誤會到是‘種馬’，‘騎麻’，‘馬人’或‘麻人’。不用說，它們又很少機會能够碰在一塊兒。

然而有些字音，即使單獨出現的時候，即使同別的詞兒連結在一塊兒的時候，也容易和別的同音字混淆，像除了當作姓用就沒有別的用處了的‘李’和‘黎’這兩個方塊字（見論字母第五段）就是。可是我們要說，姓氏問題，壓根兒不在新文字底顧慮之列。姓這東西雖然在研究古代史的人看來，也許還有多少用處，譬如說，最早的姓多是女字旁，像嬌，姁，姚，姬，姜之類，以後才有子字旁的子，孫，孔，孟，再以後才有表示土地郡邑和草木鳥獸的字：未必不可以看出一點從女權社會向前推進的痕跡。可是在現代的實生活上，不但毫無用處，並且還可以引起些無謂的糾紛。就算是必需的吧，新文字完全代替了方塊字之後，自然會從單音字的姓改爲複音字的姓。日本有‘廢姓外骨’中國有‘疑古玄同’，就顯示姓這東西，或是會廢掉，或是會改變的趨勢。一種改革，是在改造舊社會，舊生活，建立新社會，新生活，當然有許多舊社會殘存的東西，或是根本肅清，或是無法顧全。新文字底成功，是全國大衆底福利，像黎先生在書面上會和李鴻章通譜之類的事，還配當作一個問題提出來麼？如果連這小問題也非顧全不可，黎先生就該馬上拋G.R.

轉去擁護方塊字，因為 G. R. 雖然能够分別李和黎，方塊字卻更能分別：張和章，楊和羊，江和姜，魏和衛，尤和游，喻和俞，婁和樓……許多同音的姓 G. R. 只有望着它白瞪眼的。

又有人說，新文字不標帶四聲，一定看不懂，如果看得懂，是因為方塊字在背後發生作用。去年九月間，有一位培良先生在‘北晨學園’上發表過這樣的意見，這是個極頂巧妙的說法。我們現在能够提筆寫文章的人，不用說都學過方塊字’所以從自己本身上，很難直接證明能够看懂新文字，不是因為方塊字的關係。可是老話說得好，‘事實強過雄辯’，最近上海出了兩本用新文字翻譯的書；一本不走正路的安得倫，一本政治經濟學 ABC。這兩本書底出版，可給了這巧妙的說法一個事實的答復。原來第一本書有好些地方看不懂，第二本書卻完全可以看懂，因為第一本書裏頭，有些地方夾雜着只有用方塊字寫出來才看得懂的詞兒，第二本書卻沒有這種地方。這就是說，如果有方塊字在背後發生作用，只有使新文字難懂，決不會反而容易懂，和那位培良先生底高論剛剛相反。這兩本書，不但答復了培良先生，就是對黎先生說的不帶四聲就會‘把詞兒連寫得太過分，成為一種‘新文言’（論字母第七段）的話也給了很好的回答。第一本書不用說，就是第二本書，也還有些文法和寫法上的小問題，不過無論有多少問題，卻沒有一點兒和四聲

有關。第一本書之所以難懂，是因為用了文言詞兒，絕不是沒有帶四聲的原故，更不是連寫得‘太延分’的原故。說新文字會變成新文言甚至說‘終於要跟漢字妥協’，說這種話的心理，我們很能了解。據說，像耶穌那種聖人都詛咒過無花果，不許它開花，何況是黎先生呢？

以上算把黎先生們攻擊四聲廢除論者的意見逐一地答復了；如果還有沒有發見的材料，以後再來補充，遺憾的是對於有了四聲會是怎樣情形，未加強調。黎先生底‘國語運動史綱’上有許多證據，可以借用，恐怕鈔謄太多，有侵版權，只引用兩小段，意思是想說明這四聲的把戲，不但全世界的人都不懂，就是國語專家也仍舊沒有辦法：

當民九臨時大會時，廖宇春主張以普通官話爲標準，而聲調（四聲）則陰平從天津音，陽平上去聲從北京音，入聲從江北音。那年王璞在上海發音之‘中華國音留聲機片’，則陰陽上去，都全依北京；入聲把北京的去聲讀得短一點兒。可是短而不促，收而不藏……次年趙元任在美國發音之‘國語留聲機片’，陰陽上去也一律準照北京，全如王氏；而入聲則標準南京，略同廖氏。雖短促收藏，而不如江北之急……

——頁102——

國語羅馬字在國際的宣傳卻沒有好成績，因為大多數的外國人不明白中國話裏頭的四聲的重要。

——頁297——

(四) 國羅呢？中新呢？

總結起來，國語羅馬字和中國新文字在技術上的分別是：
國羅強迫無論說着什麼方言的全國大眾學習一個地方的話；
中新主張不加強迫，因勢利導，使各地方言都有同等發展的機會，以逐漸趨於統一。國羅主張帶標連國語專家也咬嚼不清的四聲；中新主張廢除這種麻煩的符號，由各人口頭上本來的聲調去分別同音或近似的音。其實只是一件事：國羅煩難，中新簡易。對於煩難和簡易的問題，魯迅先生有段很好的解釋：

易舉和難行是改革者的兩大派。同是不滿於現狀，但打破現狀的手段卻大不同：一是革新，一是復古。同是革新那手段也大不同：一是難行，一是易舉。這二者有關爭。難行者的好法子，一定是完全和精密，藉此來阻礙易舉者的進行，然而它本身，卻因為是虛懸的計畫，結果總並無成就，就是不行。

這不行，可又正是難行的改革者的慰藉，因為它雖無改革之實，卻有改革之名。有些改革者，是極愛談改革的，但真的改革到了身邊，卻使他恐懼。惟有大談難行的改革，這才可以阻止易舉的改革的到來，就是竭力維持著現狀，一面大談其改革，算是在做他那完全的改革的事業。這和主張在牀上學會了浮水，然後再去游泳的方法，其實是一樣的。

拉丁化卻沒有這空談的弊病，說得出，就寫得來，它和民衆是有聯繫的，不是研究室或書齋裏的清玩，是街頭巷尾的東西；它和舊文字的關係輕，但和人民的聯繫密，倘要大家都能發表自己的意見，收穫切要的知識，除它以

外，確沒有更簡易的文字了。

而且由只識拉丁化字的人們寫起創作來，才是中國文學的新生，才是現代中國的新文學，因為他們是沒有中一點什麼‘莊子’和‘文選’之類的毒的。

——論新文字——

但是這裏還只就技術來說，如果一觸到別的問題，國羅和中新更有明顯的差別。比如吧，本文開始的時候，曾經證明黎錦熙先生們底意見，處處未曾離開政治的立場；可是在主觀的認識上，黎先生卻處處是把語文運動當作和‘政治立場’不相干的東西。引用過的不談，在史綱序頁115—6上，黎先生也說：

四十年來的國語運動，是把‘工具’的改進問題作中心的……國語運動乃是根據着專科學理而發生的一種實際運動……其本身只是些實際問題；實際以外，用不着那些很廣泛的理論……

這理解沒有絲毫和新文字運動者相像的地方，也沒有絲毫和歷史上語文運動的先驅者相像的地方。不用說，語文運動一定需要‘專科學理’，也一定會是一個‘實際問題’；可是它不能這們簡單，它同時必定和整個文化運動，社會運動即黎先生所說的‘政治的立場’有着密切的關聯，它底發生和發展都不能是和文化乃至社會的各種運動不相干的。關於這，我曾在另外的文章裏頭有過分析，這裏不再重複，只引用幾個先驅者底幾句文章也可證明黎先生底認識和‘實際問題’（借用）還隔得很遠：

竊謂國之富強，基於格致；格致之興，基於老幼皆好學識理。其所以能好學識理者，基於切音爲字，則字母與切法習完，凡字無師能自讀……亦即易于著筆。省費十餘載之光陰，將此光陰專攻于算學格致化學以及種種之實學，何患國不富強也哉！——盧翹章切音新字序見史綱頁11——

今全國共二十萬秀才，舉人，進士，比日本五千萬受過普通教育的人民少過二百五十倍。以一敵二百五，還有什麼策略可說？中國政府非注重下層教育不可；欲去下層教育的障礙，非出一種溝通語文的文字使言文合一不可。——王照底話，見史綱頁34—35——

伏惟方今時局，誠可謂危急存亡之秋矣；有識之士，咸思所以救之。以言乎弱，則宜尙武事，然無兵學，無以練兵也；以言乎貧，則宜講實業，然無農工商學，無以興利也；以言乎人心偷薄，則宜重道德，然無義理之學，無以興民行也；是則興學尙矣。……是故今日欲救中國，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識之字不可；欲爲易識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

——勞乃宣進呈簡字譜錄摺——

新文字運動決不看輕‘專科學理’，也決不放鬆‘實際問題’，可是它自己是從社會的現實生活的要求而產生的；同時也不能存在於社會的環境以外；因此，它有它自己底社會的使命，也必定和種種社會運動，文化運動脈絡相通，並且和它們結成生死的同盟。這一點是黎先生們必需了解，可是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了解的。

前面說過，新文字是小百姓底文字，是從小百姓底要求出

發，‘實際運動’也是由小百姓自己動手的。一兩年來的事實證明我底話毫無虛謊。國語運動則在很早的時候就變成了一種政治機關底治術。且不說黎先生底史綱到處表露着他那聖君賢相的面孔和他所引用的歷史上的聖君賢相底偉績；專就這運動底推行上說，也幾乎完全是歷來的教育當局底德政——史綱上引用過的材料，光是‘教育法令’一項，就有二十五件之多，重要函牘和教育當局以私人資格發表的意見還不在內。至於國語運動者始終是教育部聘任的專門委員之類，國語運動底機關又始終和教育部沒有斷絕過血統關係；黎先生他們現在完全放棄了對於方塊字的攻擊，無視存文會江亢虎之流底方塊字擁護論，專門和新文字運動作必死的鬭爭，則又完全迎合着當局底意旨！當然，我們不是說離開了，‘政治的大力量’（黎先生底話），新文字運動可以得到完全的勝利；不過在現階段上這運動還只能靠小百姓自己，如果要仰仗‘政治的大力量’，也必需先使那大力量真正成爲小百姓自己底力量。這也是中新和國羅截然不同之點。

其餘還有許多本質的問題，這裏不能一一分析；縱然分析出來，也是黎先生們所不了解或不願了解的，那末，我底文章就在這裏結束了吧。有一位先生說‘看誰行得通’，說這話的時候，好像有着十分的把握，雖然并未宣布用什麼方式去‘行’。

我們也希望他們‘行得通’，無論如何，那是比方塊字好過百倍的。不過如果把語句改換一下：‘看誰最受小百姓底歡迎’，則自信力說不定會減少一點吧。

三六年，四月，卅日，寫完。

關於語言

兩年前，正是大眾語論戰的時候，我寫了兩篇短文：（一）話跟話底分家；（二）話跟文章底分家。這兩篇短文雖說當時似乎有人喝過采，但討論問題的時候，大家并未注意到我所提出來的意見，并未把我底意見應用到具體問題底討論上去，就是儼乎其然出來做着大眾語論戰底結論的黃賓先生，他底文章（見語文論戰的現階段頁352）也完全沒有談到，甚至於一直到現在為止，關於語言的我底意見，仍舊沒有得到任何人底直接或間接的補充和修正而有絲毫的進步。

寫那幾篇短文的時候，我正在充當發表那文章出來的刊

物底編輯，那刊物是一種日報底副刊，每天要稿子，又不能寫得太長，文章常常是寫得很草率的；同時我並不是一種所謂‘書淫’之類的人物，實在也沒有專門在讀着些怎樣的書。因之我底意見，並不是什麼博覽羣書或經心研究了的結果，不過從別的方面聯想到語言問題也應該是那樣，所以就那樣寫出來了。那末，我那文章底不够或不正確的地方，無論如何，總該不能說是沒有的吧。然而兩年之久，沒有得到一點回聲，真叫人有點兒寂寞。

今年，我受了朋友底囑托，寫了一本從白話文到新文字的小冊子，把從前的那兩篇短文底意見又引用進去了；並且因為馬上有了一點別的意見，又添補了一下，加上了一個題目：‘文章·語言·文字’投在現實文學第二期上發表了。一點意見，寫來寫去，固然很無聊，不過在說法上，卻有了一些自以為比較圓滿的修改。最近，隨便看書，偶然也碰着些對於我底意見有幫助的材料，現在想摘錄下來，作為文章·語言·文字一文底論證底補充：

一，在那篇文章上，我說：‘在很久以前，人和人就分了家……因為有的參加生產過程，有的離開生產過程，兩者之間的生活習慣，就慢慢不同起來。不但行為，就是觀念也慢慢不同起來。不用說，兩者之間的生活習慣，行為思想所需要的語

言自然也跟着不同起來’。一句話：就是語言這東西在階層社會裏也和藝術，科學，哲學，教育……一樣是有階層性的。我舉出了從前俄國貴族們不說俄國話倒說法國話的事以及法國在革命以前有貴族話和平民話的分別等等的例子。現在我覺得最適當的例子卻在果戈里底死魂靈裏頭：

這裏還該敘述的是 N 市的閨秀們也如她們那彼得堡同行一樣，在言語和表自上，總是十分留心而且努力于正當的語調的。沒有人聽到過她們說：‘我醒鼻涕’，‘我出汗’，‘我吐口水’，她們却換上了這樣的話：‘我清了一下鼻子’或則‘我用了我的手巾’。無論如何，也不能說：‘這盤子或杯子臭’，不能的，連覺得有些這意思的影子的話也不能說，要挑選一句這樣的表現來代替牠：‘這盃子不成樣子呵’，或者別的這一類話。因為要使俄國話更加高尚，就把所有的言語的幾乎一半，都從會話裏逐出了，人就只好常常到法國話裏去找逃路。這就成了完全兩樣的事情。用起法國話來，即使比上面所述的還要厲害的詞句，也全不算什麼事。（魯譯本頁246）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是說，一句同樣意思的話，一到貴族閨秀們口裏就完全變了樣子了。不但閨秀；紳士們也是這樣：

唉唉，不對！我不料我們的主角竟滑出一句街坊上的話來。但叫我怎麼辦呢？這是在俄國的作家的運命！不過倘有一句街坊話混進書裏來，可不是作者之罪，倒是讀者、尤其是上流的讀者之罪：從他們那裏，先就聽不到合式的俄國話，他們用德國話、法國話、英國話和你應酬，多到令人情願退避，連說話的樣子也拚命的掣來頭，存本色：說法國話要用鼻音，或者發吶，說英國話呢，像一隻鳥兒還不算到家，再得裝出一副真像鳥兒的臉相，而且還要囁

笑那不會學這樣的人。他們所唯一竭力避忌的，是一切俄國語——至多也不過在鄉下造一座俄國式的別墅。這樣的是上流的讀者以及一切自以爲上流的讀者！然而別一面却又有：那麼的嚴厲，那麼的要求！他們簡直要最規矩，純粹，高尚的文體來做文章。（頁256）

二，我以前說：‘時代底進化，就是說生產工具和生產關係底逐漸改變，兩方面底生活習慣行爲思想也以不同的發展路線而逐漸改變；兩方面底語言底不同的程度也就逐漸增大’。原意本來只在說明‘時代越進化兩方面底生活習慣行爲思想相差就越遠，兩方面底語言相差也就越遠’這一點；然而在生產工具或生產關係底逐漸改變中，或已經改變了，語言在各階層裏以怎樣的形態來改變的事卻完全忽略了。關於這一問題，我現在也仍舊不能有什麼具體的答案，不過想在梭拉菲摩維奇底指示之下，來揣摩這一問題，并且把一兩點零碎的材料鈔在這裏，以備自己或者別人某一天底採用。

爲了語言問題，梭拉菲摩維奇和高爾基這兩位老將會有一次有名的筆戰，大概誰都知道的了。這筆戰究竟誰勝誰負，誰對誰不對，以及誰底正確成分底多或少，我現在還沒有得到全般的了解；不過，老梭拉菲摩維奇有幾句話，我認爲是對的：

語言不能靜死地去觀察。……和一切的事物一樣，在生活中，在文化中，在建設中，在文學中，在語言中，革命沸騰着……珂羅連科是優秀的作家，可是現在珂羅連科式地去描寫是不可能的，不同的階層關係，不同的人們，有

不同的語言。

(用中華月報二卷七期方天底譯文，文多刪節，恐不可靠。)

這裏，其實只引用一句話就够了：‘語言不能靜死地去觀察’。‘不能靜死地去觀察’，這話大家都懂，而且大家都在應用，但是應用到語言方面的卻少，應用到語言底具體問題上頭的更少；所以這裏特別把他提出來一下。珂羅連科是優秀的作家，可是現在不能珂羅連科式地寫，這些話對於和珂羅連科有點因緣的高爾基是種故意的諷刺也說不定，但那意思是對的。烏思潘斯基用農民底語言寫了許多優秀的作品，但現在的集體農場的作家誰還用烏思潘斯基式的語言寫呢？水滸紅樓夢是優秀的作品，如果現在的作家，左一個‘翻身使剪拂’，右一個‘撈什子’，‘小蹄子’之類，說不定是很可笑的。爲什麼呢？因爲烏思潘斯基時代的農民底語言或者水滸紅樓夢式的語言，已經不是現代的語言，不能代表現代的特殊精神；它已經隨着時代底變換而變換了。

所謂語言隨時代底變換而變換，其實就是隨着生活底變換而變換。時代變換了人們底生活，生活又使語言受到它底影響。如斯而已。關於這，潘非洛甫在關於語言那篇文章裏，曾提到法國大革命後，民衆語佔到了最高地位的事，也提到過十月革命後的蘇聯的語言上的變化。最有趣的是他舉出了這樣一

個例子：

瑪莎和她底麻子彼得同居了二十三年，並且他每年都打過她。……那時候她有什麼辦法呢？離婚吧，但是須得證明他遺棄了她。跑開吧，但是土地是不給女人的。……只有一九三二年她才獨立賺到一百四十普特的麥子，她走到他跟前說：‘可愛的彼得，現在你還拿拳頭對付我麼？’他抓到她就打。她就離開他，跑到書記處去了，他也匆匆忙忙地跑到那里去。書記對他說：‘你做的什麼事！我們要來審判你，把你從集體農場開除掉，趕出這個村子’。他站着，哼氣，哼氣，後來轉向瑪莎發氣地問：‘你對我說真話，你嫁我的時候是處女麼？’

後來書記寄給我們一封信，里面說：我們集體農場有件怪事：這個彼得從前無論何時都不叫瑪莎做瑪莎，他是這樣地叫她的：‘唉你這爛污’。而現在他叫她瑪莎……走在一塊，好像是年青了似的。

（徐行譯文，載文學叢報第一期）

據潘非洛夫說，是‘他因為各種環境，主要的是因為生產關係改變了’。以後，他又舉了一個例子：

我知道這樣一個鄉村，在革命以前說着四種不同的話：一部分人說‘Chawo’，另一部分人說‘Chivo’，第三部分人說的是‘Chevo’，第四部分人說的就像城里人說的一樣是‘Chewo’，（按意為‘什麼’）。而且這一部分的居民，恥笑其他的居民。

為什麼會這樣呢？潘非洛夫說：‘因為有一個時候，四個地主由各個不同的地方運進了許多農民，而這四個地主把這些

農民把持在自己畸形文化以內’。可是‘現在因爲集體農場成立，所有這些‘Chawo’和‘Chivo’等玩意兒就消失了’。這就是說，農民們底生活改換，使他們底語言也變換了。當然，決不僅蘇聯的情形是這樣，別的國度，也有和這近似的語言上的變換：日本維新以後和維新以前的語言，尤其是書面上的語言大不相同是周知的；中國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及五卅以後的大革命也無不在語言上引起了劇烈的變化，而且現在還正在更劇烈的變化之中。

說到這裏，不禁想起有些人想拿一種文字來統一中國的語言的事。中國語言現在需要統一，是不錯的，要統一必須加上人爲的努力，也決不會有人反對，有一種便利的紀錄工具，自然也會叫統一工作變得容易些；可是如果沒有國民經濟底改造，人民大眾底生活實際改換這些先決條件，想光靠文字來統一語言，那可能性未免太少了。

話歸本題：從以上的例證看來，人類底語言是和他們生活分不開的東西，生活有了變換，語言也一定會有變換；要使語言變換，也不能不先使生活底變換。同時，正因爲語言和生活分不開，而人類的生活是社會的生活，到現在爲止，是階層的生活，所以語言是有階層性的。不用說，我還要廣泛地搜求更充分的證據。

九一八，一九三六。

關於世界文庫底翻印古書

魯迅先生十年前在一篇題目叫做‘無聲的中國’的演詞裏頭說過這樣的話：

發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給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字的，然而拿文章來達意，現在一般的中國人還做不到。這也怪不得我們；因為那文字先就是我們祖先留給我們可怕的遺產。人們費了多年的工夫，還是難於運用。

文明人和野蠻人的分別，其一就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夠把他們的思想，感情，藉此傳給大眾，傳給將來。中國雖然有文字，現在却已經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難懂的古文字，講的是陳腐的古意思，所有的聲音，都是過去的，等於零的。……

.....

要恢復多年無聲的中國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個死掉的人道：‘你活過來’！

爲了要恢復這多年‘無聲的中國’，叫死人活過來的‘奇蹟’已經開演了一二十年。首先是白話文運動，後來又有什麼注音字母，國語羅馬字運動，文藝大衆化和大衆語運動，手頭字，通俗文，和新文字運動等等。

我說過：‘文化運動不能是孤立的存在，倒是和整個社會運動相連接，相配合的東西。如果主導的社會運動沒有得到完全的勝利，文化運動也是不能得到完全的勝利的’。（一九三五年的中國語文運動）。前面說的那些運動，有的只得到部分的勝利，像白話文；有的簡直慘敗，像注音字母，國語羅馬字；有的卻正在苦難之中，像大衆語，新文字；那原因如果不是由於運動本身底錯誤（像注音字母，國語羅馬字，）從我底話裏頭該可以得到相當的說明。

現在的中國正是一個新舊交替的時期，也就是新勢力和舊勢力搏鬥的時期，在文化領域也並沒有兩樣。所以一方面有要使無聲的中國變成有聲的我們，有我們底從白話文到新文字的語文運動；另一方面也有讀經尊孔的明令，有在五四時代就反對白話文的汪懋祖先生，有以保存方塊字，保存由方塊字產生的種種特殊的文體（整個的文言文，尤其是駢文，律詩，

詞，賦，箴，銘，對聯，詩鐘等等）爲唯一的偉業的存文會，有要以中國文化爲本位的十教授，有專印老牌漢奸曾國藩之流的著作，一折幾扣地推銷到全國去的書業商以及其它種種，一句話就是整個文化復古運動或整個復古運動。這文化復古運動，用魯迅先生的話說，就是要使‘無聲的中國’永久無聲。我說過‘這一系列的倒行列車，他們的企圖，無異是使中華民族自絕於高度文化。必然爲廣大的覺悟的大衆所唾棄，可是也必然會爲被中國傳統文化所麻痺，朦混了幾千年的無智的大衆所接受。它所能發生的影響，所影響裏頭所潛伏的危機，是每個進步的中國人所不能忽視的’（一九三五年的中國語文運動。）

這時候，無論什麼人用正人心息邪說的名義也好，用保存國粹，裝理國故的名義也好，用整理文學遺產的名義也好，什麼名義不用也好，只要他是把中國的陳古董搬運到大衆面前，來擴大加強那些‘難懂的古文字’‘陳舊的古思想’底影響，無論他自己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他和他底‘同道’們認爲是好的還是壞的，他自己或‘同道’過去有過怎樣光榮的歷史，現在正幹着怎樣偉大的業績，一切不談，在搬運古董這一點上，在客觀的意義上，都是擾亂新的語文運動底陣容，直接間接爲文化復古運動乃至整個復古運動助威，爲存文會古教授，一折幾扣的書業商服務的。並且越是他有過光榮的歷史之類的東西，

他所搬運出來的古董在讀者大眾當中所能發生的欺騙麻醉的作用越大，對於文化復古運動乃至整個復古運動的幫助也就越大，我們參加新的語文運動的人越是不能不給予一種嚴厲的批判。這就是我在‘一九三五年的中國語文運動’（載改造創刊號）那篇文章裏頭爲什麼要強調存文會十教授乃至整個文化復古運動底企圖，並且‘弦箭在上，不得不發’地傷到了我們底‘同道’鄭振鐸先生和他主編的世界文庫的理由。

可是我底文章卻引起了幾個人底反感。首先路見不平的是一位立波先生，他在二月間的大晚報火炬上說我不該對‘在政治上是很純正的文學者’鄭振鐸先生加以‘謾罵意氣’，對於文學遺產的態度又太輕率；末了，爲了表示他底公正，還說世界文庫雖然也怎麼，可是‘沒有嚴正的批評態度’和‘沒有說服人的能力的’我，則不配開口云云。同時大晚報的星期文談和別的小報也有同樣的意見發表。並且文學三月號有一位‘源’底‘再談翻印古書’，似乎在竭力說明世界文庫底翻印古書和別人怎樣不同，曾爲那些名著耗費了多少‘時與力’，‘名著何不幸而以中國文字寫出之’呢？——爲那些古書呼冤，說我底意見‘幼稚’，‘扭曲’，是‘絕對排斥古書者’等等。——對世界文庫耗費了‘時與力’之類的事都知道得這門清楚，我們可以知道這位‘源’先生即使不是鄭振鐸先生自己，也一定是一位

和鄭先生很接近的‘同道’。

也許真像立波先生所說，我沒有那樣高貴的‘精神’和‘能力’，所以鄭先生和他底世界文庫雖然不是‘沒有值得訾議的地方’，倒是‘有值得商量的地方’（立波先生底話，）我底文章，也終於引起看起來像是浩浩蕩蕩，其實不過一兩個人在那裏虛張聲勢的反感。可是有‘能力’和‘精神’的‘前進的文學者’立波先生之流，明知道鄭先生和他底世界文庫有值得‘訾議’或‘商量’的地方，而到現在為止，卻不肯稍稍地‘訾議’或‘商量’一下，那末，我們不能不‘慰情聊勝無’地暫時以我那篇文章爲滿足。‘如果因爲皓月，忽視了微燦的晨星的存在，那只能說是自己觀察的輕率’，這不正是立波先生自己底話麼？何況立波先生們底‘皓月’又始終不肯出來！

立波先生指出我那篇文章底最大的缺點，似乎就是‘謾罵意氣’，輕輕用‘謾罵意氣’四個字來抹煞全文底意旨，我用不着問：是不是有‘私見的存心’（立波先生底話）：我感覺得‘遺憾’的是我底文章爲什麼是‘謾罵意氣’，立波先生並未交代清楚。我說鄭先生底世界文庫爲存文會十教授服務，是第十一教授，那不過恰如其分地說了一句真情實話而已。十教授宣言劈頭一句是‘沒有了中國’，所以要建設中國本位文化，世界文庫正是以中國古董爲本位，中國古董簡直佔了世界文庫底一半

的大刊物。雖然我們不能說世界文庫底畫一定是受了十教授底唆示，可是世界文庫把一半的篇幅獻給了中國的舊古董和十教授底意見英雄‘所見略同’，卻是事實，關於這，以後還有機會提到，這裏不過舉出一個最顯明的例子罷了。

立波先生說鄭先生是‘在政治上是個很純正的文學者’，我一點兒也不想反對；不過如果‘純正’底意義是沒有任何色彩’任何其它作用而又不偏不倚，不左不右的話，我就很爲立波先生擔心：杜衡先生之流會來向‘前進的文學者’立波先生握手道謝；不錯，時間是已經很遲了，可是立波先生總算給他們證明了‘第三種人’底存在，最好的範例就是鄭先生。魯迅先生在無聲的中國裏曾描出過一張‘純正的文學者’底高容，讓我們在這裏借重借重吧：

……待到滿洲人以異族侵入中國，講歷史的，尤其是講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殺害了，講時事的自然也被殺害了。……所謂讀書人便只好躲起來讀經，校刊古書，做些……和當時毫無關係的文章。（旁點引用者加的。）

現在讓我們來談談立波先生所說的‘文學遺產’也就是‘源’先生所‘再論’的翻印古書的問題。

‘文學遺產’這名詞底老家是蘇聯，所以立波先生特爲提出：‘蘇聯對於舊文學狂渴的追求的情況，圖解了將來中國的文學活動的一面’。這話自然不錯，可惜他忘記了蘇聯的情況，

雖然‘圖解了將來中國的文學活動的一面’，卻並不足以圖解中國現在的文學活動；因此，不能證明世界文庫在現在的中國翻印舊書是應該的。我們知道蘇聯文學界提出‘接受遺產’這問題。只是最近幾年的事。最近幾年的蘇聯，舊文化的社會基礎已經完全摧毀，新的文化已經在一種堅實的基礎上面建立起來，爲一種從古沒有的力量所充塞，支持，它底發展又達到了蘇聯所獨有的高度。蘇聯的文學正和它底政權一樣，已經到了決不是任何舊勢力所能侵害，動搖的時期。到了這種時期，把過去文學中有用的東西整理出來，作爲遺產而接受，使它有益無損地爲新時代的人們所享用，是必需的。至於中國的情形完全兩樣。舊文化底勢力和它底社會基礎還佔着絕對的優勢，大多數無智的大衆還被傳統文化緊緊地束縛着。有人說過：‘中國的文學是整個的，並沒有死掉，何來遺產呢？’說這話的人底意思怎樣，暫且不管；借這話可以說明現中國還幾乎完全是舊文學底勢力，所謂新文學只在通都大邑的一部分知識分子中才有它底影響。何況存文會十教授等等正在竭力地要保存那‘難懂的古文字，陳舊的古意思’，要用它們來繼續地麻醉，撲滅那一點點可憐的新文學底影響，使‘無聲的中國’變成死滅的中國呢？這時候，明明顯顯像魯迅先生所說，我們只有兩條路，一條是抱住中國的舊東西而死掉，另一條是拋棄中國底舊

東西而生存！(參看無聲的中國。)不用說，對中國的舊古董裏面的較好的東西加以整理或批判，我們現在也未嘗不需要，可是那要對現中國文化運動有真正的了解，有爲未來的文化而奮鬥的決心，同時又有真正能够消化那些舊東西的能力的人才談得到。像世界文庫那樣無批判地翻印，對證幾種不同的本子或校勘幾個不同的字的辦法，是相差十萬八千里的。

一九三五年，上海的進步的文化人發表過一篇‘我們對於文化運動的意見’，鄭振鐸先生也是列名者之一。那意見書一開頭就提出了反對讀經的主張。爲什麼要反對讀經呢？像立波先生‘源’先生或鄭先生所理解的一樣，那些經書，豈不正是中國的文化或文學的遺產麼？像詩經豈不是一部古代的民間文學麼？世界文庫上所翻印的王右丞集花間集，南唐二主詞，王梵志詩之類不都是從詩經底影響之下出來的麼？無論從什麼立場說，詩經底價值會低於王右丞集那些東西麼？詩經，書經，易經不是有人正根據它們來研究中國古代社會麼？孔子，孟子不都是當時的思想家政治家麼？他們不是有不少的意見，到現在還有着價值麼？像孟子那樣雄辯的文章，作爲文藝作品，豈不是也很可寶貴的麼？然而一百幾十個進步的文化人卻一致地反對讀它！前不久，有人反對勸青年讀莊子，文選。又爲什麼要反對呢？莊子，文選豈不也像立波先生‘源’先生或鄭

先生所理解的一樣，是中國的文化或文學的遺產麼？像莊子，從那書裏頭所包含的哲理看來，豈不是一部古代的哲學寶典麼？現在豈不是也有人從那書裏頭找出辯證法或唯物論底影子麼？從那書裏頭所包含的寓言，故事，以及那文章底潑刺，奔放看來，豈不又是一部絕好的古代文學書麼？從哪一點看來，它會比世界文庫上所翻印的集異記，艾子雜說或某人尺牘之類的東西還要沒有文學價值呢？然而又有人反對讀它！這些人對於‘中國文學遺產’的態度，真是瘋狂一樣的‘輕率’呀！

然而我們要說這些反對讀經，反對讀莊子，文選的人底意見是對的。因為經書和莊子，文選都是‘難懂的古文字，陳舊的古意思’。因為它們統治了中國幾千年，使中國變成‘無聲的中國了’。因為要使無聲的中國變成有聲，切需的是用現代的容易懂的新的文字和新的意思寫的書籍，決不是經書或莊子，文選之類的東西。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從白話文到新文字的語文運動就是沿着這一直線而展開的。自然，反對讀經或反對讀莊子，文選，都不是反對一個思想已經相當成熟了的人讀，更不是反對一個專門家底研究，卻是反對強迫或栽給一般大眾或中小學生們讀。疑古玄同，顧頡剛，郭沫若，周子同，都讀過經，李石岑，施蛰存大概讀過莊子或文選，鄭振鐸，施蛰存以及立波先生‘源’先生們又都喜歡金瓶梅之類，這裏頭上果還有什

麼問題，大概也不會有人聯名發宣言來表示反對。只有把那些東西翻印出來，用一折幾扣的辦法或編成期刊的辦法，搬運到讀者大衆的面前，才會有人不能不講幾句話。我反對世界文庫翻印古書，和別人反對讀經，反對讀莊子，文選，沒有什麼原則上的不同。我不是像‘源’先生所說的‘絕對排斥古書者’，十幾年前，疑古玄同先生就說過：‘古書的文字難懂，編製不當，倒還在其次；所可慮者，古書是古人做的，杜撰的事實，荒謬的議論，觸目皆是，它從今以後，只適於給頭腦清楚的專門學者作爲史料看，絕對不適於一般的青年學生作爲文化看’（按：本文題目爲‘一條很長的狗尾巴’）。想不到到了現在，還有立波先生說我底意見是對於中國文學遺產的態度的‘輕率’！

至於‘源’先生在文學上所說的話，像世界文庫和別的翻印家不同，耗費了‘時與力’，‘豈是他全無用的’之類，如果作爲對於我的回答，可說是完全落了空；我底意見和他所懸擬的論敵底意見。沒有絲毫相像的地方。不錯，鄭先生翻印的書，我們可以相信它和別人翻印的不同：第一，在斷句分段上，他該比陶樂勤，許嘯天，林語堂，劉大杰之流要有把握一點；第二，他對證的本子多，翻印出來的書就有‘×本作×’之類，可以使人節省時間或少遇到一些錯漏；第三，有的據說還是孤本，不過如果真是孤本，也就無所謂和別人底同不同了；第四，第五，大

概還有。不過我說的是那些古書該不該翻印的問題，這樣的不同，即使舉出一百條來，我也不會重視的。其次，鄭先生對那些‘珍本的搜集，標點，校勘，大概也真耗費了不少的‘時與力’；可是我們要問那‘時與力’費到什麼東西底頭上了；如果是世界文庫上翻印出來的那些東西，感謝這勞績的應該是存文會，十教授那方面，‘源’先生或鄭先生自己都似乎不必來向我們表功。

也許‘源’先生或鄭先生會辯解說，世界文庫也翻印得有並非‘難懂的古文字’，也不一定是‘陳舊的古意思’的作品，例如金瓶梅。金瓶梅底文學價值和它底毒素究竟怎樣，我沒有這們多的閒工夫來細心研究；退一萬步說，就算金瓶梅一部十全十美的書（我想‘源’先生或鄭先生和立波先生也沒有這勇氣承認吧，）也仍舊不能駁倒我對於世界文庫的論點，因為世界文庫除了金瓶梅，古文字，古意思東西絕對地佔着多數。我雖說買不起世界文庫，就我借到的從第一到第五冊說，像前面提到過的以及別的許多東西，就都是古文字，古意思。要我舉例麼？那末，我不加選擇地從每冊的第一種中鈔出第一篇來看看吧：

第一冊，第一種是袁鋼著的‘傳奇’，共二十九篇，佔篇幅三十頁，每篇都有相當長，這裏鈔的最短的一篇，題為‘五台山池’；

五台山北台下，有龍池，約二畝有餘。佛經云：‘禁五百毒龍之所’。每至
亭午，昏霧暫開。比丘及淨行居士，方可一觀。比丘尼及女子近，即雷電風雨
時大作。如近池必爲濕氣所吸，遶巡而沒。

第二冊，第一種，王維底集下，共佔八十二頁，第二、第三兩冊分載。這里
鈔的第一首題爲‘白鸚鵡賦’底第一段：

若夫名依西域，族本南海。同來喙之清音，變綠衣於素彩。惟茲鳥之可
貴，諒其美之斯在……

第三冊，第一種，還是王維底詩，不再鈔；第二種，是廣南二主詞，佔十
六頁，這里鈔的第一首是李煜底‘應天長’上半闕：

一箇初月臨粧鏡，蟬鬢鳳紋慵不照。重簾靜，層樓迥，惆悵落花風不定。

第四冊，第一種是薛用弱底集異記，共十六篇，佔十頁。這里節錄第一篇
‘徐佐卿’：

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迴翔焉。上親御弧矢，
一發而中。其鶴則……歟然審輪，西南而逝……益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
焉。……每有自桐青城道士徐佐卿者……一歲率三四而至焉。……一日忽自
外至，……講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然此箭非人間所有，
吾留之于壁上’……及玄宗避狄幸蜀……偶至斯觀……忽觀掛箭，則命侍臣
取而玩之，蓋御箭也。……

第五冊，第一種是王梵志詩，現鈔第一首：

兄弟須和順，叔姪莫輕欺。財物同口口，口中莫畜私。

以上的材料，都是用‘難懂的古文字’寫的。雖然這樣，只
要有多少並非‘陳舊的古意思’也未嘗不可；可惜的是，從那些
東西裏頭，似乎嗅不出一點兒不是‘陳舊的古意思’的氣味來。

還有，‘源’先生底意思好像說，世界文庫所選擇的材料都是名著，只要是名著，雖說也是‘難懂的古文字陳舊的古意思’也就百事大吉了。好的，我們正怕說那些東西不是名著？如果說是名著，那好辦極了。王右丞詩集，王楚志詩之類既是名著，李，杜，元，白底詩自然也是名著，魏，晉的曹氏父子，嵇，阮，陶，謝底詩大概也是名著，追溯上去，詩經不成問題地更是名著，集異記，艾子雜說，湯顯祖尺牘之類也是名著，則從經書莊子，文選，到閱微草堂，子不語，聊齋誌異，袁中郎，曾文正公，小倉山房，秋水軒，唐註寫信必讀也就無一不是名著了。這樣一來，決不是‘名著何不幸而以中國文字寫出之’，倒是文章何幸而以中國文字寫出之——一寫出就都成為名著了。名著既都應該翻印出來，中國的名著又真是‘若汗牛之充棟’，除了當一折幾扣的書店老板，大規模地把無論什麼都翻印，還有別的辦法麼？既然這樣，我倒要問：鄭先生是不是在沉默地主張讀經，讀莊子，文選呢？是不是在沉默地宣揚舊文化呢？是不是在為存文會，十教授乃至整個復古運動服務呢？記住，關於這一點，立波先生雖然說我不該把鄭先生和存文會，十教授‘相提并論’，唯一的理由卻只是因為鄭先生‘在政治上是很純正的文學者’，這似乎并不能表現立波先生底‘說服的能力’。‘源’先生也沒有替鄭先生加以一個字的申辯。其實我並沒有說鄭

先生存心地爲存文會，十教授服過務，也沒有說鄭先生底一切‘作爲’，都是爲存文會，十教授服務，更沒有說因爲他現在爲存文會，十教授服了務，我們就可以抹煞他底過去或限死他底將來。如果‘源’先生或立波先生以及還有別的什麼先生，了解這一點，他們底反感或者會少一些的吧。

以上是我對於世界文庫翻印古書這件事的意見。絕對沒有錯，我不能說；在根本的信念上卻不能任何的讓步。‘源’先生，立波先生，還有別的什麼先生，如果還有指教，非常歡迎。不過我要請求：嚴守辯論範圍，顧全辯論道德。如果逃避論點，用別的什麼大帽子來壓人，我只好預先在這裏告饒認輸。這不是我底過慮，也不是無的放矢，未來的事情我不知道，現在的立波先生和一位鼎先生已經對我祭起‘團結’或‘聯合’的法寶了。聽，他們口中噙噙有詞，好像在說我批判了鄭先生，就是在‘國難當前’的現在也不肯‘團結’的涼血動物，甚至是破壞‘聯合’的漢奸或‘分化’‘前進作家’的‘敵人’，法寶一祭起，我就非現出原形不可似的。這手段自然非常值得佩服，可是對於我們所討論的問題究竟解決了什麼呢？

不錯，國難當前，高壓在上，應該聯合一致，共同奮鬥。如果‘不求甚解’，也未嘗不可像立波先生所說‘把不同意見的細節，消融在共有的同胞的熱情之中，’或者像鼎先生所說（文學

三月號作家們聯合起來！)’在這個苦難的時代，在這個存亡危急的關頭，有什麼個人的嫌隙芥蒂可容存在呢？’於是，‘只要還有一分得救的希望，便都該救他’。‘爲叢驅雀，驅之於敵人的營幕之中’自然‘是最不智的辦法’了。可是在專門對我的場合，這些意見卻太奇怪。怎麼？我說過現在不該團結或聯合，倒應該分裂麼？我有什麼‘意見的細節’，沒有‘消融’麼？鄭先生底世界文庫翻印古書只是一種‘細節’麼？我和鄭先生有什麼‘個人的嫌隙芥蒂’麼？我曾主張不‘救’他，把他‘驅’到什麼地方去麼？這些閃閃爍爍的詞句‘葫蘆裏究竟賣的什麼藥呢？’老實說，這種不大磊落的態度，就會是‘團結’或‘聯合’底真正的敵人。

依我底理解：團結或聯合是需要的；但那是要集中我們共同的力量，卻不是要解消我們各自的工作。因此那團結或聯合，就只能統一那可以統一，必需統一的某一點或某幾點，譬如‘共赴國難’之類。至於根本不能統一之點，是無法‘消融’，也不是‘消融’所能了事的。鄭振鐸先生以名著欣賞之類的理由翻印古書，我從語文運動的立場來批判他，這是我們根本不能統一的地方；我不會因爲這就拒絕他共赴國難，他大概也不會因爲這而不共赴國難。那末，縱然我們在這一點上鬧得勢不兩立，在共赴國難這件事上還是可以一致的。這就是說，我批

許鄭先生並不是表示我反對團結或聯合，更不足以破壞團結或聯合，這裏似乎用不着過度的擔心。

如果把問題弄得更深入一點，我們可以說，正因為要使團結或聯合健全起來，使不能統一的地方也逐漸統一，或接近起來，相互間必需有無情的自我批判，使大家因為團結或聯合變得堅強，勇敢；決不能彼此反而嬌嫩崔鶯鶯似地，‘開卷怕風吹，掩卷怕紙壓’，無緣無故地增加了許多顧忌。不錯，‘只要有一分得救的希望，便都該救他’；可是這‘救’只有從開誠布公地說出自己要說的話，指出那被救的人底所有的缺點和應該努力的方向開始。需要被救的人也只有坦白地接受批判。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自己必需克服的缺點，才能得救。否則，救人或被救，就都只是官樣文章，裏頭隱藏的是：遮掩，無視，迴護或欺騙。於是，團結或聯合，裏頭所有的只是些烏合之衆，能發生怎樣的力量是很可疑的。

至於‘爲叢驅雀’，我希望只是成語底濫用；否則，對於鄭振鐸先生和所謂聯合都是一種侮辱。因為這是說鄭先生只能受人恭維，擁戴，一受批判，就會像小雀兒一樣飛到‘敵人的營幕中’去。鄭先生竟這樣容易飛，聯合裏頭竟有這樣容易飛到‘敵人’那裏去的分子，那還成什麼話呢？其實，在團結或聯合底內部，如果有人對於另外的人加以理論上的檢討，只能問他

底理論對不對，不能管那被檢討的人飛不飛。如果對，別人飛了，那責任應該飛的人負。使‘敵人的營幕’裏多一個工作者固然很糟；在自己底隊伍裏卻少了一個非我族類的害羣之馬，又未必不好。如果不對，縱然別人不飛，難道就因此而對了麼？這種場合，‘爲叢驅雀’的成語，似乎並不怎樣適用。自然，文壇上的一些怪現象是有的，程木天先生從前因爲某文壇大亨曾發過這樣的感慨：‘打虎還須親兄弟，上陣還須父子兵’；像那樣的家天下主義者，借團體或別的什麼來發揮他們父子兄弟底‘私見的存心’，造謠生事，誣友爲敵，憑空造出‘個人的嫌隙芥蒂’；又因爲‘嫌隙芥蒂’不惜給人以任何打擊。這樣事不是沒有碰見過；可是似乎不是‘爲叢驅雀’這個簡單的成語所能概括。

總之，團結或聯合是一件事，我冒犯了鄭振鐸先生和他底世界文庫是另外一件事。說我底文章一定會影響到團結或聯合，縱然出於至誠，也只是一種素樸的見解；何況立波先生和鼎先生底那些閃爍的詞句，充分地表明他們提出這一意見，不過是一種戰術？過去的事且不多談；從現在起，如果我們還要討論這一問題或別的問題，大家都應該讓自己底態度‘嚴正’一點，或者說，坦白一點。

一九三六，三，二二，上海。

談 野 叟 曝 言

上

林語堂先生再三向我們推薦野叟曝言，認為他在一九三四年中第一部愛讀的書。他底推薦，大大地煽動了我讀這部書的熱情。可是我讀了之後，很奇怪林先生爲甚麼要再三推薦。因爲這部書，不但骯髒腐臭，無一好處，並且與林先生平日的主張，在許多點上，剛剛完全相反。

一 方 巾 氣

林先生對‘方巾氣’的深惡痛絕是周知的。方巾氣，無論林先生有甚麼獨特的解釋，我們把它想爲三家村迂夫子底腐氣，

俗氣之類，該不會錯得很遠。野叟曝言是一部最方巾氣的书，無一句不腐，無一字不俗，只要是個清醒的人都會看出；以後還要引用原文，即使不讀原書，也可以略見一斑的。

所謂腐氣，我底意思是指見識狹隘，食古不化，迂執頑固，不近人情之類。野叟曝言底中心思想，恰恰是這樣的。書中主人公文素臣討了一個姨太太名叫璇姑，是懂得一點數學的。無所不知的文素臣就指點她底數學；因而談到天文方面的問題。

璇姑笑道：「天地謂之“兩大”，原來地在天中，不過這一點子，可見妻子比丈夫小着多哩。」素臣笑道：「若是妾膝還要更小哩」。

從天文上悟出這樣的妙理，真可算得腐氣冲天了。但這樣的例子是舉不勝舉的，現在只舉一幕最可笑的悲喜劇。這幕劇中，主人公文素臣不登場，登場人物：

任夫人——縣長太太。

鸞次——文素臣底父親底大小姐，曾落水中，被文救出，想嫁文為妾，被文曉以大義，已與人訂婚。

素娥——鸞次底丫環，已給文為妾，但未成婚，由鸞次認為義妹。

湘靈——任夫人底長女，曾以重症被文醫好，想嫁文為妾，正在家害單思病。

素文——任夫人底次女，湘靈之妹。

其他丫環老嫗丫之流。

交待清楚，請看正文。

任夫人大慟道：‘京中有人來說，文先生直言觸怒，綁在午門候旨處斬’……夫人話未完，鸞吹素娥已放聲大哭，湘靈淚如泉湧，面若死灰，素文也滾出滿眼的淚來。鸞吹想起前情，哭暈了去；湘靈一陣心酸，把吃的幾杯酒兒都倒出來……素娥哭得發聲；連那晴霞丫頭也是掩面悲啼，和素文兩個，靠着東壁邊哭泣；其餘丫環僕婦，沒一個不嘔嘆長吁。

亂了一會，任夫人道：‘……大小女雖未有成言，然已心許文郎，斷無改節之理’……

素娥哭道：‘……姪女俟得確信，當招魂設祭，以一死謝責，不復計及它事矣’。

湘靈道：‘孩子也是這個主意。勦勞之德，當報以來生。’

鸞吹哭道：‘……文兒此信果確，我亦何忍偷生？當與你（素娥）同向黃泉，報知己’。

老實地招供，我沒有看見過這樣怕人的文章。一個男人要死，害單思病的女人底母親妹妹以及丫環僕婦都如喪考妣，害單思病底女人底母親簡直就說已經‘心許’，就‘斷無改節之理’，沒有成婚的姨太太與連婚姻的影子都沒有摸着的害單思病的女人都要‘以一死謝責’，甚至已字他人的名門閨秀也要‘同向黃泉，以報知己’，這真奇到無以再奇，怪到不能再怪了。但是何不爽興說任夫人和她底小女兒以及丫環僕婦都要一齊‘殉節’，以表出文素臣底了不得呢？這不是方巾氣，這是方巾氣千百倍以上的東西！因說是腐氣，未免小看了它。

所謂俗氣，我是指那滿口仁義道德，滿腦子卻是功名富

貴，妻財子祿而言。野叟曝言對這一點，是描寫無以復加的。文素臣那樣一個大英雄，官做到一人之下自不待言；他有六個老婆，二十六個兒子，成百的孫兒。內面有好多兒子是‘尚主’的，皇王貴族，搶地搶地要和他家聯姻。專說他底大兒子吧，八歲點狀元，九歲做巡按，十一歲做巡撫。可惜寫得太多，不知該舉那一個例子才好，這裏只鈔幾條回目給讀者看看吧！

第五十八回：三女明婚鸞諧鳳合 一人暗卜夫貴妻榮

第八十五回：五男抱兩皇子靈法通神 一旬產四男兒麟祥駭世

第一百二十四回：五星聚井五星聚奎 三案得男三案得女

第一百三十六回：九子奪魁會元復歸門婿 百子介壽男女尚執外孫

第一百四十一回：百世推恩侯伯子男遞衍 千秋異數君臣后妾同誼

第一百四十五回：五百道賜符三聖同野 七十回獻壽六寶齊時

第一百四十七回：九萬里外聖生祠 百壽堂前開總宴

記得有兩句詩：‘飄然一隻人間鶴，飛來飛去宰相衙’，野叟曝言‘飛來飛去’離不了功名富貴妻財子祿，庸俗之態歎觀止矣！

二 性 靈

林先生是標榜着性靈的。反對方巾氣一定會愛好性靈，因為性靈與方巾氣是不能兩立的對頭。野叟曝言既然是方巾氣十足的書，不知性靈為何物是不用談的，只說從頭到尾，無不東剽西竊，沒有一句自己底創見這一點，就可明白與林先生底主張是如何地相反。當然，把別人底意思，寫入自己底文章，是

常有的事；但整段的鈔襲總未見有人恭維，并且總該不是性靈，如果性靈的解釋中，有一條是‘說自己底話’的話。現在就舉幾條最明顯的鈔襲以示例：

這日正走到東阿縣地方……素臣道：‘……此處山勢險惡，恐有歹人出沒，須要小心’。

大郎道：‘小人也是這般想頭。但托相公本事，就有盜賊何足爲懼？就是小人，仗着相公傳授並自己的膂力，約摸三五十個漢子也還抵擋得住。這強盜若想着我們，可知晦氣哩’。

大郎正在誇口，早有一人縱馬而過。說道：‘好大話’！一頭笑着，把馬加上一鞭，飛也似的去了。——第十回

這是‘劉東山誇技順城門’的故事。

喇元見遲疑，毒龍強之再三，只得出城。見素臣一人一騎，只跟着三五個小兵，便把苗兵約住，也只帶得二十餘人跟着，策馬相見。素臣把從人退後，喇元恐有機密，也把從人退下。素臣舉手道：‘道人別來無恙……道人貴庚？令郎貴庚？’

喇元道：‘貧道今年五十，小兒十九歲了’。

素臣道：‘那年相會，還是孩子身量，今已弱冠，光陰迅速如此。道人年已五十，該替令郎完婚，早得抱孫方好。請問令郎曾否定親？……’

喇元見素臣並無一句正話，惟入喇一般，似涉機密，口聲又比前高些……正待欲問息兵之說，素臣已拱手而別。——一百回

這是‘曹操抹書問韓遂’的故事。這段談話以後的情節’也與三國演義完全相同。

素臣道：‘我若死了，不消幾日，滿身皮肉就臭爛起來，七竅中流出血水，

蛆蟲爬滿，臭穢難聞……你看着可愛不可愛？再到後來，髮脫肉消，光剩一個無眼無鼻的骷髏，幾條蟲蟻食剩的枯骨，你看着可愛不可愛？

素臣道：‘人有不死的嗎？只消在這上頭着想，那淫念就消散下來，不特我久後必如此，即你的花容月貌，到那時也一樣被蛆蟲攪食，血肉淋漓，過後單存一個骷髏，幾條枯骨，——第六十八回

這又是從天開榜上狄仁傑底‘若將美色思亡婦，遍體蛆鑽減色心’儼來的。這樣妙論，在這書上反覆過幾回。

不但鈔襲稗官野史，正經書上的離奇怪誕的材料，毫不客氣地剽竊。借‘鎔經鑄史’之名（這書有兩句標語：‘奮武揆文天下無雙正士，鎔經鑄史人間第一奇書’，）行東抄西襲之實，是這書底拿手好戲。顧全篇幅，不能多舉。

三 大 腳

林先生寫過一篇文章題爲說大足是主張個性，主張自由，擁護德謨克拉西，反對思想上的定於一尊的專制主義的。他近來的文章，都被這一思想貫串着；前面舉出的反對方巾氣，揭發性靈，也正是這一思想底表現。他底意見對不對是另一問題，我想說的是野叟曝言在這一點上又剛剛和他底主張相反。書中的英雄，就是只崇‘正學’，力闢‘邪道’，否認思想自由的人物。我們看他底志願吧：

慨自秦漢以來，老佛之禍幾千百年矣。程文公原道雖有‘人其人，火其書，

廬其居’之說而托諸空言，雖切何補？設使問時而駕，遇一德之君，指千秋之紫，要掃除二氏，獨尊聖經，將吏部這一篇亘古不磨的文章，實實見諸行事。天下之民復歸於四，天下之教復歸於一，使數千百年蟠結之大害如斷新脫，此則弟之夢想而不敢妄冀者也。——第一回

不用說，這一思想也是全書都貫串着，到處都闡揚着，主人公更是身體力行着。文素臣做了宰相之後，對於這一問題，曾有一篇皇皇大文的本章，可說是這部書底思想底結晶，現節錄幾段以供欣賞。

易曰：‘乾，元亨利貞’。而孔子釋之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見仁義禮知，在人之四德，即天道之元亨利貞，而非可歧而二之者也。乃老子則曰：‘大道廢，有仁義’。又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而以杳冥昏黯者爲道。廢實事而尚虛無，薄恩義而高曠蕩。後世申綽商斯慘刻之政，伶籍姬宴縱逸之行，罪浮於桀紂而禍結於生民者，皆老氏之邪說有以啓之。其餘煉養、服食、符籙、科儀諸術，皆托於老氏而戕人之生，惑人之心，破人之家，亡人之國，尤指不勝屈。……至於釋氏則並以天理爲隙，而獨守其知覺運動之心。其明心見性之言，既足以荒智士之精神，使吾儒仁義禮智，萬善具足之心，一變而爲空虛無用，幻妄無常之心。其輪迴懺悔之說，復足以惑愚夫之心志，使彼誓命德討罪，萬古有常之法，一變而爲製綱設紀，萬惡必赦之法。……朱子云，浮屠氏之說，亂君臣之禮，絕父子之親，淫誣詭詐，以廢誘一世之人而納之於禽獸之域。固先王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臣愚以爲老氏之誕，較佛當爲未減，而充塞仁義，均爲害世之勞，其亂政之罪，實浮於少正卯，固宜與佛氏同致兩觀之誅，而不可使其教一日姑容於聖世者也。——第一百二十九回

這書中只舉出了佛老，是因為作者是個迂夫子，只讀過幾本古書，並不知道天下國家大勢；雖說在他之前及和他同時存在的‘異端’，已經不止佛老二氏，他卻茫無所知，或略知一二，又苦無成文可鈔，自己肚子裏拿不出貨來，所以一字未提。佛老該不該闢，他闢的意見對不對，不在本文範圍。要林先生注意的是，他所渴慕的思想自由，德謨克拉西，在他最愛讀的書野叟曝言中也是找不出的。

四 心 靈 不 健 全

林先生有一句名言：‘中國人心靈根本不健全’。這句話是值得相當的恭維的。現在正有許多人以為中國的東西甚麼都好，中國人底心靈自然更是十全十美的寶物。林先生底話對於他們是很有用的。不過‘中國人心靈根本不健全’這話裏面，包括得有‘外國人心靈健全’的意思。林先生所指的外國人是甚麼雖無明文，從他底別的文章看來，決不會是指非洲人或澳洲人，印度人或菲利浦人。那末，如果是指歐美人，他們和中國人不同的地方，不是心靈，而是養成他們那種‘健全的心靈’的社會組織。歐美人生活在資本主義發達的社會，中國人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彼此底‘心靈’當然不能一致。林先生把這根本原因看掉了，好像‘心靈’是甚麼天賦的東西；立論是頗有可疑的。

現在沒有工夫和林先生討論這一問題；只要告訴他，他所最愛讀的書野叟曝言，正跟他所鄙視的許多中國人一樣，是一部‘心靈根本不健全’的東西。當然‘心靈不健全’，也可以有各種不同的解釋，我想，這書中的（一）色情的誇張，（二）非刑的贊歎及吃人肉的嘉許，這幾點，如果作為‘心靈不健全’的例子，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野叟曝言是一部禁書，原因就在於淫穢。最厲害的部分是有個歡喜吃男人底精以為滋補的人，把文素臣關在家裏，獻出十六個姨太太，赤身裸體，玩出種種猥褻的把戲，引他衝動之後，和他輪交，以便到了相當程度，主人出來吃精。可惜那文字實在太猥褻，不便引出，且鈔幾條從字面上就可略窺內容的回目：

第五回： 綉被尋春毓放登徒色膽 危崖勒馬驚殘倩女香魂

第二十四回： 丫環帶玉貌洩漏機關 公子觀花客安排坑窖

第二十五回： 單二姨暗調銀汞 李四嫂明做黃婆

第二十八回： 連公子丹房求秘策 李嫂兒病榻說風情

第二十九回： 小姑嫂看淫書津津講學 老夫妻吃熱藥狠狠幽春

第六十六回： 十六妾奉先生為龜臉面 三百鞭笞貞婦強盜心腸

第六十七回： 男道學還看花蕊 女狀元獨占鰲(龜)頭

關於非刑及吃人肉，有兩段很好的文章：

內監們傾擁着靳直到東宮來。在東宮立傳文恩，令其饕食逆膽。文恩雖曾吃過扶王真人腦髓，然死活不同，眼看着靳直生眉活眼，怨苦戰慄之狀，如

何敢去吃他？

衆內侍道：‘文哥，你平日說忠說孝，他惡逆之事千千萬萬，數說不盡，只把萬歲爺囚禁木籠之內，這一件上，也該吃他腦子了。……’

文恩聽說，忽然兩目一張，髮具豎起，便一手揪住靳直額顙，要用指去掘挖。玉奴阿錦已打就銅管，小的一頭，其尖如錐，其銛如刃；慌忙遞上。文恩接來插入，靳直大喊一聲，待要掙滾，被玉奴阿錦四隻尖手用力擠住，休想動得分毫。文恩用氣一吸，骨都都的，莫說腦髓，連鼻涕眼淚都一齊收入肚子去了。

衆內監將靳直打出宮外，用冷水噴醒，先把各人打就的鐵錐，你一錐，我一錐，錐得兩鬢如絲網一般，千孔萬竅，鮮血直射。……又把鐵絲插入砍斷腸物中，直梢進小肚中去……把鐵子來錐毛髮，錐得頭似血膠，身如血漿。幾十番死去，俱被冷水噴醒。衆內監還不盡興……去看宮人們怎樣處置鳳氏。

只見鳳氏兩腿錐空，毛髮盡拔……仰睡在地，將兩隻小腳縛住，套壓頭後，北戶向天，北內潑油，宵人燭燃，將火點着……已燒成一大窟窿了。——
第一百一十三回

素娥道：‘桂姨（吃人肉的人底丫頭，現被長子收房）說：世子（吃的人底長孫）沒有陸見，賜鹿脯是假；疑是割股。進房偷看，見罐內有肉，便也割股肉煮湯。見太夫人愛吃，甚至歡喜。私向側媳說道割股療親是真。……側媳愚昧，便也割了股肉。……側媳之後，便是三妹（吃的人底次子底第二正妻，）初六姑娘（女兒）合任夫人（次子底岳母，）昨日郡主（次子第四妾）合大姐（義女），今日麟、鳳（俱孫兒），明日鸚、鵲（俱孫兒），後日鳳姐、蛟姐（長孫妻妾），俱是爭定的日子。十一日起，周而復始。（註解筆者所加。）——第一百二十九回

我不是說非刑或吃人肉就不該描寫，但那認爲天公地道

的態度，是值得起反感的。割股療親，書中雖也說是愚蠢行爲，卻也表示着嘉許的態度。并且這樣大規模地割股，割到乾女兒，親家母（兒子底丈母）身上去，也怕是這書上所特有的。這樣的事，一個心靈健全的人，不說大書特書地來表張，就是夢想也想象不到的。

五 白 中 之 文

然而林先生說得最振振有詞的理由是野叟曝言是用很好的話寫的。說句笑話，林先生底‘文中之白’，‘白中之文’，本來連他自己也纏不清楚。這書的主人公恰巧名叫‘文白’（字素臣），難怪更是炫花了眼睛。固然這書大部份是接近口頭語的文字，但也很呆板的，談不上是很好的口頭語。從前面引過的幾段話中，已可看出比紅樓夢、水滸、儒林外史差得遠遠，雖說這部書是在它們以後出來的。就算這樣已經很可貴吧，但這書卻用了很多的文言，并且常常用在最不該用文言的地方——對話。

母親對兒子講話，偏好咬文嚼字，說出駢文式的話來的事，該是少有的吧。我們看這書中怎樣寫：

水夫人怒罵道：‘你這逆子！枉讀詩書，空列學校。豈不聞瓜田李下，君子不居；濮上桑間，詩人所刺？施恩望報，乃鄙士之胸襟；爲德不卒，豈通儒之度量？背柳下坐懷，不聞貯之金屋；營男拒色，惟知閉此柴門。乃敢陽托知恩報恩之名，陰行知法犯法之實……——第七回

像這樣的對話，書中很多，不能盡舉。最可笑的是，不但駢文，連八股文的對話也有——讀者如不明八股文體例，最容易找的參考資料是石印本西廂記前面，很有幾篇‘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之類題目的文章即是。

某廋入至樓下，頓道：‘柳絮因風，青聲激耳。黨家金帳，固屬癡肥；陶氏葫蘆，亦嫌寒瘦。踏雪讀梅句，較嚼雪讀楚詞，清標愈上。未識伊川夫子肯許門外人立雪三尺否也？’

那人微笑，延進客坐，答道：‘冰城吐醋，寒谷生春。袁安僵臥，固屬忘情；子猷返棹，亦嫌動興。踏雪尋梅，較踏雪尋梅花，冰腸愈熱。未識富春老子足與天上人臥分半榻否也？’

長卿大喜道：‘寶劍自獄中化去，千將猶落塵寰耶？惜未得華陰赤土，一拭龍文耳’。

那人答道：‘奇峯從天外飛來，泰山瓊觀，玉壘瑤宮，未具南宮象笏，一拜丈人耳’。

長卿道：‘孫登鳳嘯，弟實聞所聞而來。桃源姓氏，乞向外人一道’！

那人道：‘嵇康箕踞，君應見所見而去。瀛洲氏籍，恐非野人可知’。

對話寫成八股文了，還公然有人喝采，引爲用話寫文章的好例子，固屬奇怪；不過我們看過林先生對大衆語所持的態度，對袁中郎的偏好以及‘四六文底新生命’的主張，倒不足爲怪了。

下

野叟曝言是一部宣傳舊禮教，提倡封建道德的書，讀過前次談話中的引文，該可以相信我底話。成篇成套的說教，硬栽在書中人物底口中，叫我們看了，好像看見阮玲玉在‘小玩意’之類的影片中，忽然大演其說，大喊其口號一樣肉麻，藝術手腕，實在太笨拙了。一般的劍俠小說，本來都是封建社會底產物，都有忠孝節義的指示，可是那些指示，大概滲透在人物底性格行為中間，不像野叟曝言直接把作者底論文窩稿式的東西都拿出來交了卷。至少，在這一點上，別的劍俠小說比野叟曝言要可愛一點；那怕野叟曝言底作者，他底主觀的企圖，也許比一般的劍俠小說要大。

如果我們對於一篇作品，不光從作者底教唆上去了解，還要從他底表現上去了解的話，野叟曝言這書，雖然有着宣傳舊禮教的熱忱，可是它底宣傳，卻是很無力的。

第一，舊禮教那東西，要建築在像文素臣那樣的英雄底鐵腕上。既有豪傑肝膽，又有聖賢心腸，有伊呂之志，孔孟之學，孫吳之略，武穆文山之至忠至正，而又才高子建，勇邁孟貴，貌勝潘安，功壓韓信，天文地理，醫卜星相，三教九流，諸子百家，十八般武藝，無一不精，連生殖器也與衆不同，只有嫪毐薛敖曹之流可比。這真把古今中外的偉大人物冶於一爐，也造不出這們一個大英雄。就算天可憐見，萬衆有福，產出了這們一位

英雄，這英雄又是一味正氣，不信神仙的，當然不能長生不老；那末，舊禮教豈不也只能趁英雄健在之日，如曇花之一現麼？舊禮教是千好萬好的，作算我們相信，可是沒有那們偉大的英雄就無法實現，卻未免令人遺憾千古。

第二，這樣一個大英雄，作者並沒有告訴我們在現實生活正常生活中怎樣需要，倒只在離奇誕妄妖魔鬼怪的場合表現了他。石女開洞，闖人苗芽，無夫生子，人和熊交、龍交、蟒交、猿交、神交，人急變虎，馬死變人，清水變錢，老蚌獻珠以及種種稀奇古怪的事，固然表出了英雄底偉大，足以炫赫‘少見多怪’之流，但與我們這些平凡的人，平凡的生活有甚麼關係呢？把英雄表現得和我們凡人隔得這麼遠，不怕都寄托在英雄身上的舊禮教不容易叫我們心悅誠服地接受麼？

第三，野叟曝言雖然是宣傳舊禮教的東西，卻無意中露出了舊禮教本來的些漏洞。例如，據書中所寫，女人底貞操是極被看重的。男子妻妾成羣，不用說，是理之當然；女人卻要從一而終，以守節殉節爲貴。這本是我們底傳統的東西，可是書中的英雄，雖然也看重女人底貞操，并且教唆別人看重，自己卻常常破壞別人底妻妾底貞操。他俘獲的女將，賞給自己底家將僮僕，連一個叛王底妃子，也不給人留點體面。固然，別人底貞操，她們自己不一定像我們底英雄那樣，把它當作一回了不

得的事；但是由英雄自己底手裏去破壞別人底貞操，卻未免太違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理了。還有，有些叛逆的人，邪淫的人，固然他們底妻妾，往往不正經，卻也有些是很貞潔的。他們‘伏誅’之後，還有妻妾爲他們守節。這樣的守節是應不應該的呢？守節底出路又是甚麼呢？這書中並未交代清楚。那末，作算我們承認舊禮教是千好萬好，全盤接受書中的教唆，豈不有時也會無所適從麼？

第四，那樣一個大英雄，同時又是個大忠臣。他爲甚麼一定要做忠臣呢？書中的皇帝是個昏君，‘東宮’雖好，也是個平常的人，差那位大英雄，不知該有幾十個十萬八千里。爲甚麼英雄一定要忠於昏君或庸君，自己不做皇帝呢？難道天下還有人比他更適宜做皇帝麼？難道皇帝只許昏庸的人做，不許英雄做的麼？固然他不做皇帝，已經很好了；但是做了皇帝豈不更好麼？這，至少在現在看起來，是件不容易懂的事；也就是忠孝節義的說教本身的一個矛盾。

像這樣指摘，會把文章拉得太長，且說這部書爲甚麼會有人推崇。首先我要說，像這樣一部書，在五四時代那種反舊禮教反封建的高潮中，是誰也不肯或不敢推崇它的，更不用說五卅時代。固然五四時代也有林琴南王敬軒之流，很夠資格把這部當作法寶來祭起；可是林語堂先生說得好：‘野叟曝言’——

增加我對儒道的認識’，雖說維護舊禮教，究竟道士氣味太濃厚太露骨，是不足見重於真儒的。現在五四時代已經過去了。舊禮教雖已不像五四以前被認為天經地義的東西，但舊禮教底社會基礎，還殘存於目前的中國。……加以‘熱心救世’者流，更只要是宣揚舊禮教的東西，不，只要於舊禮教有點利益的東西，都會急不暇擇地搶到手中，那管那東西本身有沒有問題？……推崇野叟曝言，豈不比勸青年讀莊子文選還要識時務得多而且也切實用得多麼？

但是推崇這部書的是林語堂先生。林先生在三一八前後的那種戰鬪姿態，我們還沒有忘記；何況像前次所說，這書又和林先生底主張，在許多點上又剛剛相反。難道林先生會推崇一部在本質上完全和自己底主張相反的書麼？像這樣想，正像舊小說上的兩句套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錯，林先生曾經是一個戰士。但是他好久以來，已經不是戰士了，他完全脫離了戰鬪的行列。從戰鬪中，他沒有得到甚麼光榮的戰蹟，剛剛相反，得到的失敗的創傷，這創傷，在正在戰鬪的時候，是不會覺得的；一到離開了戰鬪，這才深深地感到，才淒婉地用自己底曾經戰鬪過的手去摸撫。這時候，如果不是一個意志十分堅強的人，他就容易傷感地想到在戰鬪中所受的犧牲無謂，想到早知今日倒不如根本不戰鬪的好，而回轉頭去羨慕在戰鬪

以前的那一付銅筋鐵骨一樣的健康的身體。這樣的心情，只要有一點點兒，也就容易發榮滋長起來，使他回復到戰鬪以前的自己而成為敵人底精神的俘虜。何況林先生在他底‘黃金時代’就已承認古人底‘浩然之氣’，說‘古人之精神或有可復者。’經過一點風吹雨打，早就感到‘寂寞的悲哀’，深悔從前‘少不更事’，自然更容易投入敵人底懷抱了。不錯，野叟曝言在許多點上和林先生底主張不合；但它是一部宣傳舊禮教的書，在本質上投合了對許多舊東西發生了熱戀的林先生底胃口。說林先生對舊東西迷戀，並不是一句過分的話。他崇拜明人小品是周知的，反對大眾語提倡‘語錄體’也是周知的，在他編的刊物上特別介紹五四時代代表封建陣營的林琴南，特別鼓吹以歡喜小腳（雖說林先生好像贊成大腳）著名的保皇主義者辜鴻銘底‘蠻子氣’，特別刊載一手絞殺了洪楊革命為‘滿洲國’傀儡底祖先盡了最大忠忱的‘曾文正公’底像片，來煽動我們對那些陳死人的熱情更是周知的。和這些‘幽默’的‘妙’舉一貫，他又向我們推薦了野叟曝言，叫我們去聽那舊禮教宣傳員底講演。在這裏，林先生企圖着甚麼，不言而喻。

不用說，我們希望林先生恢復他那三一八前後的英勇的精神；但是也不能容忍他現在對我們所下的毒藥。如果他底行為是不自覺的，我們更應該指出他底迷途。誰要是放鬆了林證

堂，誰就是三一八時期的林語堂底罪人！

追 記

有再談野叟曝言裏，我說林語堂先生之所以推薦野叟曝言，是野叟曝言底根本思想，那舊禮教，封建道德的宣傳，正中林先生底下懷。可是寫那文章的時候，並沒有把林先生底文章拿出來一一引證，雖說自己已經覺得很夠了，讀者未必不有論據不足之感。所以文章寄出之後，總有點放心不下。

但是要重新翻出林先生底文章來讀一遍，正像要我把野叟曝言重讀一遍一樣地不容易，心裏雖想做點補充工作，同時又感到無從下手。多謝林先生，最近又在人間世上發表了一篇哀莫大於心死；多謝芒種創刊號，刊出了林先生底演詞的真正紀錄，現在我可以從這些新材料中隨便鈔一點來作我底文章底補充了。

處此是非混淆之勢，聰明不足憑，惟視一點孤貞氣義足爲我們表率而已。……若文天祥、史可法、王陽明、曾國藩、林則徐，以儒家出身作出大事業，皆稟一點孤貞節烈之氣而已。能數君子皆一片天地正氣在心頭，其學問皆從正心修身做起，王陽明講良知，曾國藩事事留心，皆是儒家積極入世以天下爲己任之成功者。（旁點引用者。）

——人間世第二十三期——

……孔子底做人之道，一點不懂……最好，諸位青年們，先明瞭孔子底做人

之道。……我平常是反對孔子的，但是孔子底做人之道，諸位不好反對，不好反對，有價值的。……做人要正正經經，不好走入邪道。真的，一走邪道。……
(旁點引用者。)

——芒種創刊號頁23——

像這樣高貴的思想，不用說，林先生早就具有了，不過現在格外來得明顯，來得具體些。把林先生底這種文章一領會，回頭再去看看野叟曝言，除了覺得野叟曝言沒有林先生底思想純粹以外，對林先生底推薦野叟曝言，是不會再有什麼不懂的。胡風先生在林語堂論裏說：‘八九年之後，才由孟子底“浩然之氣”走到了袁中郎底“性靈”和“語錄體”，我們倒應該承認他走得是很慢的’。現在帶給胡先生一個可喜的消息：林先生已經在開快車了。

悍青，三月九日，北平。

“愛智廬”

——川遊雜記之一——

神州大氣，腐穢蝕人；西望峨眉，遠在天外，瞻仰弗及，我勞如何！

——仲——

成都是個很好的住家的地方，許多房子底院子裏都栽的有好些樹；光靠這一點，就比如說南京北平那些地方好；何況氣候又好，冬暖夏涼，外帶常常夜晚下雨白天晴；因此，在四川做過官，帶過兵，發了點財的人，都愛在成都住家，雖說他不一定是成都人，甚至不是四川人。

既然是住家，既然又是多少有幾文的人，就不一定在幹着

什麼很忙的事。反正多的是工夫，在玩古董，吸‘漂膏’，開姨太太，吟風弄月之外，如果爲了擺擺自己底家風，炫耀炫耀過去的光榮，而有什麼設施的話，那應該不會受到什麼非難。成都僻靜一點的街巷裏的房子，大門口往往掛着一塊匾或一副對聯，叫人從那中間可以知道這府上底尊姓乃至這府上老爺底台銜，這辦法，我以爲比小時候在鄉下看見人家把‘某某世家’或‘賜某某出身’之類寫在燈籠上的要高明的多。因爲燈籠只有逢年遇節才掛，匾對卻時時刻刻掛着在；像我這樣的過路人，要知道某府上底尊姓或台銜的好奇心，難道只有逢年遇節才会有麼？

不過，除是那樣的匾對之外，我也看見過別的東西，那就是‘愛智廬’。

有一天，我跟一個朋友從黃瓦街走到支機石公園去玩，中間不知經過一條什麼街，我忽然看見一塊并不很大，也沒有金字匾那樣堂皇的木板上刻着三個藍字：‘愛智廬’，橫在一家大門底橫木上頭。大約從這三個字中間看不出這府上底尊姓或台銜之類吧，當時恐怕有幾秒鐘的時間，我底眼光停留在這塊牌上。我底朋友該是正在跟我談着什麼話吧，他像另起話頭地忽然問我：

‘你曉得吳老頭子麼’？

突如其來的這樣一問，真叫人有點摸不着頭腦。楞了這麼兩秒鐘，我感到一點侮辱，這傢伙太瞧不起人了，我怎會連吳老頭子也不曉得呢？於是我鄙夷地回答：

‘不是吳稚老麼？那真是誰個不知，那個不曉哇’。

‘不是——朋友笑——我說的四川的吳老頭子’。

怎麼？四川的？……四川也有吳老頭子？我總以為吳老頭子只有一個，就是吳稚老；四川也有姓吳的，四川姓吳的也有老頭子，我一向沒有聽見說過，我應該承認我底譫陋。於是我紅着臉說：

‘我我……’

‘不知道？——朋友睜着吃驚的眼睛——瞧，就是吳又陵啦’！

哦，吳又陵！這個吳老頭子我是知道的，不過我沒有把他想為是‘四川的’，同時也沒有想為是一個‘老頭子’。雖說他在‘打店’的時候，就有人稱他為‘老英雄’了。但是這時候為什麼提起他來呢？經過朋友底解釋，才知道掛着剛才引起我底注意的‘愛智廬’三個字的房子就是他底住宅。他現在就住在這裏頭。

十年以前，對於這位吳老頭子底文章，我是個熱情的讀者，他給予我的影響，在當時怕很少人能够比得上。十幾年來，

雖然再沒有看見過他底文章，也不知道關於他底半點消息，可是一碰到或觸及我們底固有道德的場合，一讀到江博士或幾教授們底名言諠論的時候，總不由自主地想起他來。我懷念着他，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一年兩年的事了。現在說我到了他底住宅底門前，說是要是我願意，就可馬上進去看見他，我底心情是怎樣地激動着在嚙！可是這心情我沒有讓同路走的朋友覺察。我以為有時候人應該把自己底無論什麼都隱藏起來的。

‘愛智廬’已經落在我們底背後，我像毫無存心地向朋友詢問一些關於這位老頭子底事。從朋友口中，我知道他前幾年在川大教書，不知為什麼，現在卻不教了。這話很叫我高興。雖是朋友說他底不教書是不知為什麼，我卻覺得我倒像知道點為什麼似的。在幾教授幾教授正在堂哉皇哉地發表他們底集團的高見的現在，像這老頭子，教書本就該沒有他底分；如果公然能安安穩穩地教書一直教下去，恐怕他已經不是我所懷念的老頭子了！

朋友又說，這老頭子很好玩，常常有些人去跟他‘擺龍門陣’；跳皮點的就拿些什麼生活什麼運動之類的話去質問他。他總是不回答，他總是笑，他總是說：‘孩子們啦，你們究竟讀了幾本書？’多謝天，我所懷念的人還能夠笑，能夠在雄辯家底圍困之中，找到最適當的應付；不過，還容許他笑，還忍耐地底

傲慢的回答，人們底寬宏大量真也值得稱贊。

關於這老頭子，我聽到的只有這多。以後，我很快就離開了成都，竟沒有再到‘愛智廬’前去望一望。這在我，是比沒有去遊峨眉山還值得懊悔得多的事。因為有這種懊悔，在離開四川的輪船上，我還常常想着他，幻擬着他底容貌，甚至還想默唸出一篇或一段分手了十幾年的他底文章。

誠然，這老頭子底文錄底基本觀念，在現在看來，該有不少值得討論的地方，他因為要對‘孔家店’發議論，就抬出老莊諸子，甚至把以後的‘混賬道士’像李卓吾都捧得什麼似的，好像要‘出揚’，就定要‘入墨’，忘記了我們所需要的是‘楊’‘墨’之外的‘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借用另一吳老頭子底話）。那是即使是區區也不敢苟同的。那怕這樣，就全體說，在‘打店’運動上，卻演了一種了不起的角色；並且，文錄中的談禮說孝的文章，就我所知，到現在為止，還是最勇敢，最透澈，最確切，最淵博的東西。記得小時候讀論語讀到：‘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的時候，覺的以下的話，並沒有談到什麼‘禮之本’，很疑心孔林之間有什麼言語上的隔膜，到了讀到文錄的禮論，才恍然大悟，孔子底答詞，原來在這裏！至於論語上某某問孝，某某問孝，我也以為與其看那‘子曰’以下的話，倒不如看吳老頭子底說孝的，雖說他們的只是‘孝’，不是

‘孝之本’。現在，像我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一付對聯一樣，正是：‘提倡新生活’恢復舊道德’的時候。禮或孝之類，馬上會如日月經天、江河緯地、在中國乃至在全世界昌明起來的吧，趁這時候，我們多懂得一點禮之本，孝之本，總該會像喝十全大補湯一樣地有益無損。那末，我願意在此向我們底同胞捧呈吳老頭子十幾年前寫的一本薄薄的書，正像我願意‘愛智廬’中現在藏的有更好更多的未刊稿的一樣——可惜的是我不是一折六扣的書店老板。